



# 歷史的 契

JUNCTURE

# 機

李劍閣  
文集





中國經改歷程

• • • • •

# 歷史的契機

• • • • •

李劍閣 文集



#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為“中國經改歷程”叢書作序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劉遵義

• • • • •

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學者的這套叢書作序，我感覺很光榮。叢書的主編肖夢立意把這些有名的大陸經濟學者，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所發表過或未完全發表過的文章選擇集結成冊，時間跨越25年之久，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經改歷程”的歷史文獻。這可以為香港、台灣，乃至海外華人，凡有志研究中國大陸這場波瀾壯闊的改革歷史的，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政策的甚或研究這些學者的人，打開一扇直接了解和認知的窗，確實是有意義的。

中國經濟保持25年的增長，是一個奇蹟，不單是因為它的快速成長，還因為這一成長是伴隨着一個社會的轉型。今天，只要是不帶偏見的人，都會同意。發端於上個世紀下半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的大轉型，不僅僅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有文化、觀念和制度上的轉型。回顧中國經濟改革25年的歷程，總結中國經濟改革為什麼會取得很大的成就，現在又面對哪些尖銳的矛盾和嚴峻的挑戰，就不盡是中國大陸自己的事，



也是香港和台灣相關人士所關注的。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那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後開始的，在改革開放之前，人們對中國大陸知之甚少，可是如今，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來，凡是到中國大陸來的人都會留有深刻的印象，它不是世人想像中的僵化、鐵幕後的共產國家，到處高樓林立，商家店鋪櫛次鄰比，衣裳光鮮。年輕人無法想像當年，也常常有人已經忘記了七十年代的中國計劃經濟時的景況。

我是1979年到中國去的，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來中國大陸，很興奮。當時美國經濟學會 (AEA) 組織了一個10人代表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因 (Lawrence R. Klein) 為團長，另一位諾獎得主阿羅 (Kenneth Arrow) 和哈佛大學的珀金斯教授等和我是代表團成員，這是頭一個美國經濟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我們訪問了五六個城市，見到中國經濟學界前輩許滌新等人。那時，賓館飯店少得可憐，我們住在民族飯店，我和阿羅要合住一個房間！到外面想吃早飯，雖然才幾分錢，但因為沒有糧票，無論給多少錢，也買不了油餅。買東西要排隊，吃飯也要排隊。長安街是空蕩蕩沒有車的。人們穿着灰藍色單調劃一的服裝。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衣食住行都是匱乏的。對政治環境人們也懷有恐懼和陌生感。我要去看我向未謀面的姨夫屈武，他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中“平反”出來，我對同屋的阿羅教授說，如果明天早上我還沒有回來，就出事了，請幫忙救我。

就是在這次訪問中，我們商量要給與世界隔絕已久的中國經濟學界辦計量經濟講習班，籌劃設立一個計量經濟的研究所，以推廣計量經濟學。第二年，1980年夏季，來自全國各地，有100人參加的計量經濟講習班就在頤和園的龍王廟開課了。天氣很熱，當時又沒有空調，但是，講課的人努力，聽課的人用功。克萊因、鄒至莊和我等一共七個教授，我教了兩個星期，每天都是六小時的課，有時要上八小時，汗如雨下，熱情高漲。我記得當時的學員有王春正、李伯溪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中的重要成員。其中一件趣事也多少反映了那個年月中的特點。一個學員有一份“機密”文件，內容是翻譯的我在美國做的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的文章，他說這是機密的文件，不能給我，我說，這是我的文章，裏面的內容我都知道，沒有什麼機密可言。當時，我對中國的經濟





然最後還是採納了某官方機構的方案，不過，從中還是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改革和開放帶來了海納百川的氣度。

這之後，199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改革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我到中國大陸愈來愈頻繁，接觸到更多的中國高層、官員和學者。這套叢書的作者更是我相識已久的朋友，不僅僅是在國際會議上有學術交流，也常常就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甚或是中國面臨一些問題時，都會及時交換意見。

有幾件事也值得回顧。

台灣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李國鼎先生曾在1993年6月10日至13日訪問了中國大陸，參加世界銀行、國家體改委和財政部在中國大連共同舉辦的“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十分重要，中國經濟正值要採取政策措施化解經濟過熱，推進全面經濟改革的關鍵期，是我向時任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司長的樓繼偉先生建議，邀請國鼎先生與會，着重介紹台灣在這方面的經驗。這是國鼎先生在1949年後首度——也是唯一一次造訪中國大陸。作為當時台灣歷來訪問中國大陸的最高層官員，他在會上，首先朗誦了唐朝詩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



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等他念完，全場起立鼓掌，而我看到他眼泛淚光。他對會議的主導意見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貢獻，並在會下，還針對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改革方案，介紹了尹仲容先生當年在台灣推行改革的情景。樓繼偉此後還就國庫制度改革等問題向他請教，非常敬重國鼎先生幾十年前在台灣推進改革的堅韌決心。

的確，這是中國經濟改革極為關鍵的時刻。從1992年到1994年，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郭樹清、吳曉靈、謝平等學者專家協同努力，以“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為目標，思考和研究了有關財政、稅制、外匯體制、金融、社會保障等各個分項專題，提出了他們的意見和看法。整個過程中，我亦經常與他們交流，隨時盡我所能提供建言與幫助，我也從他們那裏收穫良多。1994年財稅、外匯和金融三大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是與這套叢書作者在此階段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直接相關的。

這裏我還要提及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國家貨幣貶值，當日圓突破1美元兌140日圓這一心理價位後，亞洲貨幣市場和股票市場一片恐慌。中國出口面





臨東南亞經濟體的競爭，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及時隨之調整的呼聲愈來愈高。我在這一關鍵時刻，發表了《天塌不下來》的文章，闡述為什麼人民幣不應該貶值的道理。事實證明，“對中國來說，人民幣保持穩定，便可以在外交和政治上得分。因為這是中國作出的強有力姿態，表明中國願意向東南亞其他經濟體提供支援與合作，從而穩定東亞經濟。”而這背後，我得到了中國大陸專家學者的支持，也是我們思想交流的一次事例。

他們是不容忽視的中國改革開放中的重要的人物，這些學者或已成為官員的學者，在在都是始終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線，對國家抱持着強烈的使命感，是新觀念的推動者，是實踐者，也是改革者。這讓我想起我的外祖父曾經給我的題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華民族正是有這樣一批又一批的人，在實踐着這樣的理念。

劉遵義

2005年3月於香港



# 目錄

## 序

1. 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  
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係  
——“六五”時期經濟發展經驗的初步研究 14
2. 論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給 56
3. 現代化需要企業家和企業家需要的改革 66
4. 試析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 76
5. 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118
6. 重新確立理論的應有地位 130
7. 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兩辨 134
8. 論走出“放亂收死”的循環 150
9. 1994年：改革攻堅和制度創新 166
10. 必須繼續推進流通市場化和市場制度化 178
11. 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展望 208



12. 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234
13. 經濟學家的作用、責任和命運 252
14. 論從抑制通脹到擴大內需轉型期的宏觀經濟政策 260
15. 迷茫中經濟學家如何把持自己 290
16. 對資本市場的幾點認識 294
17. 超越勞動價值論，確立社會主義分配關係 334
18. 關於農民就業、農村金融和醫療衛生事業問題的幾點意見 350
19. 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建設服務型政府 368
20. 金融創新、金融穩定與金融監管 378
21. “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論 386
22. 能源產業改革和電網發展 394
23. 2020 年的中國經濟 404



# 正確處理經濟建設、 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 生活三者的關係 ——“六五”時期經濟發展 經驗的初步研究

社會經濟的發展並不總是平緩漸進、沒有曲折和波瀾的。在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常常會有一些峰迴路轉、急劇轉變的時期。中國“六五”計劃時期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歷史轉變階段。它的成就和經驗將對中國今後相當長時期的現代化進程發生深遠的影響，也將對中國領導部門的正確決策提供有益的啟示。

“六五”時期中國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各方面所取得的具體成就，國家計委和統計局已經做了很好的總結。本課題的目標，是從歷

---

編按：本文為內部報告，寫於1985年。參加研究和寫作的有吳敬璉、李劍閣、丁寧寧、張軍擴、鄧壽鵬、張小濟、鄭景勝、馬長山、梁天征等。



史發展的較大跨度上，根據“六五”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所處的地位和肩負的歷史任務，對“六五”期間社會經濟發展進行系統的分析，總結經驗教訓，權衡利弊得失，以期為今後的決策提供一些參考性意見。

## 一、總論

“六五”時期，中國國民經濟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業全面高漲的基礎上迅速發展。五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預計都將超過10%，國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將達9.5%。1985年中國工業總產值預計為8200億元，折合3500億美元，僅次於美、蘇、日、聯邦德國、英、法，居世界第七位。1981～1985年農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預計將達10.8%，較之前28年的平均值3.5%大大提高，在世界上人口超過5000萬的17個國家中遙遙領先。糧棉產量居世界首位。1981～1985年中國原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已有一億多人轉入工業、商業和其他第三產業部門。這一事實說明，中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建設，即從傳統農業經濟和現代非農產業並存的“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迅速轉化，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不斷擴大現代經濟部門，促使農村勞動力大量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是以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為前提的。既然如此，為了保證中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有必要改變過去那種片面追求產值增長速度的傳統發展戰略，走出一條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速度比較實在、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同時，有必要改革過去那種僵



化封閉的傳統經濟體制，使社會主義經濟本應具有的生機和活力得到充分發揮。中國發展戰略的轉軌和經濟體制改革在“六五”期間取得了重大進展：

1. 產品經濟開始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變；
2. 重速度、輕效益的“趕超戰略”，開始向在重視效益的前提下使人民得到更多實惠的戰略轉變；
3. 片面發展重工業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開始向有重點的協調發展戰略轉變；
4. 依靠增加投入增產的以外延擴大再生產為主的戰略，開始向依靠提高投入產出率的以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的戰略轉變；
5. 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封閉型經濟，開始向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開放型經濟發展。

儘管這些轉變還剛剛開始，對經濟發展卻已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至於新局面的打開、新經驗的取得對今後發展的意見，更是無可估量。

然而，發展中國家迅速向現代化經濟轉化的階段既孕育着無限的希望，又充滿着巨大的風險。這是因為，要使勞動力轉移——效益提高——更多的勞動力轉移的良性循環能夠持續地進行下去，而不致發生逆轉，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的實現必須滿足若干創建難度很大的條件。就經濟方面來看，基本的條件是效率的提高顯著地超過消費的增長。只有這樣，社會才有足夠的剩餘產品用來進行投資。具體地講，需要做到以下三點：1. 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2. 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比較適當；3. 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比較



適當。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即使經濟已經進入“起飛”階段，也會從空中掉下來。

由於經濟效益持續提高的根本保證在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以上條件也可以歸結為“六五”的三項主要任務：1. 改革經濟體制；2. 發展生產，搞好建設；3. 改善人民生活。這三項任務既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因此，正確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使它們相互支持，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妨礙，互相掣肘，對於經濟工作的全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總的看來，我們在“六五”期間確實做到了三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首先，在這五年間，以農村改革為先導，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漸次展開，促成了中國經濟中巨大潛能的釋放，使生產持續增長，效益有所提高，經濟實力增強，建設步伐加快。“六五”期間，全民所有制單位預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 5260 億元，新增固定資產 3680 億元，建成大中型項目 469 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投資約 1000 億元，建成投產技術改造項目 10 萬個。這些新增生產能力無疑將對中國國民經濟現代化建設的長遠發展起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1958～1978 年的 21 年間，中國人民的消費水平平均每年只提高 1.8%，而“六五”期間，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每年提高 8%。其中，全國城鎮職工的年平均收入由 1980 年的 762 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1176 元，扣除物價因素，平均每年增長 4.7%。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由 1980 年的 191 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400 元，扣除物價因素，平均每年增長 14%。五年間全國城鎮還新安置就業人員 3500 萬人，待業率由 1980 年的 4.9% 下降為 1985 年的 1.5%。以上這一切說明，“六



五”期間我們在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係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不過，在另一方面，“六五”時期的個別年份也出現過三者關係不夠協調的情況。例如，1984年第四季度以後，由於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加過猛，工業增長速度過高，造成了貨幣投放過量，國家結存外匯下降，能源、交通、原材料全面緊張等問題。雖然由於黨中央和國務院及時採取了正確的措施，這些不穩定因素逐步得到消除，但它們在一段時間裏給社會經濟生活和經濟體制改革帶來了不利影響。

“六五”的經驗表明，當上述三者之間的關係處理得比較好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比較主動，體制改革就能夠順利推進，工農業生產就能夠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人民生活也能夠得到明顯的提高；反之，市場、財政信貸和外匯收支情況就會惡化，改革的繼續推進也會遇到困難。

### 1. 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之間的關係

建國以後的最初30年，中國採取了由國家集中農業剩餘產品來投資建設工業的模式進行現代化建設，使廣大農民的生活不能隨着生產的發展而得到應有的改善；在城市也採取“先生產，後生活”的政策，忽視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勞動者的積極性受到很大損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較快地改善人民生活，1979和1980兩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超過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國民收入增長。這樣做，糾正了過去





“重積累、輕消費”，強調社會性消費、忽視消費者個人選擇的做法，使勞動者個人收入有較快的增長，帶有“還欠賬”的性質，因而是必要的。

“六五”期間人民收入水平繼續較快地增長。前四年，扣除物價影響，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平均增長14%，職工人均生活費收入每年平均增長6%，超過了同期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5.8%的增長速度。如果加上各種社會承擔的福利、補貼及其他轉移支付，實際上個人收入的增長速度還要高一些。

雖然“六五”期間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繼續帶有某種程度的“還欠賬”性質，因而較之通常時期快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人均收入增長超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視為常規，長此以往，就會造成物質生產部門建設資金的短絀。目前中國消費水平已在許多方面超過其他一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階段時的消費水平。中國人均國民收入1983年為231美元，而在吃的方面，由於食品的高額補貼和居民消費面過窄，每人每天的食品熱量攝取為2877大卡，達到日本人均國民收入413美元時（1960年）的水平，是1977年全部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3倍；在用的方面，1985年城市居民家庭電視機、錄音機、電風扇等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已達到日本人均國民收入1600美元時（1970年）的水平。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用於支持物質生產部門發展的資金並沒有與消費（包括社會消費）的增長按同一比例提高。“六五”期間中國國民收入的使用額中，積累所佔比重雖然從1980年的31.6%提高到1985年的32%左右，但有兩個情況需要注意：第



一，由於生產資料價格水平上升大大快於消費資料（1984年消費品零售價格指數提高2.8%，建材價格指數提高11%～12%），因此，實際積累率大大低於按現價計算的積累率。第二，在投資中，用於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投資額增加很快，用於物質生產部門的資金份額相應降低。“六五”期間物質生產部門積累率（國民收入用於物質生產部門的投資的份額）已由“五五”期間的22.1下降為“六五”前四年的15.3%，1985年繼續下降。在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投資中增長得最快的又是建設“一條街”、貿易中心、旅遊大樓的支出，而城市公用建設和群眾迫切需要的其他基礎設施卻改善不多。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上，物質生產部門的建設與發展仍是整個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本部分。這部分建設資金的短缺將使今後的經濟發展缺乏後勁；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這對人民生活的持續提高也是沒有好處的。

按照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由於人口增長以及社會保障和社會性消費的存在，人均生活費收入的增長應略低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情況更是如此。對它們說來，一方面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投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高消費的強烈“示範效應”又造成國內過高的消費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從長遠利益考慮，發展中國家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加強對消費的適當引導和控制，以保證經濟建設有足夠資金。在中國應當繼續提倡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堅決防止鋪張浪費、大吃大喝的风氣蔓延滋長。否則，如果消極順從那種在消費上向發達國家看齊的壓力，甚至推波助瀾，鼓勵過快地提高消費水平，由生產效益



提高所創造的剩餘產品都被分光吃淨。那麼，或者無法保證建設所必要的積累；或者要想保證現代化建設的足夠資金，通貨膨脹就不可避免，到頭來還是要被迫降低消費水平。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國內通貨膨脹和國際債務問題，其根本原因就是它們既要保證消費增長、又要保證現代化建設有足夠的投資，處在雙重壓力之下，窮於應付。“六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984年下半年以後在“高消費”和“能掙會花”等傾向的影響下出現的消費基金失控局面，以及由此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困難，給了我們值得長期記取的教訓。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即讓勤於勞動或善於經營的人得到較多收入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由於“六五”期間收入政策的統一性和配套性不足，特別是由於不正之風有所滋長，在不同行業、不同單位以至不同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上機會不均等或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情況愈來愈嚴重。目前農村從事不同行業的專業戶收入差別懸殊，其中最高的運輸和商業專業戶的收入高於最低的種植專業戶收入2~10倍，甚至更多。同是鋼鐵工人，重點企業關鍵崗位的操作工，月薪加獎金不過百元；而小型鋼鐵企業，只要靠賄賂、走門路等手段取得調撥鋼材，低價進、高價出，人均月收入達到300~500元的並不少見。一些事關國民經濟命脈和長遠發展的國家企、事業單位，其工資增長遠遠落後於名目繁多的各種“皮包公司”。這種苦樂嚴重不均的現象，特別是一些幹部以權謀私的行為，已經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收入差別過分懸殊的情況下，要想保證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總量膨脹就難以避免；而採取一刀切的辦法控制消費基金的總規模，又必然會降低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因此，為了既控制消費基金總量，又保證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就必須：(1) 運用稅收政策，控制由於價格不合理等因素形成的過高收入；(2) 通過法律手段，懲辦各類利用職權及其他非法手段牟取暴利者，還要全賠、重罰，決不能讓他們在經濟上撈到好處。

要採取鼓勵儲蓄的政策。考慮到收入水平能上不能下的剛性，要使群眾收入水平從 1984 年年底已經達到的高水平上降下來是很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鼓勵儲蓄和引導消費，來化解由於居民收入增加過速所造成的問題。“六五”期間出現過的不鼓勵儲蓄的政策設想，不適合中國當前國情。各國在經濟起飛期間都把鼓勵居民儲蓄作為籌措建設資金的重要手段。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從社會輿論動員、儲蓄形式多樣化、儲蓄組織普遍化等方面作出努力，千方百計地鼓勵居民儲蓄，然後通過多層次的金融機構的間接融資，集腋成裘，轉化為建設資金。因而民間設備投資激增，成為積累的主要來源。日本從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一直堅持這些做法，是公認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吸取。中國居民儲蓄的基本方式是活期和定期存款，相當一部分存款的目的又是“待購”，因而對應的主要是零售消費品。其他國家通行的購買債券、股票、房地產等儲蓄方式在中國十分少見。“六五”期間居民存款增長極為迅速。為了將目前已達 2000 億元以



上的購買力部分地轉化為長期投資，有必要形成輿論，完善機制，創造條件，採取多種形式，吸引居民手中的資金。

要對消費進行積極的引導。引導消費和鼓勵儲蓄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推行住宅商品化。這樣做，不僅可以使居民的消費選擇合理化，減輕因勞動者收入增加對消費品市場形成的巨大壓力；而且可以節省大量的建設資金，在消費與積累之間建立一種相互約束的彈性機制。此外，住宅商品的上市將為提高居民儲蓄傾向提供新的巨大動力。所以，儘管推行住宅商品化牽涉到十分複雜的利益關係的調整，這一點還是勢在必行。

## 2. 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關係

只有改革舊的經濟體制，才能為不斷提高經濟效益創造必要的條件。“一五”以來中國建設的實踐證明，仿效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犧牲農業、片面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開始探索工農業協調發展、適合於中國特點的現代化道路。然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又只有在改革傳統的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六五”前糧價的提高，加上“六五”期間生產責任制的普遍推行，導致了農業的全面高漲。而農業的高漲又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加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展開，整個國民經濟便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現在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改革還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今後的發展中，我們必須繼續把經濟體制改革放在首位。



從根本上說，經濟體制改革是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然而從當前來看，經濟建設的安排，卻一定要有利於建立和鞏固寬鬆的經濟環境，使經濟體制改革可以順利進行。

以上論斷，是從“六五”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得出的。“六五”前三年，發展生產與逐步推行改革的關係處理得比較好。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6%，名義積累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8%，職工名義工資總額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6%。在較為寬鬆的經濟環境下，雖然由於當時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不足，改革的步伐不是很快，但付諸實施的改革措施取得的效果一般較好。在此期間，我們調整了農民的負擔、紡織品價格和部分職工工資，同時比較順利地進行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體制改革試點。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統一了全黨對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對改革目標的認識，這以後改革本應大踏步向前推進，但是由於實際工作中，對改革和建設之間的關係把握得不夠妥當，各地相互攀比增長速度，結果使1984年投資規模大大膨脹，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加24.5%，職工名義工資總額增加21.3%。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局面。信貸擴張，現金發行過量，外匯使用過多，各方面關係都繃得很緊，造成了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原來計劃在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措施，大體上只出台了放開副食品價格和行政、事業單位工資改革，其餘大的改革措施就難以出台了。第二，在嚴重緊缺的情況下，改革措施出台無力。一些產品雖然供銷渠道和



價格放開了，但由於存在嚴重的賣方優勢，市場機制難以發展積極作用，產品質量不但沒有提高，反而相當普遍地有所下降，成本也有所上升。

“六五”的以上經驗表明，在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延擴大再生產的情況下，追求過高的建設速度就會助長內在於舊體制的“擴張衝動”，鋪攤子、爭投資，並間接引起消費膨脹（在中國，基建投資大約有40%轉化為當年消費），從而導致需求的全面膨脹。我們固然不應指望在改革以前就有一個全面、穩定的買方市場出現，但是通過控制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一個較為寬鬆的經濟環境，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而在全面改革開始以後，尤其要注意減少各方面的開支，以便把有限的財力集中用於支持各項改革措施出台，盡力防止過分緊張的市場態勢的出現。

### 3. 正確處理體制改革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關係

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改善生活，而生活的適當改善，給群眾以看得見的利益，又是取得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克服阻力，推進改革的必要條件。然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速度要適當，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式不限於多給報酬一端。

“六五”前三年，職工實際工資年平均增長0.6%，城市居民消費水平年平均增長1.6%，雖然增長速度並不很快，但是由於消費品的供應情況改善，消費者選擇的可能性增加和服務的改進，使群眾中滿意的情緒佔支配地位，對改革的支持態度也愈來愈佔上風。



1984年下半年，報刊上對改革成效的宣傳有不完全切合實際的地方，對“萬元戶”的宣傳也有點過頭，使群眾對於生活的改善設定了過高的預期值；同時，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從自身利益出發，想方設法多發、濫發各種獎金、津貼、補貼；加之缺乏適應於改革初戰階段的明確的收入政策和對消費基金的巨集觀控制不嚴，於是出現了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的問題。1984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比上年增长21.3%，其中第四季度增長46%，致使當年實際工資總額不僅超過國民收入和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也超過了消費品產值的增長速度。

然而，由於在經濟關係沒有理順的情況下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水平，必然引起利益關係背離合理化方向的變動和分配上苦樂不均問題的激化；加上群眾對增加收入的預期值過高，即使工資福利的提高超過國家財力的承擔能力，也難以得到群眾滿意的反應。這樣，雖然居民的收入普遍得到較大的增加，他們仍會產生不滿意的情緒。顯然，這對動員群眾支持改革，分擔改革的責任與風險，是十分不利的。

在這方面，從“六五”的實踐中可以得出以下教訓：

(1) 體制改革時期很容易發生消費增長過猛的問題。這是因為，一方面，從改革措施的實施到經濟效益的全面提高，從而為人民生活的較大改善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其間有一個較長的時滯期。另一方面，改革措施不可能一下子完善，收入分配關係不可能一下子理順，其間難免存在一些不合理現象，又會助長攀比心理，使舊體制固有的“消費飢渴”進一步強化。這時如果不對





消費總量的增長進行控制，不對消費行為進行引導，就容易出現工資與物價的輪番上漲，給進一步改革造成困難。東歐一些國家在陷入這種困境後長期不能自拔，我們必須防止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

(2) 面對着這種情況，我們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千萬不要隨便向群眾許願，把群眾的胃口吊得很高，使自己陷於被動。在向群眾宣傳改革對經濟發展和個人生活改善的作用，以及它帶給每個人機會的同時，也要告訴他們改革是不可能徑情直遂，沒有任何困難和風險，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和代價的。此外，還應當說明，改革的全部效果不可能在一個早上立竿見影地全部顯現出來，要準備做長期的努力。所有這一切，都是要使我們的幹部和群眾在思想上有所準備，防止由於期望過高而招致失望。

(3) 在改革的初戰階段，國家財力有限，群眾收入不可不增，不可多增。因此，決不能專靠增加群眾的貨幣收入來引人入勝。要努力改善政治環境，改善經濟機制，改進各種服務，使廣大群眾能夠從中獲得發揮才能的更多機會，選擇職業和消費品的更大可能性，在更好的工作、生活和人際關係環境中，得到更優良的服務等方面感到改革的好處。隨着改革的推進和改革效果的顯現，再逐步給群眾以更多的利益。這樣，就能使群眾從實踐中認識到實現改革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從而愈來愈堅定地擁護改革，願意為改革作出更大的努力，甚至作出某些方面的犧牲。



## 二、關於經濟發展

### 1. 從提高速度為中心到提高效益為中心的轉變

“六五”期間，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六五”一開始，國務院就針對過去近30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速度雖然不低，經濟效益卻相當差的狀況，提出了圍繞提高經濟效益進行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黨的“十二大”確定了“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總目標，同時重申“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根據中央規定的上述方針，“六五”計劃指標經過綜合平衡，訂得比較穩妥，只要求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5%，以便留出較大的餘地，保證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能夠從容地進行。正如趙紫陽總理在關於“六五”計劃的報告中所說，着重於提高經濟效益是“六五”計劃的一個顯著特點。

五年來，這一戰略轉變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它進行得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六五”的實踐表明，凡是執行新戰略比較自覺，措施也比較落實的時候，國民經濟就發展得比較平穩和迅速；反之，當新的戰略沒有得到認識貫徹，在掌握速度與效益的關係方面出現失誤時，國民經濟的發展就會遇到困難，甚至被迫進行某種程度的調整。

“六五”期間貫徹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發展國民經濟方針的最重大的措施是1981年對國民經濟的進一步調整。首先，國



家採取堅決措施壓縮過分龐大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1981年，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絕對額比1980年下降了10.5%，積累率也由“五五”時期平均的33.2%下降為28.3%。同時，採取了多種措施加強農業、輕工業和教育、科學技術事業。這些措施的效益在農村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過去重工輕農，靠“鋪攤子”上速度，對農村竭澤而漁，喊了多少年的“以糧為綱”，催逼增產速度，農業非但上不去，反倒成為中國經濟中的最薄弱的部門。“六五”前期，由於國家採取予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從多方面扶助農業生產，加之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行，農村經濟在短短的幾年中恢復過來，並得到出乎人們意料的發展。與此同時，輕工業的狀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國民經濟的調整和農村經濟的繁榮使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比例關係——農、輕、重結構大為改善，資源在這三個部分間的配置效益得到提高。在投資總規模縮小的條件下，基本建設的效益也有所提高。1981年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由“五五”期間平均74.6%提高到86.6%，趕上了歷史先進水平。

對於1981年的國民經濟調整，當時在經濟工作人員中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六五”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儘管那一次調整的確由於具體做法上的某些缺點，造成了一些損失，但總的說來是很成功的。最主要之點在於，它為“六五”期間發展戰略轉變和體制改革創造了適宜的環境。“六五”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五五”期間的水平。這一良好成績的取得，也是以1981年調整取得的成果作為前提和基礎的。



但是，由於以提高速度為中心，片面追求產值增長，忽視經濟效益的思想影響依然嚴重存在，“六五”期間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發展國民經濟方針的貫徹執行，仍然有不小的困難。1981年和1982年上半年，經濟調整剛取得了一定成效，1982年下半年又出現了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的苗頭。1983年下半年作了一些調整，也未能根本扭轉人們思想“趨熱”的傾向。到了1984年，為提高產值增長速度，實現“提前翻番”，各地競相上項目，增投資。當年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別比上年增長178億元和106億元的基礎上再增加308億元。加之消費基金增加過猛，形成了1984年下半年貨幣（包括現金和非現金）的過量供給和工業增長速度的直線上升。社會總需求同社會總供給的差距拉大和經濟環境的惡化，使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益有所下降。例如“六五”計劃要求工業可比產品成本每年降低1%~2%，實際上除1981年外，都沒有達到。1984年反而上升1.9%，1985年前8個月又比上年同期上升5%。除要素價格變化影響外，企業經營不善，實踐消耗增加，是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1985年1~8月，全國105項主要的單位產品物耗指標，上升的就有41項。經濟效益不高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產品質量下降。1985年1~6月，全國75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20種的質量有不同程度下降。這種消耗上升、質量下降的趨勢，在1985年下半年需求膨脹初步得到控制以後，才開始扭轉。“六五”期間，中國物質生產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改變了長期以來緩慢下降的狀況，開始有所上升，



但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仍然處於較低水平。

有些人認為，速度與效益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係，速度上去了，效益也會同時上去。實際上二者既相統一，又相矛盾。“六五”的經驗再次證明，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勢必使社會宏觀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益和微觀經濟的企業營運效益降低。

## 2. 超高速對經濟結構的消極影響

國民經濟中資源配置效益的高低首先取決於產業結構的合理程度。國民經濟的綜合能力並不取決於“長線”部門的全部能力，而是取決於“短線”部門的有效能力。如果產業結構七長八短，一部分資源雖然投入“長線”生產，實際上並未對提高綜合生產能力起作用。

“六五”開始以前，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對中國國民經濟進行的系統調查表明，中國國民經濟結構存在以下薄弱環節，妨礙了經濟有效益的增長：（1）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生活、生產服務部門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卡脖子”環節；（2）基礎設施落後，通訊交通緊張，能源供應不足，降低了經濟系統的整體效益；（3）輕工業發展緩慢，農業基礎遭到破壞；（4）採掘工業、原材料工業同加工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失調。

針對上述情況，“六五”計劃規定以加強交通運輸、能源以及農業等“短線”部門為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重點。在實際執行中，農業的面貌有了根本改變，有力地支持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第三產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加。一次能源，包括煤和石



油，都有較大幅度的增產，保證了“六五”期間經濟增長的需要。此外，基礎設施、原材料工業、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各業也都完成了“六五”計劃指標。

但是，由於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高速度的思想仍然盤踞着一些人的頭腦，這些人往往忽視“不斷提高經濟效益”這一前提，把黨的2000年戰略目標片面地理解為只是總產值翻兩番。於是出現了競相攀比速度、比賽翻番的風氣。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使得本來已經有所改善的經濟結構又趨惡化。特別突出的是二次能源和交通運輸狀況。發電量的增長速度不但沒有按各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常規有所超前，1984~1985年反而落後於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的50%，致使大批企業經常缺電，無法正常生產。港口吞吐量和鐵路貨運量的增長速度就更加趕不上經濟增長的需要，只相當於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的30%左右。結果壓船壓港、壓力壓站的物資急劇增加，旅客列車大量超載。公路建設嚴重落後於車輛流量的增長，堵塞嚴重。國內民航也呈現短缺。城市交通擁擠不堪，如不設法改善，就難以維持正常的經濟生活運轉。

“六五”計劃規定的工農業生產增長指標是“保四爭五”。這樣做，是估計到執行過程中有可能出現某些意外因素，預先留出餘地，對於保持工作的主動性和國民經濟有效益的增長是有利的。但是，由於計劃中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線”部門的發展指標是按很小的總“盤子”安排的，一般偏低。而在執行計劃中又存在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思想，工農業實際增長速度超過原定計劃一倍以上，其中超額最多的又是價高利大、還本付息快的



“長線”部門，如加工工業。而能源、交通、原材料、城市基礎設施等“短線”部門，一次性投資大，建設周期長，再加上價格扭曲，資金收益率低，實際上只能靠列入計劃，由國家重點投資來建設，在執行中很難有大幅度超計劃的可能。這樣，盲目追求總產值增長，結果使產業結構惡化，實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如前所述，“六五”的戰略重點是加強“短線”，調整國民經濟的不合理結構。可是在執行中“長線”愈拉愈長，遠遠超過“短線”部門的承受能力。儘管“六五”期間能源交通等“短線”部門的投資基本上都完成了計劃，甚至有所超過，但由於其他行業投資膨脹，能源交通投資在總投資中所佔比重，不僅沒有達到“六五”計劃規定的38.5%的指標，反而從“五五”時期的35.8%下降到34.9%。由此看來，計劃規定的增長速度過低，在執行中又不分部門地鼓勵超過計劃，是弊多利少的。

“短線”部門的新增生產能力不足是一個嚴重問題。“六五”期間鐵路通車里程、海港吞吐能力、原木採運、煉鐵、煉鋼等的新增生產能力都未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由於加工工業的速度大大超過計劃，再加上基本建設規模失控，“六五”後期我們只好大量進口原材料來支撐這種高速增長。1985年鋼材進口量高達1800多萬噸，接近國內生產能力的一半，用匯幾乎等於中國原油出口的換匯額。某些“短線”，如能源部門產量的增長，也付出了設備陳舊、浪費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價。近年來，中國相當一部分發電機組的運轉時數超過正常運行標準的30%以上，設備得不到必要的維修和保養。地方、鄉鎮煤礦是“六五”期間



煤炭產量增長的主力，但如不儘快提高技術水平，除了資源利用率低以外，其消極後果也值得擔憂。多年來對森林近乎掠奪式的採伐，已經損害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不僅造成了當前的生態環境問題，而且給子孫後代留下了禍患。

### 3. 要密切注意規模經濟效益

企業規模結構不合理是影響經濟效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六五”期間的投資新建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偏小的問題，使許多行業的規模效益得不到發揮。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口、就業壓力和投資機制不完善以外，主要是在雙重體制、雙重行為規則條件下，由超高速引起的市場價格信號嚴重扭曲。由於國家調撥物資的價格被管死，市場採購部門的價格就處於邊際水平上，承擔了全部超額需求的壓力。當增長速度過高，市場短缺日益嚴重時，這部分市場調節物資的價格就會上升到可以容納很高成本的不合理水平。在這種價格水平上，不需要考慮什麼規模經濟效益，只要上得快，就能賺大錢。例如鋼材漲到2200元/噸，生鐵漲到500元/噸時，生產成本很高的小軋鋼、小電爐、小高爐都是賺錢的，甚至極其落後的“一腳踢”煉鐵小土爐，也在某些地區“遍地開花”。其他如小煙廠、小酒廠、小紙廠等，除了同樣的不合理價格因素外，還受到財政“分灶吃飯”後市場割據的影響，資源利用的宏觀效益很差。

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10個城市的調查，1984年3212個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基本建設項目中，1000萬元以上的項





目只佔5.5%；50萬元以下的小項目佔52%；平均投資規模只有23.7萬元。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問題。當然，由於市場條件、工業技術水平、資源條件以及勞動者素質上的差別，不同行業所要求的大、中、小三類企業的組合和平均規模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對於目前仍然構成中國工業主體的大多數傳統產業來說，規模效益仍具有重要意義。以汽車行業為例，全國100多家汽車廠中，年生產能力低於3000輛的廠子約佔60%，不少企業一年只生產幾百輛，甚至幾十輛汽車，規模遠遠低於中國現有條件下要求的最小合理規模。近年來投資熱門的洗衣機行業，據機械部估算的合理經濟規模約為20萬台/年；1984年全國130個生產廠家，只有9家達到這一標準。電冰箱1984年全國有110家生產廠，平均規模只有4600多台/年。

問題還在於，這些生產廠家往往並不是彼此之間實行專業化分工協作，而是每一家都從原料剪裁搞到整機的“小而全”單位。在工業中，分工愈細，專業化程度愈高，就能使產品批量擴大，從而以較小的企業規模獲得較大的規模效益。但是，中國社會分工不發達，“全能化”生產方式流行，這就更增加了企業規模偏小問題的嚴重性。

鄉鎮企業問題是“六五”期間經濟發展中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問題。由於農村經濟機制轉換超前於城市體制改革，而城市工業企業在條條塊塊的束縛下仍然缺乏活力，效益的提高趕不上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的需要。農村經濟發展又使大批剩餘勞動力從農業中游離出來。這樣，發展鄉鎮企業就成為實現中國農村



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重要途徑。近年來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很快，已經成為工農業生產中一支生氣蓬勃的重要力量。但是，相當一部分鄉鎮企業存在規模過小、規模效益較差的缺點。1984年底，全國鄉鎮企業的固定資產擁有量（原值），平均每個企業只有3.5萬元。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企業規模較小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應當逐步改善它們的規模經濟效益。方向有二：（1）按照“溫州模式”，使社會分工不斷深化。這樣，就可以在企業保持較小規模的條件下擴大產品批量，提高經濟效益。（2）完善資金流動和要素重組的機制。在存在正常的資金橫向流動以及要素重組、兼併集中機制的條件下，從這些小企業中會逐漸產生規模效益較高的中型乃至大型企業；而小型企業則向專業化發展，這樣也可以求得較好的規模經濟效益。

#### **4. 投資規模過大降低了基本建設效益**

投資膨脹，項目上得太多，使基本建設效益迅速下降，造成資金、材料缺口愈來愈大。據有關單位估算，到1984年年底，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在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13.7萬個，在建總規模為5270億元，加上集體所有制單位的在建規模，總計達6100多億元。1985年1～11月新開工項目又達3.5萬個，到年底在建總規模估計將達8000億元，除去已經完成的3000多億元，還需4000～5000億元才能建成。由於在建規模太大，超過國民經濟承擔能力，影響了工程的正常進行。另據統計，1985



年 169 個重點項目中，有 81 個項目合計缺投資 23.6 億元，佔這些項目年計劃投資額的 17.1%，使這些工程項目不能按合理工期建成。攤子鋪得過大，在建項目過多，導致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由 1981 年的 86.6% 下降到 1984 年的 71.8%，1985 年預計將進一步下降到 70%，都低於“五五”時期平均 74.6% 的水平；同時工程質量下降，1985 年全國建築工程質量大檢查中，查出質量隱患和影響使用的項目佔被檢項目的 5.2%，由此造成的損失更為巨大。

## 5. 超高速不利於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

片面追求產值增長速度，對加強技術改造，實現技術進步也是一個極為不利的因素。由於鋪攤子、上項目是增加產值的捷徑，近年來各地通過艱苦努力進行技術改造的熱情遠遠比不上上項目的勁頭。同時，在“經濟過熱”、需求極為旺盛的情況下，企業用不着搞什麼技術革新，只要增加產量，哪怕粗製濫造也能獲得不錯的收益。這樣，複製古董的問題就愈來愈嚴重。像牛頭刨一類早已明令淘汰的落後工作母機，在 1985 年上半年也成為暢銷貨而大量生產。“六五”原計劃更新改造投資的比重應佔固定資產總額的 36%，但預計只能達到 30%。而且目前用更新改造資金搞新建的情況相當普遍，這 30% 的更新改造投資中，真正實現的技術改造項目遠遠達不到計劃的要求。在外延發展有較高微觀效益的條件下，企業缺乏技術進步的動力，再加上產品優質不優價，新產品試製困難重重，經濟粗放發展的模式就很難有根本的改變。



片面追求產值增長，阻礙了技術的地區性擴散。從國內來看，“六五”期間在搞活企業的同時，技術市場相當活躍。但在地區產業水平相差懸殊的條件下，技術的地區性轉移不伴隨人員、設備的轉移是難以實現的。過去那種依靠行政命令把沿海企業遷往內地的做法現在很難行得通了。在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條件下，本來應當靠經濟動力實現產業向內地的擴散。可是在地區互相比賽產值增長速度的情況下，轉移出產業就會丟掉產值，沒法完成任務。傳統產業不能向內地轉移，沿海老工業基地也難於實現技術升級和產品換代。

技術引進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六五”期間，中國的技術引進工作有了新的發展，軟體引進比重增加。但在“六五”後期追求產值增長速度的情況下，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了上產值，各地盲目引進、重複引進了大量一般性的項目。其中不少是技術壽命短、水平低的普通裝配線，它們對國外元器件、原材料的依賴程度過高，大部分產品出口競爭能力不強，只能用來滿足國內市場的短期需要。1984年下半年，為了解決總供求不平衡的問題，又不得不用相當數量的外匯進口原材料、元器件以至高檔消費品，而另一方面，用於引進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所必需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的外匯所佔比重則太小。

## **6.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

不斷提高全民受教育的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是整個國民經濟長時期有效益增長的根本保證。在建設社會主義兩個文明



的方針指引下，“六五”期間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國家財政支出中的科研教育經費由1980年的100.7億元增至1984年的161.6億元，增長幅度達60.5%；同期科研教育的基建投資增長了76%；加上社會各方面集資興辦教育和開發科技的投資，總數還要多些。

但是，重產值、輕效益的思想妨礙了人們對關係長期效益的科研教育事業給予足夠的重視。“六五”期間，儘管科研教育經費的絕對量有較大的增加，與其他國家相比，相對水平仍然很低。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經費一般佔國民生產總值的4%~5%，發達國家約佔6%甚至更高，而中國科研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1980年為2.33%，1984年為2.43%，不僅水平低下，而且四年僅提高了0.1個百分點。加之近年來由於物價上漲，以及一些行政機關扣留、挪用教育經費，一些中小學因經費不足不得不出租校舍，開辦旅館、商店，而大學則搞旅遊，或組織教師外出掙錢。這對提高教育質素十分不利，極需解決。

中國科學技術工作過去偏重於基礎研究和高、精、尖攻關，面向生產的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比較薄弱。科技體制改革以後，開發研究有所加強，並取得了一批成果，對於推動中國工農業生產的技術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近來有些科研單位片面理解和過分強調科研單位增產創收，出現了某些急功近利、“抓現錢”的現象，相當一部分人對於基礎研究的重視不如應用研究，對應用研究的重視不如開發研究，對開發研究的重視不如做生



意，從而使近期難以見效的若干基礎研究和難度較大的應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害。這種情況值得嚴加注意，如果任其發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面臨缺乏最基本和最必需的科學技術儲備的危機。

在教育方面也有類似的情況。“六五”期間，中國高等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有所發展，但基礎教育，包括幼兒園、小學、中學、農中、職中、技術學校等發展較慢。以上幾項均未能完成計劃指標。其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率由1980年的75.9%降為1984年的66.2%，同期初中畢業生升學率由43.1%降為38.4%，每年都有數百萬年齡小、無職業技能的少年流向社會。此外，中、小學在校生中途退離學校的人數也很多，僅1984年全國就有200多萬名中學生和400多萬名小學生中途輟學。產生大量男女少年過早地從農、從工、從商，甚至無所事事的現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校舍、師資、設備不足、學校容納能力相對……等客觀方面的原因，也有“一切向錢看”，認為“讀書無用”，不如自動退學、從事掙錢等主觀方面的原因。

國際經驗一再證明，發展中國家在基礎教育（包括幼兒園和中小學教育）方面的投資是長期發展的必備基礎。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一貫重視基礎教育。1873年日本初等教育入學率為28.1%，而到1911年以前已達100%，成年人的識字率則達到54%的高水平。同時，日本還以極大的努力加強科技教育和職業教育。國際上公認，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全民的知識化。如果中國不努力改變基礎教育的落後狀況，



不僅將不利於整個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的安定。

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十條，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清理歷史積案、平反冤假錯案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和歡迎。但是，在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方面，措施還不夠切實有力。目前收入分配上“腦體倒掛”的現象相當嚴重。一個大學畢業生、在科研或教育單位工作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的月工資不過80～90元，而一個未上過大學、在工廠工作的同齡人的工資加獎金一般都在100元以上。中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仍然沒有明顯變化。1985年的工資改革方案又相對降低了知識分子的工資水平。過去一、二級教授工資相當於副部級幹部的工資，而新的教學人員工資標準則把這兩個等級列為保留工資；過去副教授的起點工資相當於國家機關副局級的起點工資，而新的工資標準中只相當於國家機關的正處級。不少知識分子批評目前的工資方案是“鼓勵全民向官看”。這不僅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也使一些在校的青年學生產生消極情緒。

中國各類專業知識分子不僅數量太少，而且在各部門、地區和單位間的分布也不合理，加之缺乏流動性，使人才難於各得其所，各盡所能。近年來開始允許人才流動，但由於缺乏配套措施，效果不太明顯。目前老、少、邊、窮地區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留住人才，積壓人才的單位又往往採取各種行政手段阻止人才流動，致使不合理流動和不流動的現象都比較普遍。



執行開放政策以來，中國有大批知識分子出國進修、學習、工作，同時，還高薪禮聘了一些外籍專家來華工作，人才的國際交往空前活躍，對於中國許多方面的工作是很大的促進力量。但是，由於在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安排上不盡合理，近年來各種專業人才申請移居國外的人數增加，某些出國進修人員也有對學成後是否回國工作持猶豫觀望的態度。看來，我們必須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力求避免其他發展中國家出現過的人才耗散、“智慧流失”現象在中國出現。

### 三、關於體制改革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在“六五”以前已經取得重大突破，“六五”期間繼續展開。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在“六五”期間也以相當的深度和廣度進行，不僅在改革的實踐方面採取了若干重要措施，進行了許多試驗和探索，而且在意識形態和改革理論方面也取得顯著成就，使經濟生活開始出現了多年來未有的活躍局面。

1. 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大膽衝破“左”的思想束縛，改變不適應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需要的體制，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經濟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轉變。

2. 在社會主義經濟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開始並存、共同發展的格局開始形成。“六五”期間，我們堅持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農村在以包





乾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發展了一批戶與戶之間自願結合的經濟聯合體。鄉鎮企業飛躍發展，在國民經濟中取得了不容忽視的地位。全民所有制經濟也有了新的變化。一部分國營小企業通過承包、租賃、出售等方式改變了財產關係或經營形式。打破了原有的所有制界限，按照合理的經濟原則組成的各種新的經濟聯合體有所發展。這些因適應不同層次生產力和不同經營條件以致所有制形式和經營方式各異的企業，給整個經濟帶來了活力。

3. 從以下兩個方面抓緊增強國營企業的活力：第一，在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方面，較大幅度地削減國家指令性計劃，區分不同情況擴大了企業支配人財物、安排產供銷的自主權。大多數企業開始關心市場需求和盈利水平。第二，在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方面，普遍推行了廠長負責制。廠長的產生，一般要經過民意測驗和職工推選，提高了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職工開始關注企業的經營，重視企業的利益。

4. 取消了除糧油以外大部分商品的定量配給制度，增強了消費者主權。這一方面提高了居民適應商品經濟生活的能力，使居民能對自己的開支作出符合意願的安排，有利於消費結構的合理化；另一方面也促使生產部門和商業部門更多地考慮消費者的要求，有利於引導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根據需求結構作出調整。

5. 原有的指令性計劃體制在許多方面開始鬆動，按中央指令性計劃生產和統一調撥的物資由256種減少到23種。過去單一的產品分配渠道被多種多樣的商品流通渠道所代替。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的投資決策權，也根據項目的性質、規模以及資金來源下放到地方和企業。



6. 價格體制也作了一些重大改革。第一，大部分農副產品價格由市場調節，糧棉收購由統一徵購改為合同定購；第二，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價格多數由市場調節；第三，對煤炭、石油等礦產品以及一些機電產品的超計劃部分，實行了浮動價或市場價；第四，對許多國家制訂的價格，也根據市場供求和成本變動作了相應的調整。經過這些改革，原有的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有效地刺激了生產和促進了節約。

7. 兩步“利改稅”，以及流動資金和基本建設資金由過去的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財政在國民經濟中的原有職能，增強了地方和企業的經濟責任。財政開始加強通過其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的調整對國民經濟進行間接管理的職能。

8. 以中央銀行為核心，以各專業銀行為骨幹的新型金融體系開始形成，各種形式的資金融通活動大量出現。中央銀行承擔了通過控制貨幣供應總量調節國民經濟的責任，它的作用開始由被動向主動轉化。

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全黨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問題有了比較統一的認識以後全面展開的。對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目標模式的認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五年間幾經反覆，終於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得到了綱領性的解決。改革是極為複雜的、群眾性的探索和創新的事業。“六五”期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也積累了許多對於進一步推進改革極其寶貴的經驗。1984年第四季度至198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出現的需求膨脹、經濟“過熱”、部分物價上漲較多等問題，使得一度進展順利的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着一場嚴峻的考驗，也使得改革中的問題得到了比較充分的暴



露。認真地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切實地改進我們的工作，將對今後改革的順利開展起巨大的積極作用。

## 1. 改革必須配套進行

“六五”期間，城市改革的各種措施之間存在協調和配套不足的問題。在我們初步解決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理論認識以後，沒有及時地制定出比較切實可行的總體規劃來，甚至一些人還誤認為舊體制的積弊是可以逐個擊破的。因此，在一段時間裏，過分着重於尋找能夠觸發全局的“突破口”，忽視了與之相配合的相關措施和後續行動。體制改革是一項極其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統籌兼顧，周密安排。單項改革措施先後孤立地出台，往往使新體制無法發揮它的整體功能，並招致許多不良的連鎖反應，這使得我們難於把握改革的主動權，而只能窮於修補應付。

### (1) 改革措施出台的時序應有科學安排

稅制改革是在1984年初宣布三年內價格不大動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企圖通過產品稅和調節稅稅率差別，對嚴重扭曲的價格體系進行矯正，可是這卻增加了下一步價格改革中的“談判”困難。而一部分生產資料價格放開以後，又未利用稅率調整將一部分屬於超額壟斷利潤的企業收入收歸財政。這樣形成的某些不合理的利益關係也勢必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障礙。

### (2) 微觀放活和宏觀管住應大致同步進行

國家在放開對企業嚴父般的管束的同時，並沒有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和採取有效的宏觀調控措施，來強化企業的預算約束，



仍然常常給企業以慈母般的呵護，使企業在有了一些自主經營的權力以後，沒有負起相應的盈虧責任。因此，企業行為的合理化不能實現，消費基金失控不可避免。

### **(3) 在模式的轉換中，要防止出現宏觀控制的“真空”狀態**

國家過去主要是對供給進行微觀干預，現在正逐步過渡到對社會需求的宏觀控制。1984年，在中央銀行還沒有健全的手段控制貨幣供應總量的時候，就允許甚至提倡各專業銀行展開業務交叉和競爭。“四門大開，四行爭貸”，造成了信貸失控。在外貿、外匯的管理方面也是兩放兩收，造成了一定的損失。

### **(4) 正確處理改革的點和面的關係**

在改革過程中我們往往沿用過去的試點工作方法，給試點單位“開小灶，吃偏飯”，分別對它們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待遇。這樣不但使試行的制度由於失去了典型性而無法推廣，而且各種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局部政策互相衝突，使經濟參數體系陷於紊亂。

當然，舊體制的問題盤根錯節，不能企求一切方面的改革在一個早上統統實現，而只能有計劃地分步驟進行。但是，經濟系統的各主要環節必須協同動作。根據“六五”的經驗，在改革的每一個步驟上，以下三個環節的改革都要配套同步進行。這就是：（1）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2）完善競爭性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3）建立適合於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如果只有第一個環節上的改革而沒有第二個環節上的改革與之配套，企業不可能在競爭的壓力下改善經營管理。如果只有第一、二個環節上的改革而沒



有第三個環節上的改革與之配套，就不能克服商品經濟所固有的盲目性，不能保證商品經營者的微觀決策符合社會的宏觀目標。反過來說，如果有第二、三個環節上的改革而沒有第一個環節上的改革，作為宏觀調節的微觀基礎，企業對參數變動（如利率的提高）不敏感，宏觀調節措施也不能得到企業的積極回應。

總之，“六五”期間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幾個主要環節上未能配套同步地進行，使國民經濟體系中出現了不少漏洞和不協調現象，這是使改革的效益未能充分發揮和出現宏觀失控的一個主要原因。此外，各級管理機構及其職能的存革興廢，也應同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進程相適應，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這方面存在缺點，也會影響改革效益的發展。

## 2. 堅持實行經濟性分權

“六五”期間國民經濟體制未能充分有效地運行，不僅是由於各種改革措施的配套不足，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實行經濟性分權，把微觀經濟活動的決策權交給企業，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模式構想，常常受到在中國長期存在的行政性分權思路的干擾。以“簡政放權”為基本思路的改革進行到今天，已經形成了地方分權進行行政性管理的格局。許多事實表明，這是當前經濟失控，以致改革在許多方面受阻的一個關鍵問題。

中國從1980年起開始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管理體制。這種新體制打破了以往中央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在改革初期對發揮地方和部門的積極性，解決財政困難，起



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但同時也隱藏着不少消極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強了“地方所有制”類型的行政管理體制。當時，中央也認識到這種財政體制並不是改革的目標模式，只準備實行五年，然後在1985年改為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重新核定各級財政的支出範圍。然而，從實行上述體制之日起，其他一切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不得不考慮財政“分灶吃飯”這個既定的前提，圍繞着行政性分權模式搞小配套。此外，從1984年開始在五個主要工業部門實行的投入產出包乾體制，也帶有以“條條”為主進行行政性分權的性質。在這些部門中，也圍繞着“部門所有制”類型的行政性分權模式搞小配套。以上兩類小配套對有計劃商品經濟體系的形成所起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

(1) 中央的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切塊下達。各級行政主管機關層層加碼，下達給下屬單位。到了基層企業，很難區分哪些是指令性指標，哪些是指導性計劃。而且這種局部性的計劃往往互不銜接，於是重複布點，外延擴張，自成體系，以追求各自的超速增長，而同提高社會整體效益的要求相矛盾。

(2) 物資調撥計劃常常被局部的本位利益所衝擊，國家重點項目、大工業城市的物資供應得不到切實的保證。而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卻又因為地區間劃地為牢、互相封鎖而難於形成。特別是一部分實行“雙軌價格”的物資，計劃內調撥部分常常被“蠶食”，非調撥部分則受主管單位控制，實際上存在經營壟斷。

(3) 資金管理仍以縱向為主。銀行隸屬於各級政府，缺乏開展信貸活動的自主權和經營責任。企業之間的跨地區跨部門的資



金融通受到條條塊塊的嚴重束縛，阻礙了貨幣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形成。

(4) 在對外貿易和外匯管理方面，“簡政放權”和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只是擴大了地方和部門的行政權力，實際經營外貿的基層單位和生產出口商品的企業的自主權並未擴大，積極性也未充分調動起來。而且這種條塊分割的體制不能體現擇優出口和有控制地進口的原則，出現了上邊多頭指揮，下邊多頭對外，自相傾軋，肥水外流的混亂現象。

目前，已經形成的行政性分權格局還有繼續強化的趨勢。所以，我們在研究如何推進改革時，只討論如何配套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弄清楚應當在什麼樣的基點上配套。

中國36年來經濟體制變動的歷史已經證明，單純的行政性分權只是使企業從原來中央的附屬品變為地方或部門的附屬品，並不能解決企業缺乏活力的問題。相反，由於單純的行政性分權，在保持行政集權體制的總框架不變的情況下，削弱了這種經濟的主要調節者——中央行政機關的調節作用，使地方和部門各自為政和互相封鎖的現象滋長起來，不可避免地導致國民經濟的混亂。為了克服這種混亂現象，又不得不重新集中。於是出現了過去幾十年管理體制上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環現象。這兩年為了在行政性分權基礎上解決失控問題，事實上又在某些方面重現了這種循環。

歷史還證明，不解決政企職責不分這個根本問題，條塊分割、自成體系的問題就無從解決。在國民經濟這個大系統中，數以萬計的企業相互間的經濟聯繫錯綜複雜。無論按“條條”還是



按“塊塊”原則組織經濟，都會人為地割斷超越本地區和本部門的經濟聯繫，而這種聯繫卻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所必需的。多年來，人們曾多次企圖在舊模式框架不變的情況下，改變條塊分割的格局，結果是取消了中央政府管理企業的職能，而沒有改變地方和部門管理企業的老格局。這樣只不過是將大塊塊、大條條切成小塊塊、小條條，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條塊分割問題，相反有時還使矛盾加劇。

第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的市場調節機制，與保留在行政性分權體系中的主管機關指令調節機制並存，使得經濟運行中出現“雙重體制”或“雙重交通規則”，加劇了經濟系統內部的衝突和紊亂。

第二，某些國營大中型企業受到較之過去更嚴的條條和塊塊管束，難以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企業被更低層次的“婆婆”以老的方式管束後，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營運效益也難以提高。

第三，市場被割裂，導致市場活動主體的不合理行為，公平競爭不易開展，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無法向社會有迫切需要和效益最高的部門、地區和企業流動，從而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益的提高。

第四，原有的宏觀調控方法由於行政權力分散而難於見效，新的調控方式又由於統一的競爭性市場未能形成而難以實行。1985年連續開了四次省長會議，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穩定經濟措施得以貫徹執行，這就足以說明，沿着行政性分權的路子推





進，已經使條塊分割達到嚴重損害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地步，很難再往前走了。

現在，我們一方面在理論上十分明確：只有繼續進行改革才是出路；另一方面在實際工作中，一些過去放下去了的權力又正在步步上收。進退兩難，出路何在？從“六五”經驗得到的回答是：改變目前這種按隸屬關係劃分收入的辦法，改為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重新核定各級預算支出範圍的新“分灶吃飯”體制。同時，堅決走經濟性分權的道路，逐步把政府同企業的職責分離開來，把所有權同經營權適當分離開來，使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並在這個基礎上使新的經濟體制配套成龍，逐步完善。

### 3. 不可忽視非經濟因素對改革的影響

經濟體制改革是人們之間利益關係的大規模調整和整個社會生活的革命性變革，它的進程不能不受到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以及社會、政治、文化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

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大國，自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有主要地位。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形成的封建觀念、小生產者意識、殖民地思想以及資產階級思想等等，雖然在三十多年來的革命改造中受到了嚴重打擊，但對人們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近年來，人們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關心較多，而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注意不夠。加之新體制在草創階段漏洞較多，為腐朽落後思想行為的滋長留下了空子。在這種情況下，



往往容易出現舊思想死灰復燃、沉渣泛起的現象，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構成威脅。

黨風沒有根本好轉是妨害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地方，黨組織軟弱渙散，紀律鬆弛，有的黨員幹部不堅決執行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和路線，卻把權力所及之處視為自己的領地，阻礙黨中央準確及時地執行統一部署和統一政策。一些黨員幹部不能發揮模範帶頭作用，甚至忘了共產主義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了私利，嚴重違法亂紀。特別是一些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及其子女辦公司，以權謀私，倒買倒賣，鯨吞人民財富，擾亂國民經濟；有的領導幹部拉幫結夥、用人徇私，打擊了群眾幹四化、搞改革的熱情，激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

幹部素質決定着四化大業的興衰，又決定着改革的成敗。我們的一部分幹部，包括某些領導幹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目標和過程缺乏真正的理解，理論素養和思想覺悟適應不了改革和建設的要求。一部分人士對改革本來就抱不歡迎、不合作的態度，因此看出了一些問題就小題大做；一部分人士對改革有樸素的熱情，但一旦改革真正執行，又覺得不如他們所預料，於是大驚小怪，喪失信心；還有一部分人士熱心改革，但缺少科學的思維和理論的指導，有時不免唐突冒失，把好事辦壞。除了一些與既得利益有關的摩擦外，問題的癥結主要還在於我們原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近年來忙於實際事務，對幹部的教育和培訓抓得不緊、做得不夠。目前，在還沒有很好解決



幹部知識化、專業化的情況下，有些人卻有意無意地否定專業教育背景和文化理論素養的意義，這對於提高幹部素質是不利的。

改革還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消極方面和落後意識形態的阻礙。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民的主人翁意識尚未徹底覺醒。城市改革的根本點是要充分發揮每個勞動者和每個勞動者集體的能動作用。在長期行政指令經濟模式下養成的一切“唯上”習慣，使得有的企業領導在放鬆行政管束後茫然不知所措。在企業內部，也有一些勞動者不夠珍惜或不善於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未能群策群力地辦好社會主義企業。

第二，平均主義阻礙着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平均主義在我們這個農業古國中一直相當普遍和十分頑強地存在着，又在30年的“大鍋飯”制度下被進一步強化，現在仍然是貫徹獎勤罰懶政策，在不同工種、不同勞動表現的人們之間合理地拉開收入檔次的障礙，成為實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方針的阻力。

第三，在傳統社會中形成的“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藏愚守拙，安分隨時”等處事哲學，扼殺了人們敢於冒尖創業的銳氣。這就使得改革中的優秀分子，在其脫穎而出時常常遭到世俗的攻擊和嘲罵。另一方面，對社會上的不良現象，人們又往往採取姑息容忍的態度。

第四，舊社會重官職不重才能，講品位門第不講實際貢獻的腐朽觀念，還在社會上一部分人中間流行，使社會主義的平等觀



念未能普及，某些庸俗腐敗的現象也難於根除。有真才實學之士往往因而不能施展長才，而尸位素餐乃至貪贓枉法之徒也就能夠藉以逃避徹查和懲處。

第五，求穩苟安的思想延滯了銳意進取思想和企業家精神的形成。於是有些人不願離開故土、不願調換崗位，甚至不願因入學深造被分配他鄉。有些企業領導人抱殘守缺，孜孜於蠅頭小利，而缺乏開拓未來的雄心壯志和艱苦創業的韌性戰鬥精神。這種惰性是對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一種毒害。

縱觀“六五”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在當前這個偉大的變革時期，革新與守舊、前進與倒退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種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根本對立的價值觀念，互相衝突。上面講到的這些妨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陳舊腐朽思想，正在為改革的洪流所衝擊蕩滌。千百萬社會主義建設的老戰士在鬥爭中煥發了青春，一代新人正在成長。我們在推進改革，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大力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克服各種陳舊思想和腐敗行為。精神文明不但包括遵紀守法、道德風範，而且要努力在全社會振奮起積極的、向上的進取的精神，克服那種安於現狀、懶惰苟安、懼怕變革、墨守成規的習慣勢力。特別是要痛下決心，整頓黨風，嚴肅黨紀。只有這樣，黨組織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改革指揮部和先鋒隊，使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觀念成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物質文明建設的巨大力量。



## 四、結語

以上所說對於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各自特殊矛盾的正確處理問題，不僅是我們當前研究“六五”經驗的重大課題，而且將是今後長期面臨的挑戰。在“六五”期間，我們對於其中有些關係處理得比較好，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也有一些問題處理得不夠好，得到了不少教訓。所有這些經驗和教訓，只要我們善於學習和勇於實踐，都將成為能夠幫助我們改進工作，爭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大勝利的寶貴財富。對於其中有些問題，還需要探索進一步解決的途徑，設計正確處理的方案。例如：怎樣才能真正把以提高效益為中心的戰略思想落到實處；怎樣籌集到充裕的建設資金，降低資金係數；怎樣加速技術進步，爭取規模效益和有效地配置資源，拉長“短線”，抑制“長線”；如何切實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發揮科學技術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如何改變由“行政性分權”造成的不利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效運行的格局，在企業發揮作為商品經營者的作用的基點上，改善新體制各主要環節的耦合；如何面向國際市場，提高創匯能力等等；所有這一切，都還需要根據“六五”的實踐經驗，在“七五”計劃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加以透徹的研究和妥善地解決。



# 論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給

趙紫陽總理在1月13日的全國計劃會議和經濟工作會議上論述當前經濟形勢和今年的任務時指出：過去一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宏觀控制，消除經濟生活中的不穩定因素，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情況有了很大改善。針對當前經濟生活中仍然存在不穩定因素，同時去年在抽緊銀根、控制貨幣投放上有“一刀切”的情況，他強調今年既要繼續加強宏觀控制，又要特別注意改善宏觀控制；既要控制需求，又要改善供給；既要把超高速降下來，又要在講求效益的基礎上保持適當的增長速度。經濟改革主要是“鞏固、消化、補充、改善”去年已經出台的措施，同時為明年再邁出重要的步子作好準備。緊緊把握住這些要點，對於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是至關重要的。

---

編按：本文由吳敬璉、胡季、李劍閣合寫。原載於《人民日報》，1986年3月10日第五版。



## 一、總的經濟態勢決定了應當採取的方針

1985年下半年以來採取的一系列加強宏觀控制的措施，顯然已見成效，緩解了1984年第四季度以後出現的經濟“過熱”和緊張狀態。但是另一方面，國民經濟目前只是處在由緊變鬆的轉化過程中，並沒有完全鬆弛下來，造成緊張的根本原因也還沒有完全消除。抑制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穩定經濟的任務仍很艱巨。去年7月以後，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的勢頭開始減弱，但總的來說，投資規模仍然超過國民經濟的承擔能力，而且存在重新膨脹的危險。目前正在建的規模大，新開工的項目，要求大量後續投資，特別是去年10月以後，投資規模再度回升，新開項目急劇增加，形成了今後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很大壓力。消費基金的控制要更加複雜一些。行政事業單位工資改革中“翹尾巴”部分很大，企業的消费基金有着許多不可測因素而可能導致再度失控，分配不盡合理、“苦樂不均”現象的存在，以及社會對收入差別的強烈反應等等，都增加了控制消費基金的困難。因此，我們決不能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需求膨脹和貨幣過量投放問題掉以輕心，要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中，繼續保持對需求總量的宏觀控制。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在去年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進入初戰階段、經濟關係還沒有理順的條件下，加強宏觀控制不得不主要採取強化直接的行政控制辦法。採取這種辦法在當時是必要的，但卻難於避免“一刀切”的缺點。而且，它的作用偏重於消極地壓縮膨脹了的需求，卻難於通過提高效益積極地改善供給，少投入、多產出，從而從根本上消除需求膨脹超過供給增長的深刻根源。針對



上述問題，我們要在繼續加強宏觀控制的同時，注意改善宏觀控制，改善供給。

## 二、是“改善供給”，還是“擴大需求”

有的人認為，中國去年下半年銀根過量收縮，應該迅速調整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放寬對需求的總量控制，在增加供給的前提下改善國民經濟的結構。這種意見是值得研究的。

多年來，中國國民經濟一直存在着結構失調的問題。就是說，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部門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規模結構、技術結構等存在多方面的問題，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社會經濟效益受到損害。所以，改善經濟結構始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同時，由於宏觀控制的方法上存在缺點，使一些企業流動資金偏緊，周轉不靈，這也是需要採取措施加以解決的。

問題在於，我們現在應當怎樣來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目前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可以有兩種很不相同的做法：一種是在繼續嚴格控制需求總量的同時，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來調整結構，抑制“長線”，拉長“短線”，改善資源的地區配置，提高規模效益，等等。另一種是在放鬆對需求總量控制的前提下調整結構，即一方面增加購買力去吸收控制中出現的庫存增量，一方面對卡脖子環節增加投入和供給，從而使經濟增長速度上升到新的高度。我們認為，要作出正確的選擇，首先應該分析一下中國國民經濟是否已經或者將會出現如有些人所說的“衰退”。從工業生產看，1985年7月以後增長速度逐月下降，





11月降到8.8%，12月回升到10.2%，今年1月再次降為5.6%。需要指出的是，1984年第四季度增長速度很高，在此基礎上1985年第四季度平均每月增長10%以上，月產水平仍然是不低的。而且，這裏所說的“降低”是指增長速度，而不是生產的絕對水平。因此，我們決不能把這種情況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周期中生產零增長或負增長現象，以及中國1958～1959年和1967～1968年兩次出現過的產值絕對下降現象混為一談，從而得出應當改變宏觀政策的基本方向，轉而採取“反衰退措施”的結論。

當然，從去年9月以來，中國工業的增長平均每月減速超過2.5個百分點，這樣減速是否過猛，是一個要認真對待的問題。然而，即使我們確認減速過猛，也還要具體分析造成這種失常的原因，而不宜簡單地將它歸因於需求不足。應當看到，中國經濟至今還是資源約束型的，有效制約因素是資源“短線”，如電力、動力、原材料不足；而不像西方的市場經濟國家那樣，是需求“短線”，即購買力不足。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抱着儘量把發展速度搞得高一點的思想。因此，普遍“過冷”決不是主要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在年度計劃還是在中期計劃的執行過程中，一旦真正出現需求不足的苗頭，採用適當增加貨幣供應或其他辦法使速度保持在適當水平上，是容易做到的。

解決資源短缺而造成的增長率下降的問題，卻要困難得多。由於“短線”完全繃緊造成的部分生產力閒置，既不能靠多發鈔票、增加需求來解決；在外匯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也不能靠大量增加資源進口的辦法來解決，而只能在增產短缺資源的同時，靠改善現有資源的利用



狀況來補救，這就要改善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中國在過去三十餘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表明，在“過熱”的情況下，結構矛盾暴露得比較明顯，但由於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都被繃得緊緊的，此時要解決結構矛盾就有相當大的困難。這是因為，要改善經濟結構，就要貫徹執行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具體來說，就是從重速度、輕效益的“趕超戰略”，轉向在重視效益的前提下速度比較實在、使人民能得到更多實惠的戰略；從片面發展重工業和直接生產能力的不平衡戰略，轉向有重點的協調發展戰略；從依靠增加投入、以外延擴大再生產為主的戰略，轉向依靠投入產出率提高、以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的戰略；從過去的互通有無、調劑餘缺、以進口替代為主的對外貿易戰略，轉向利用國際分工、參與國際競爭、提高國內產業出口創匯能力、促進國民經濟有效益的增長的戰略。以上這一切，只有在控制增長速度和經濟環境相對寬裕的條件下才能做到。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過大的基建規模使投資效益大大下降；過高的增長速度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益和營運效益，對規劃經濟、企業經營管理和技術進步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過份強調近期建設速度，也使科技和教育事業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所以我們贊成這樣的提議：要把緊縮變成一種資源，緊縮出效益來。從這個角度看，今年年初以某些大城市工業生產負增長所反映的地區結構惡化趨勢，倒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有的人把當前需求膨脹尚未完全控制住、供給增加不多的情況和西方國家前一時期出現過的“滯脹”現象相比擬，認為應當用增加購買力的辦法來加以防止。其實，即使國民經濟真的出現了“滯脹”，



採取人為地擴大有效需求的辦法來支持經濟的增長，也決不是扶正祛邪的良方，卻只是飲鴆止渴的下策。一些西方國家的戰後經濟發展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滯脹”的重要原因，在於它們在一段時間裏採取錯誤的“反衰退”政策。這種政策的特點是，用通貨膨脹來彌補有效需求的不足，它雖然維持了一時的繁榮，卻因為抑制了效益的提高，不得不乞靈於劑量愈來愈大的“興奮劑”——通貨膨脹，從而使經濟愈來愈深地陷入“滯脹”之中而不能自拔。我們的經濟發展要以增進效益為中心，而不是以提高速度為中心，我們也就不能一般地“增加供給”，即不問效益的提高增長速度，而是應該“改善供給”，即在提高效益的基礎上使供給得到改善。

### 三、是“放鬆總量控制”，還是“改善宏觀控制”

有的人認為，當前某些企業流動資金短缺，表明貨幣供應總量不足，要求全面放鬆銀根。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目前從社會看，貨幣供應量並不是偏緊，而是偏鬆。去年現金淨投放雖然控制在計劃規定的指標範圍內，但其中包含着外匯佔款減少、農產品超儲佔款減少等非經常性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貨幣供應總量的信貸總規模已大大突破了原定的增長限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普遍放鬆銀根，就會加劇社會總供給同社會總需求不相協調的態勢，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十分不利。某些企業煽動資金出現短缺，有以下兩個不可忽視的原因：1.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留下了配套流動資金的“硬缺口”；2. 信貸管理上的漏洞，使某些社會效益不好、甚至沒有正當業務的



“皮包公司”，擠佔了應當補充流動資金的企業的貸款份額。所以應在保持對投資和信貸總額的嚴格控制的前提下，有區別地增加對一些經濟效益好，又確有需要的企業流動資金貸款。

應當看到，在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下，並不存在自行收縮的內在機制。建國以來，中國國民經濟曾出現過的幾次“經濟過熱”，都是採取急煞車的辦法解決的，結果是經濟大起大落，損失很大。這一次採取“慢煞車”的方針，震盪烈度較小，不是大起大落，而是小起小落；不是一次解決問題，而是逐步緩解，因而需要假以時日。總體來看，每次“經濟過熱”，都是通過行政辦法的外力作用來解決的，而行政決策又是在資源約束的強制下作出的。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實踐告訴我們，由於舊體制內在的追求產值速度、投資飢渴、數量擴張的傾向，要將經濟速度在短期內搞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即使在“短線”部門已經完全繃緊，全靠過量進口或寅吃卯糧的辦法勉強支撐的條件下，也是一件並不需要大力動員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相反，要把過高的速度壓下來，要使“過熱”的經濟適當降溫，勢必要觸動各個局部利益，因而常常是處理上頗為棘手的事情。特別是近幾年形成的部門和地方行政性分權的格局下，條條塊塊的各種利益同經濟增長速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很容易在全國範圍內颳起“熱風”，互相攀比高速度；相反地，卻不大容易出現全面冷卻，因而導致生產萎縮的情形。

總之，針對這種情況，我們的對策應是改善宏觀管理，而不是放鬆宏觀管理。我們知道，擴張衝動、投資飢渴等等，都是內在於舊體制之中的弊病。建國三十多年來，我們已經吃夠了這種體制造成的“膨脹——緊縮”循環的苦頭。所以回到舊體制去決不是出路。去年上



半年在需求失控的情況下，恢復某些行政直接控制的辦法，的確在短期內取得了較大的成效；然而，這種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經濟的活力，因而不利於從根本上改善供給和徹底消除經濟中的不穩定因素。看來，要改善供給，重要的是在加強宏觀控制的條件下改善控制的方法，逐步由以直接的行政控制為主轉到以間接的參數控制為主。而這一切，則是要通過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來實現的。

今年在經濟仍然偏緊的條件下，改革要邁出大步，自然是不可行的。但是，今年的改革也不能完全在原地“踏步”。在過去幾年的改革中，對於改革的配套要求注意得不夠，使微觀經濟的放開放活和宏觀經濟的管住管好都受到影響。我們必須及時對這種缺點加以補救，使新的經濟機制成龍配套，儘快地發揮效益。為此，首先要對去年已出台的價格、工資等改革進行鞏固、消化的工作。此外，在改善固定資產投資控制方面，要清理在建項目，調整投資結構，還要加速流動資金周轉。在金融體制方面，要圍繞增加儲蓄、改進服務、合理使用信貸資金等問題進行改革。在增加企業活力方面，要調減大中企業的調節稅，提高它們的折舊率，使這些骨幹企業具有自我發展的活力；同時，要大力促進跨地區、跨部門的橫向經濟聯合，促進企業組織結構的合理化。

#### 四、力爭明年邁出重要的步子

今年在改革方面具有長遠意義的工作，還在於理論研討、方案設計、幹部培訓、組織建設等方面作好進一步改革的準備，保證明年較大的措施能夠順利出台。



明年應當有哪些配套改革的措施出台，要根據對現行體制的狀況的分析、進一步改革的需要以及客觀條件提供的可能，進行周密的設計。例如，我們可否設想，在經濟體制的三個互相聯繫的方面配套地出台這樣一些改革：

第一，進一步完善競爭性的市場體系，是保證企業自主經營活動經常處於宏觀約束之下，以及使宏觀調節措施能夠通過市場對企業發生作用的根本條件。首先，應當盡可能理順經濟參數（包括商品價格、稅率、利率、匯率等），改變這些參數嚴重扭曲的狀況，同時也使造成目前分配不合理、苦樂不均的重要原因得以消除。目前，生產資料價格扭曲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應當在條件成熟時，區別不同產品，採取價稅聯動的方式，對它們進行改革。不過，僅僅調整或放開價格，並不足以使價格信號成為引導企業改善經營的有力槓桿。為了做到這一點，還必須精心組織健全的市場體系，建立正常的市場秩序。

第二，增加企業的活力，提高它們的財務預算約束的硬度，對於創造宏觀調節的微觀基礎和改善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有決定性的意義。除增強大中型國有企業獨立經營、獨立核算的地位外，對於小型企業，在創造多種自主經營形式方面，也有許多文章可做。

第三，從宏觀調節體系看：1. 可以考慮在陸續開徵土地使用稅、資金佔用稅等新稅種和調整舊稅種的稅則、稅率的基礎上，實現由財政“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體制，向按稅種劃分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重新核定各級財政支出範圍的財政體制過渡，打破行政性分權的格局。2. 在金融體制方面，可以考慮在增強基層銀行獨立經



營、獨立核算地位的基礎上，逐步加強利率在調節資金供求中的作用，同時強化中央銀行的管理和調節職能。

如果我們能在鞏固去年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在明後年順利地邁出新的重要的步子，我們的新經濟體制就能大大地改善，社會主義經濟所固有的生氣與活力也會更明顯地煥發出來，這將使我們贏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然而我們在期待這一勝利到來的時候，必須牢牢記住：改革的步子愈大，它對經濟環境的要求也愈高。我們是否能夠在明年順利地邁出重要的步子，要以我們在今年能否加強和改善宏觀控制，使經濟環境繼續向寬鬆的方向變化，為邁出這一步而積蓄足夠的力量。我們應當努力工作，為實現這一艱巨任務而奮鬥。



# 現代化需要企業家和 企業家需要的改革

作為當代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企業家階層，歷來是推進各國現代化的中堅力量。中國當前以促進現代化為目的的經濟體制改革，它的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造就一支宏大的企業家隊伍。而社會主義國家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自上而下的社會經濟改革，如果得不到企業家階層的支持和回應，就難以深入並取得最終的成功。改革在呼喚着企業家。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培育和造就企業家階層對於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是，我們的現代化事業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企業家階層？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卻有相當大的差異。一種觀點認為，企業家必須是財產所有者。因此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只有私人企業的老闆和鄉鎮企業的承包人才有可能成為企業家。至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大中型企業，則只有在實行私有化或租賃、承包經營的前提下，才能從中湧現出大批企業家來。

---

編按：本文由吳敬璠、劉吉瑞、李劍閣、張軍擴合寫。原載於《世界經濟導報》，1986年12月22日第14版。





由於在中國原有的所有制結構中，政府直接經營的國家所有制經濟極為膨脹，私人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公私合營的和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形式發展嚴重不足，在改革中需要調整結構，擴大非國有成分，包括將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改歸私人和集體經營。在個體和集體經濟大量出現的情況下，如果其他條件具備，無疑會從中產生出一大批中小企業家。問題是在作為中國工業骨幹的六七千個國家所有大企業中，如何培育出具有社會主義商業文化觀念的新型企業家。如果前述理論是正確的，要使我們的企業負責人成為企業家，就必須實現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或集體所有化。只要繼續保持國有制，國營企業的經理（廠長）就不能成為企業家，他們只能在現代化進程中居於次要的或被動的地位。

我們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為它既不符合各國企業組織形式發展的歷史現實，也與中國的主客觀條件不相協調。

誠然，在英、美等國經濟發展的初期，所有者和經營者是合為一體的，小業主和資本家直接經營企業。但自 19 世紀下半葉以來，老闆直接經營的工場和家族企業日益衰落。財產權和經營權分離，由互相制衡的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經理組成的股份公司成為現代工業社會最為基本的組織形式。經營者階層（包括董事和經理）不是憑藉所有權，而是憑藉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和才能取得了管理企業的充分權力，成為企業家階層的主體，而單純的所有者只是股息和紅利的追求者。就現代經濟組織的一般形式而言，企業家非資本所有者。

根據以上的分析，社會主義企業經營方式改革的基本任務和主要方向，是在公有制的基本框架下，尋找財產權與經營權分離、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組織形式，而不是簡單地將現有的國家所有制企業



租賃、拍賣，化公為私，然後再跨第二步，走西方現代企業兩權分離的道路。同時，戰後相當數量的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經驗也已證明，私有化並不能保證企業家的迅速成長和國民經濟的最優發展。因此，決不應把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形成推到所謂“落實財產關係”以後，推向遙遠的未來。

人們也經常把那些受到行政權力支持和庇護、享有特殊優惠，或者由於運用各種非正當手段包括金錢賄賂得到低價物資供應、官價外匯額度、減免稅賦或其他好處，因而獲得巨額盈利的企業的領導人稱為企業家，這就更加錯誤了。他們之所以發財致富，靠的不是經營管理的本領，而是依靠特權，依靠不平等競爭。因此，他們稱不上是企業家，充其量只是行政權力的附庸和受惠者，其中有少數人甚至是侵吞國庫自肥的蛀蟲。

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企業家，應該具有以下特徵：

一、作為發展商品經濟的主角，不是縱向從屬於行政權力，而是遵循和服從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靠善於經營和勤於管理開拓自己的事業。

二、擁有現代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的知識和才能。他們必須是經商辦實業的專門家、創新精神的體現者。

三、獨立自主地經營企業，不僅擁有企業生產什麼、怎麼生產、為誰生產的基本決策權，而且對生產要素進行新的組合，開發新產品、採用新工藝、開闢新市場、獲得新原料、建立新組織，以不斷的技術和制度創新推動社會前進。

四、他們的行為受社會主義商業文化的引導和制約，這種商業文



化包括一整套適應商品經濟發展需要的價值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具體來說是：以增加企業利潤（既包括對有效經營的報告，又包括風險報酬）為榮；建立在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基礎上的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獻身精神，信奉機會平等和自由不可侵犯，不求做官、誠實經營、廉潔奉公，以敬業為樂趣的態度對待本職工作和人際關係，重承諾、守信用、履合同，如此等等。

雖然在私人經營發展較快的地區（如溫州）、在部分鄉鎮企業中、在極少數的國營企業中，已經產生了一些企業家，可是從整體來看，上面所說的中國現代企業家階層至今尚未形成，特別是其中的骨幹力量——立足於國有大中企業的企業家——力量微薄，根源要從中國不發達的經濟社會政府文化結構中去尋找。

中國在歷史上曾幾度出現過商品貨幣經濟繁榮發達的局面，如春秋、戰國、唐、宋等。明、清時期出現了市民階層。但是，中國的封建主義文化發展已到了既牢固又精巧的高度——封建專制政權或者對市民階層橫加摧殘，使商品貨幣經濟花敗葉落，甚至枝枯根死；或者以收歸官營、官督商辦一類辦法，使之成為封建主義社會結構的附庸。在夾縫中生存的商人市民階層十分脆弱，要麼投靠封建官員尋求庇護，要麼成為他們魚肉的對象。本世紀上半葉，在一些主要城市中逐漸湧現了一批自主自立、非官僚（或者已經擺脫了舊羈絆並從官僚地主階級脫身出來）的企業家，正是他們和勞動人民一起推動了中國現代產業的發展，創造了二次大戰前後上海、香港等華人社區經濟發展的“奇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本來應為企業家階層的發展壯大開闢廣闊的道路，但是由於“左”的錯誤，舊的企業家並未能改造成社會主



義的企業家，他們大多在政治運動中消失，即使留存下來的，企業家精神也所餘無幾；在國營部門，本來以政府定價、指令性計劃、實物調撥為主要內容的各種行政干預，已使中國長時期地只有工場而沒有企業，對“專家治廠”的一次次批判，更使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由技術專家組成的“準企業家”階層也難以產生。

重“義”輕利、重官輕商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現代形式，引導人們一齊向官看，追逐權力、地位，這是企業家階層形成的又一障礙。傳統文化根深蒂固，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人們的心靈，能將外來的現代文化意識同化改造。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連本應開風氣之先的知識分子中，奔走於官僚門下，追求一官半職的也大有人在。歷史上甚至不乏為皇權統治和暴民專政出謀劃策的文人墨客，卻絕少有為商人、企業家請命的大家鴻儒。這種民族性上的缺點，既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孤掌難鳴、“兩敗俱傷”的悲劇，也延緩了整個民族經濟和文化振興的進程。

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商業活動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和維護。西方國家在古代已經出現了調節商品交換中各種利益關係，比如被馬克思稱為“商品經濟的第一個世界法”的羅馬民法。而中國卻是一個人治的社會，無法治的傳統，這不能不影響企業家的形成。實際上，中國維繫官僚政治的刑法是相當嚴密和發達的，但歷代卻一直沒有一部調節民事關係的健全的民法。在這種情況下，商人企業家的基本自由權利就得不到法律保護，只得仰承行政官僚的鼻息，從而終難逃脫遭受摧殘的厄運。

1979年以來的改革運動就是要徹底改變上述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格局，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社會主義企業家階層的成長創



造社會前提。中國企業家的命運同改革聯繫在一起。現有的和未來的國有大中企業的領導人，將通過這次改革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現代企業家的中堅。但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界人士不能被人推着走，必須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積極主動地參與改革，明確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由黨和政府領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了企業界人士的支持，就擴大了它的社會基礎，獲得前進的動力。這樣就能從根本上排除重新退回到傳統體制的可能性。

那麼，企業家需要什麼樣的改革，或者說企業應該爭取什麼樣的改革呢？

首先，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者也可以稱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是企業家得以大批產生的土壤，演出威武雄壯話劇的舞台。堅決支持和推進以取消指令性計劃等直接行政控制為基本內容、以形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基本方向的經濟改革，是企業界人士的根本利益所在。

應當指出，直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指令經濟和商品經濟兩種體制仍處於對峙狀態，而且舊體制還佔有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使新體制全面建立，發揮主導作用，是企業家階層得以成長壯大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們需要為之奮鬥的基本目標。

在目前，這種雙重體制並存、舊體制佔優勢的狀況下的突出表現，一是在生產計劃、物資分配、定價制度方面採取“增量改革”辦法，形成指令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並存的雙軌制；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的進程發生“中梗阻”，變成了由“條條”或“塊塊”行使過去由中央行使的決策權，形成“行政性分權”的局面。這二者都意味着行政權力對應由企業家全權處理的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同時極大地妨礙



了企業間進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的形成。在這種情況下，縱有千般經營本領，也難敵行政領導一紙命令、一張“批條”。因此，經常是有特殊地位，或者有辦法、有路子取得特權者得益，而有經營才能的企業家反而無用武之地。

面對這種情況，有的企業界人士企圖在打破上述制度的條件下，用爭取自己得到更多特殊優惠的辦法來改善自己的處境，發展自己的事業。例如，爭取享受某些特殊政策、減免稅賦、增加補貼，爭取較低的計劃指標、較多的調撥物資、更多的低息貸款等等。其實這並不是一條真正企業家應當走的道路。因為這樣做，即使本單位短時間內得到一些好處，發展得比較快，卻失去了企業的本色，只能敗壞企業負責人作為真正企業家的品質，使得他們成為靠行政長官恩賜度日的政治附庸。更何況一家企業所得的正是別家企業所失，損害了競爭性市場的形成，也就從根本上破壞了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的形成條件。

當然，企業界人士應該有自己的經濟利益追求。由於企業家是社會精英，是不發達經濟中最為稀缺的資源，所以根據供求規律，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其薪金和報酬水平應超過行政官員，應在社會各階層中居於領先地位。不過作為不同的個人，他們的收入是與所在企業狀況相聯繫的，是因人而異的。經營失敗的人將受到降薪、解雇、身價貶值，甚至失去企業家資格等的懲罰。

目前改革的某些具體做法，是與上述關於改革的基本目標不完全協調的。它們除包括行政性分權和形形色色的“雙軌制”外，還有給各級領導批准和“蹲點”的試點單位“吃偏飯”現象，給某些部門、地區、某部分企業減稅之類的特殊政策優惠等等。這些做法都是不利



於企業家階層的形成。之所以要反對這些做法，是因為它們違背了商品經濟對所有的買者一視同仁、讓所有的生產者在統一市場上公平競爭的基本原則；而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按權力、身份分配物質利益的等級制原則的影響，例如，同質產品按不同價格賣給不同的對象，對不同類（包括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不同等級的領導人的“點”等）的企業採取不同的稅率，就等於把它們分成三六九等。這是一種公開的、制度化了的、政治的或等級的歧視，不僅為商品經濟的基本價值觀念所不容，而且直接違背了任何一個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都必須具有的公平競爭和反壟斷的基本立法。雖然有些措施是以“改革”的形式出現，但決不是企業家所需要、所應爭取和支持的。

總之，為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企業家階層發展壯大，當務之急在於爭取企業家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的權利，和進行平等競爭從而得以大顯身手的市場環境。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在企業組織、計劃方式、價格、財政稅收、商品流通、銀行信貸等方面邁出全面改革的步伐，有步驟、分階段、同時又是同步配套地推進改革。單項突出、互不銜接的局部改革，和採取五花八門的特殊政策的“改革試點”，都不能發揮新經濟機制的整體功能；而只能使經濟體系中的摩擦和漏洞增加，使各種貪污腐化、以權謀私、侵佔國家財富的行為蔓延滋長。正直的企業家必須反對這種行為，防止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出現過的那種以金錢賄賂潤滑的官僚特權經濟在中國出現。

其次，要積極推行價值觀念的調整更新，促使社會主義商業文化的早日形成。關於社會主義商業文化的內容，前面已經說到，這裏需要指出，它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緊密相連的，基本要旨有二：一是每個



人都可以在法定的活動範圍內獨立自主地作出決策；二是每個人必須對自己的決策後果負全部責任。企業界人士有了這樣的觀念，則既會因為受到行政束縛和各種歧視而作出抗爭，也會因為享受行政主管機關的特殊偏愛而感到羞恥。這種價值觀念的完全建立固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但必須讓這種文化價值觀念逐步滲透到中國經濟和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指導企業和個人行為的準則。

上述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經濟政治原則和新型商業文化，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來保證。一紙法律固然不能創造出現實的經濟社會關係，但已經更新的經濟社會關係一經法律確認，就具有更強大的約束力量。

中國企業界人士還應該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反對和肅清封建主義宗法思想的影響。當前的重點可放在確立民主思想和爭取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在政治、思想、人身等方面的自由平等權利上。這並不是要求企業家棄商從政，離開了企業這個基本陣地，企業家也就不成其為企業家了。企業界人士要做的是聯合起來，爭取公平競爭的條件，並逐漸使企業家階層崛起成為一支支持改革、推動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在未來的中國政治社會格局中，一個由勞動人民的先進代表，包括堅持改革帶頭推進現代化的政治家、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的知識分子和以大中企業的經營者為骨幹的企業家階層聯合形成的精英集團將發揮主導作用。作為社會中堅的企業界人士，應該積極發展這種大趨勢，大力促進中國現代化大業的實現。而企業家階層也將經過改革的洗禮，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不斷成長壯大，真正成為掌握自己命運、主宰社會未來的重要力量。





# 試析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

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已故的毛澤東主席曾經對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救國運動作過歷史性的總結。他指出，鴉片戰爭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曾經不惜艱苦奮鬥，尋求革命真理。在反覆的試驗遭到失敗以後，經過俄國人的介紹，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與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毛澤東主席確信：“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sup>1</sup>

在那以後的幾十年間，我們在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領導下，循着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走過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成績如何

編按：本文由吳敬璉、李劍閣、丁寧寧合寫。原載於《管理世界》，第1期（1987）。

1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60）。



呢？應當說，成就是空前巨大的，同時，也有不少錯失。特別是50年代末期以後，“左”的思想愈來愈佔居優勢，終於釀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災難。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痛定思痛，人們深切地認識到，僅僅取得革命的勝利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權並不足以保證中國現代化建設“計日程功”<sup>1</sup>地順利實現。除了政治、文化等複雜的非經濟因素外，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取決於是否有一個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生機和活力充分發展的經濟體制及一套能夠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發展戰略。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家在1979年至1981年期間做了大量的工作，總結建國以後30年的經濟建設經驗，規劃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路。<sup>2</sup>

按照這種新的路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兩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展。這些成就說明，這條新路子的總方向是正確的。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窮盡了真理，對於應當如何回答時代的挑戰，認識得十分清楚了。相反，近年來我們遇到的種種問題和工作中的不少失誤說明，在這方面還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

1 毛澤東對新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作如下的估計：“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加上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蘇聯的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是可能是相當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參中國共產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49年3月）。

2 1979～1981年間的研究，產生了許多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一部有代表性的文集，如馬洪、孫尚清主編的《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和一大批關於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論著。



1984年下半年，中國國民經濟在高速運行中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針對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中國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並取得了有益的成果。通過這一階段的討論，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無論是對於大好形勢，還是對於潛在的問題，用短期的和偶然的因素加以說明，都只能給人以似是而非的滿足；由此制定的政策措施，也難免出現左右搖擺，前後矛盾的情況；必須把當前的問題放在更廣闊的社會經濟變動的背景下和更長遠的發展過程中進行考察，才能透徹地認識到它們的意義及其成因，也才能找到既能解決當前問題，又有利於長遠發展和符合體制改革的總體方向的妥善對策。這篇文章想就這些問題談談我們的初步看法，並結合理論界已經提出的若干相關觀點作一些比較研究，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探討。

## 一、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特性的幾種理論分析

目前，經濟理論界對經濟發展階段的系統論述有三種很有影響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可以叫做“雙重模式轉換論”。持這種觀點的作者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生活已經經歷了並將繼續經歷多方面的深刻變化，可以歸結為兩種模式的轉換，即發展模式的轉換和體制模式的轉換。一方面，在經濟發展戰略上，要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老一套做法，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另一方面，隨着發展戰略



的轉變，在經濟管理體制上，也要由過去過分集中和排斥市場機制的體制轉變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經濟體制從屬於發展戰略，但兩者又是互為條件、互相制約的。不可能指望兩種模式轉換在短時間內完成，它們是非常曲折複雜的、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實現的過程。傳統模式和傳統觀念的慣性，能上難下的利益剛性，以及轉換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都會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所遇到的許多矛盾，都是由於這種雙重轉換的不協調引起的。<sup>1</sup>

第二種觀點可以簡稱為“經濟發展典型化”理論。持這種觀點的人，根據H·錢納利關於經濟結構“常態樣式”(Normal Pattern)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同錢納利的“大國樣式”有相當大的差異，表明它是一個“非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是“非典型”的經濟正在“典型化”：經濟結構與典型的中等收入大國的差異正迅速縮小；推動國民經濟宏觀結構演變的典型主導產業已經初步形成；技術基礎正得到全面的變革與改造，使社會經濟效益的普遍提高成為可能；進出口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商品市場結構趨於合理；金融活動加強；消費水平迅速提高；城市進程加快；生產力布局迅速改善。他們從這種“典型化”趨勢中，引伸出中國正處在高速增長的發展階段。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與“典型化”的發展趨勢相一致，而不是人為地抑制增長速度和持續提高消費需求，破壞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

---

1 劉國光：《略論兩種模式轉換》，《世界經濟導報》（1985）；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同時並存這種高速度成長時期的“典型特徵”，而是使一切政策措施有利於增長，以便“用增長引起增長”，加速度地實現我們到本世紀末總產值翻兩番、達到小康的目標。<sup>1</sup>

第三種意見是“以結構變革為中心的新成長階段”理論。持這種觀點的人們認為，中國近年來成長的加速，主要動因乃是由居民、首先是農村居民收入激增引起的消費需求激增。由於從總體上看，消費已經走出以滿足溫飽為中心的必需品消費階段，中國國民經濟的成長發生了質變，它已不再靠低層次消費來推動，而開始進入了非必需品急劇上升的新消費時期的新成長階段。1984年下半年出現的不正常現象，其根源與其說是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總量失衡，不如說是供給（生產）結構同需求（消費）結構不相適應。<sup>2</sup>克服新成長階段諸種矛盾的關鍵，在於改變中國經濟流程的特性，使居民和企業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大上升，從而一方面引起居民和企業的儲蓄迅速擴張、銀行和其他金融手段在積累形成和使用中的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居民消費份額得到提高，非食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比重上升，加大消費市場對創造新國民收入的連帶作用。這樣就能夠消除消費與積累的絕對對立，創造協調中國經濟結構的物質基礎。<sup>3</sup>

---

1 朱嘉明：《論我國正經歷的經濟發展階段》，《中青年經濟論壇》，第2期（1985）；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和農村發展》，《經濟研究》，第7期（1985）和《論國民經濟結構變革》，《經濟研究》，第5期（1986），也廣泛運用了錢納利的方法。

2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1985 年文。

3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1986 年文。



上面三種意見分別從某一特定角度概述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性質和特點，它們都以其獨到的分析給我們以啟迪。但是在我們看來，這三種表述都還不夠本質。我們認為，近年來中國發展的加速，表明中國的國民經濟正在進入從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並存的“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加速轉變的時期。我們當前所面臨的種種撲朔迷離的經濟問題，都可以從這一時期必然會存在的基本矛盾中找到它們的總根源。而1984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學界對經濟發展中的某些異常現象所進行的爭論，無不起源於對這些矛盾的不同認識。

以下，我們將首先對前三種意見分別作一簡要的評論，然後再來陳述我們的看法。

## 二、“雙重模式轉化論”對我們的啟發以及深化認識的必要

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們在中長期需要實現的任務，從政策上說，主要是進行發展模式的轉換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兩項，而它們二者又存在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關係。我們在處理日常政策問題時面對的種種具體問題，往往與這兩項基本任務之間的相互聯繫與牽制有關。所以應當承認，對於雙重模式轉換過程中矛盾的分析，是探索中國當前這個歷史階段經濟發展基本特性和深層矛盾的有益嘗試。這種分析在它所論述的層次，即當前中國面臨的兩個基本課題的相互關係問題上，確實是富有啟發性的。不少作者，包括我們自己在內，在分析經濟成長和體制改革兩者關係時，也採取了同樣的分析方法。我們在這裏想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在更深的層次去看這兩種模式的轉換，就很



難對我們當前遇到的錯綜複雜的經濟問題作出透徹的說明，甚至對轉換的動因、途徑和速度以及雙重轉換之間的本質聯繫，也很難論述得充分。這是因為，無論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是經濟體制模式的改革，都只是領導機關為適應一定的客觀需要而採取的對策，它們之所以必要是由於一個共同的原因，這就是舊的模式明顯地不適合當前歷史階段經濟發展的要求。可見，雙重模式轉換本身的深刻根源還在於一定歷史階段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不能不受到所論國家與此相聯繫的諸種條件的制約。因此，如果不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當前發展階段中面臨的基本挑戰作深入的分析，就不可能對具體的經濟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論述。例如，劉國光先生在前論著中，對中國當前的發展模式轉變和體制模式轉變作了很好的分析，揭示了發展模式轉變的基本內容和它對體制模式轉變的要求，提出了雙重模式轉變需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等重要原則問題。可是在我們看來，由於對雙重模式轉變的總的背景，即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分析不足，使整個論述出現以下疵點：1. 對進行這兩重轉變的客觀依據的論述有些一般化。作者給人的印象是，它們之所以需要轉變，乃是源於使“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一般政策要求；而沒有能夠從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客觀上存在的基本矛盾出發，來論證實現發展戰略轉變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迫切必要性。特別是作者在關於“‘一五’時期的經濟發展戰略是正確的”，以及當前的戰略轉變只是“撥亂反正”，“逐步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的論斷，就更容易使人們由於缺乏歷史感而對事情的重大意義和緊迫性認識不足。2. 把擴大再生產由“外延方式”向“內涵方式”轉變，確定



為發展戰略轉變核心內容和經濟改革的主要依據也有不盡恰當的地方。蘇聯、東歐和部分經濟學家在論證發展戰略轉變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時，常常把勞動力資源的匱乏和國民經濟增長必須向內涵方式轉變作為主要的論據。但是，中國和蘇聯、東歐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中國農村中存在大量潛在的過剩勞動力，因而某些經濟部門的外延式發展仍然是必要的，而不宜於從提高經濟效益的一般要求出發，簡單移用蘇聯、東歐國家必須實現國民經濟的全面集約化（內涵化）的主張。<sup>1</sup> 3. 對創造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的必要性的論證，也顯得不夠有力。作者強調指出，市場作用的正常發揮以存在有限的買方市場為前提，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改革的進行，需要一個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這些都是十分正確的。然而，創造寬鬆的經濟環境的問題在當前之所以表現得十分突出，並不是由於雙重模式轉變的同時進行，而是由於我們正處在從落後的農業國向工業國邁進的過程中，“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急速轉化、經濟建設的展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這一切無疑會在一定時期中造成總需求膨脹的壓力和資金短缺的形勢，與創造

---

1 以上均見劉國光先生前論著。我們注意到，《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第三章的以下論斷：“不可否認，在中國，實現從處延為主向內涵為主的轉變，遇到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妥善地解決勞動力的安排和就業問題”。針對這個問題，作者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在新建企業，除了必不可少的資金密集的現代化企業外，應當盡可能發揮勞動密集的行業，實現生產的外延擴大；而現有企業中，則應主要透過技術改造實現經濟的內涵式增長。”可是作者對這個富有啟發性的論點，沒有進行展開的論述。





寬鬆的環境的要求發生矛盾。這樣，僅僅分析雙重模式轉化之間的關係，而不分析當前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就很難對當前緊張的經濟環境的成因作出透徹的分析，也不容易對改變這種狀況的戰略和策略安排作出科學的論證。事實上，針對“兩種模式轉換論”，一些人提出，體制改革時期，應當促進經濟的高速度增長，而不必保持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在一個發展中國家，保持經濟的高速度成長對於實現現代化，以至對於經濟改革本身，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在這樣的國家裏，需求過旺和經濟繃緊現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企求在造成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以後再來進行改革，就無異於將它推向無限遙遠的未來。另一些人提出，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世界上並不乏這樣的先例。因此，在中國只要改良傳統的計劃工作方法，調整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無須觸動傳統的經濟體制，照樣可以高速度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儘管上述兩種說法都有着比較明顯的漏洞，但前一階段討論的情況已經證明，僅僅從“雙重模式轉換”來對它們進行反駁，是不夠深刻，因而也是不夠有力的。

### 三、H·錢納利的“常態樣式”的意義及其局限

在根據經驗資料進行發展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學家中，H·錢納利和他的合作者是具有廣泛影響的。他們依據上百個國家多年的經驗資料，歸納出人口超過四千萬的大國、着重初級產品出口的小國和着重



工業品出口的小國等三個類型國家經濟結構的“常態樣式”。<sup>1</sup>由於任何認識都要經過特殊——一般——特殊的循環往復，通過特定國家經濟結構與“常態樣式”的比較發現各國的特點，以便為進一步的分析提出問題和打下基礎，顯然是有益的。誠如一篇討論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論文所說，通過個別國家經濟結構同“常態樣式”的比較來認識各國經濟發展的個性，從而為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和評價提供有益的啟示。<sup>2</sup>

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運用錢納利的“常態樣式”作標準進行比較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只是“個別”對於“一般”的偏離狀況的現象描述。這種描述，即使表現為精確的、量的規定，也並未告訴我們產生偏離的原因，更沒有回答這種偏離是壞是好、為禍為福的問題。由於現象並不是直接同本質合而為一的，如果企圖從現象直接導出規律，就難免發生理論上的偏差。正因為這樣，有些發展經濟學家認為H·錢納利及其合作者由這種對比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失之於武斷。<sup>3</sup>

其次，錢納利採取的主要是“橫截面”的方法，這種方法不能代替發展階段的研究。正如光憑大樹的直徑不能確切地判斷它的高度一

---

1 H·錢納利的方法，首先是由世界銀行1985年的調查報告《中國：長期發展問題和可選方案》介紹到中國來並廣泛傳播的。據報告的主要設計者、考察團副團長A·伍德告訴本文作者，他在寫作報告提綱前，用了很多時間研讀H·錢納利的著作，以考慮報告如何提出問題。

2 中國農村發展組1985年文。

3 譚崇台：《發展經濟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樣，不研究一國經濟在所處發展階段上的特殊矛盾，就難於判斷哪些結構“偏離”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從而得出正確的實際結論。

因此，我們覺得一些作者把H·錢納利的模型作為標準結構，認為偏離這種結構就是“不正常”的，而向這種模式靠近則意味着“恢復正常”和高速增長階段的到來，這種分析方法是相當表面的。不對中國的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籠統地要求“消除”偏差，實現“典型化”<sup>1</sup>；或者緩解偏差造成的消極影響，並不一定能夠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好處。事實上，造成中國經濟結構對所謂“常態樣式”的偏離，主要有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因素：一是由違反社會分工和工業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盲目蠻幹引起的結構扭曲；二是由於資源條件和其他具體國情決定的結構特色。對於前者，“偏離”是一種禍害，“典型化”是向合理的趨近。對於後者，“異常”卻是正常的表現，今後仍將繼續存在。

這裏還要順便指出，哈佛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N·吉利斯、D·珀金斯、M·羅默爾和D·斯諾德格拉斯早在1983年就在他們合著的一本目前美國大學通用的《發展經濟學》教科書裏，對錢納利等人的計算結果可能的誤解和誤用，提出過警告。他們指出：錢納利及其合作者常常把他們估算出來的趨勢，稱為大國或小國經濟發展的“常態樣式”。“常態樣式”這一用語促成了對這種估算結果的大量誤解和濫用。錢納利等的“樣式”只不過是比較千差萬別的經濟結構樣

---

1 即使我們把平均結構看成典型結構，仿照E·F·舒馬赫“Small is beautiful”的句式，作出“典型就是美”的論斷，它是否能站得住腳，也還是有問題的。



式後得出的平均結果。這些資料和計算只能給我們一個關於經濟發展中可以預期的趨勢的一般概念，而決不是一個國家應當做些什麼的指南。因此，他們認為最好從辭彙中消除“常態樣式”的用語，代之以“平均樣式”（average pattern）。<sup>1</sup>

總之，我們認為，以中國的經濟結構與平均結構相比較，是找出中國目前經濟結構的特點與問題的有用方法。然而，估量偏離的方向與大小，只是入門的嚮導，要找出它背後的本質和規律性，並從而提出有科學根據的政策措施，還需要進行去粗存精、由表及裏的研究。

#### 四、“以結構變革為中心的新成長階段論”述評

根據一般系統論“結構決定功能”的原理，把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分析的重點放在經濟結構問題上自然是很有見地的。問題在於，“結構”是一個過於籠統的字眼。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有結構問題。經濟結構，也有消費結構、需求結構、生產結構、資源結構、產業結構、部門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規模結構……等種類。那麼，這裏所說的是哪種結構或哪些結構呢？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在他們的第一篇文章《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和農村發展》中，以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變化作為劃分經濟發

---

1 N·吉利斯、D·珀金斯、M·羅默爾和D·斯諾德：《發展經濟學》（紐約：W·W·諾頓出版社，1983）。



展階段的根本標準，以生產結構與需求結構的銜接及適應作為觀察國民經濟運行的主要窗口，這樣一種分析方法，對於研究中國現代發展是否適當，是值得加以探討的問題。

什麼是決定經濟成長的主導因素，什麼是劃分發展階段的主要標誌，歷來是發展經濟學爭論的主題。在現代發展經濟學中，羅斯托在《經濟成長階段》（1960）中，首先提出了成長五階段（傳統社會、為起飛前創造前提、起飛、社會經濟走向成熟、高額群眾消費）的學說，其階段劃分的標準並不統一。如果說前四個階段大體上是生產或積累主導，後一個階段則是消費或需求主導。<sup>1</sup>至於近年來佔有優勢的、着眼於生產就業等結構分析的發展經濟學家——所謂“結構主義者”，也有資源（包括勞動和資本）狀況先決和需求結構先決的區別。<sup>2</sup>

在我們看來，上面所說的資源導向和需求導向兩種分析方法都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應當區別情況，綜合運用，而不能以偏概全。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1984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310美元，在世界銀行的128國統計中，約佔第100位<sup>3</sup>，經濟

---

1 W·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他在《政治和成長階段》（1971）一書中，又增加了“對生產質量的追求”作為經濟成長的最高階段（見胡代光、厲以寧：《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2 楊叔進：《經濟發展的理論和策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例如：A·劉易斯等人從剩餘勞動和資本供應來分析發展過程；而H·錢納利等則認為，可以根據人均收入水平確定需求結構和各部門的比例關係。

3 世界銀行：《1986年世界經濟發展報告》（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



發展階段離“高額消費時代”尚遠，經濟發展又是“資源約束型”的<sup>1</sup>，就更應當着重分析資源狀況和在部門間的配置，而不能把消費水平和需求結構的可能變化，作為分析問題的主要出發點。況且，這種分析對於“現階段中國應當採取怎樣的收入政策和消費政策”、“中國現有的消費水平是否合適”、“在現有資源條件下什麼樣的消費水平是合適的”等更深層次的問題，無法作出有質和量的規定的回答。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在他們的第二篇論文中，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新成長階段”的結構變革，認為農業在產值、收入和就業中所佔份額的下降，是中等發達水平國家經濟發展中經濟結構變動的主線。<sup>2</sup>如果把邏輯貫徹到底，就要圍繞着農業份額下降這條主線來分析中國當前發展階段面臨的諸種矛盾。這樣做，無疑能為我們的研究在方法論上開闢出新的道路。

幸運的是，我們的前人已經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前述論文引述了1945年張培剛對於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的勞動人口和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日益下降現象所作的分析。<sup>3</sup>實際上，從那時以來，在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方面，文獻汗牛充棟，有了長足進展，許多學者對於農業國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的地位與作用，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意義、方式、速度和約束條件等，從所謂“二元經濟”到現代發展轉化過程中必然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

---

1 J·科爾奈：《短缺經濟學》（北荷蘭出版公司，1980）。

2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1986年文。

3 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1945）》（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4）。



## 五、“二元經濟”的發展理論

二次大戰以後，隨着亞非拉許多經濟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獨立，以這些國家的經濟為研究物件的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並迅速發展。

如所周知，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早就提出過工業和農業兩部門發展模型，指出過農業中存在“剩餘勞動力”以及這種剩餘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趨勢<sup>1</sup>。兩部門模型的現代版本起源於荷蘭經濟學家 J·H·博克，集大成於 A·劉易斯，後來又為許多人所修正與發展。

首先，博克根據他在本世紀初對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結構特點的觀點，提出了“社會二元性”的概念，認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同時出現兩種或多種顯然互不相同的社會制度”。“社會二元性是一個引入的社會制度和另一種土著的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sup>2</sup>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綜合了戰前戰後許多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的思想，於 1954 年建立了第一個二元經濟發展模型。他繼承了前人的思想，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一個是龐大的、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的傳統部門，主要包括農業還有某些小型商業和服務業；二是採用現代方式的工業等工業部門。劉易斯認為，由於農業邊際生產率極低，甚至為負數，農村存在大量“過

1 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2 J·H·博克：《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紐約：太平洋關係學會，1953）。轉引自 C·P·全德伯格、B·赫里克：《經濟發展》，第三版（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剩勞動力”，因此工業部門可以在很低的工資水平下得到無限勞動供給。因此，只要工業部門的積累增加，就能吸收農業部門的潛在剩餘勞動力，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在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轉化的過程中，工資水平保持穩定，利潤率大大提高，國民收入中儲蓄和積累的份額隨工業中就業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這種結構轉換過程沒有遇到土地收益劇減、工資水平猛升、淨投資消失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方面的障礙，工業資本的增加和工業就業量的增加循環往復，直至農業剩餘勞動力被吸收完畢。這時，工資隨勞動生產率而上升，表明“二元經濟”過渡時期的結束和整個經濟新的增長時期的開始。

儘管對劉易斯的模型有許多爭論，他的某些假定前提，如“只要農業剩餘勞動力不消失，工業工資就會保持在低水平上不變”的假定，為多數人所否定，但是他所提出的開創性思路，對後來的發展理論的巨大影響，卻是無可置疑的。他本人也因這方面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獎金。

60年代以後，二元經濟理論有了巨大的發展，其中某些學派是以劉易斯的學說為基礎，有的則對劉易斯的基本假說作了較大的修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費景漢和G·瑞尼斯對劉易斯學說的創造性發展。他們吸收了發展經濟學的新成果，並把劉易斯相對地說比較簡單的模型，發展為結構更加嚴密的宏觀動態模型。他們還認為，在經濟增長初期，由於農業勞動力過剩，因此工業從農業中吸收勞動力不會影響人均剩餘農產品數量。但超過一定限度以後，如果勞動力繼續轉移，勢必影響農業生產從而減少供應給工業部門的農產品，這樣農產品價格和工業工資就會同時上升，使工業利潤和資本積





累下降；從而這時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仍低於人均收入水平，這種現象阻礙結構轉換的順利進行。為了避免這種不利於經濟發展的現象，瑞尼斯認為，必須在工業發展的同時，相應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業產量，使供應工業的人均剩餘農產品數量保持不變。只有這樣才能使工業得到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保持資金積累和增長的勢頭。<sup>1</sup>

總之，二元經濟理論雖然分為許多支派，而且存在不少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但它所提出的基本問題，諸如：1. 如何逐漸使農村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到現代部門；2. 如何保證現代部門的發展和傳統部門的改造有足夠的資金供應；3.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數量界限；4. 如何利用對外貿易和國際分工來發展本國經濟等，是一切發展中國家都會遇到的。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決定性的作用。從這種見地出發，二元經濟理論較之在當前發展階段問題上與之相近的其他提法，如“工業化階段”說、“分工全面深化階段”說等等，對於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線索，似乎更勝一籌。<sup>2</sup>

---

1 以上均見張曉光的碩士論文《論二元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他在論文中引述著名發展經濟學家A·赫希曼的話說：“劉易斯簡直是奇蹟般地從有關不發達的簡單命題中引出了典型不發達國家的全部‘運動規律’，以及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

2 以斯大林所論述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為例，他只着重提出了工業化的方法（優先發展輕工業，逐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源泉（積累的來源）問題，而忽略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化這個核心問題。



## 六、“二元經濟”理論與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中國社會二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現代工業和帝國主義的炮艦一起進入了中華帝國，使曾經哺育過燦爛封建文化的中國經濟逐漸向“二元經濟”轉變。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初步建立起二元經濟結構，開始了由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的過渡。但在腐朽的反動統治下，為急速轉化作準備的進程十分緩慢。只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經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才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具備了向現代化經濟突進的條件。這標誌着中國國民經濟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發展加速轉變階段的到來。

所謂二元經濟時代，無非是一個從傳統經濟到現代化經濟轉化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又可以分為三個子階段：1. 現代經濟逐步建立，為經濟的急速轉變作準備；2. 二元經濟向現代發展急速轉變；3. 現代部門趨於成熟，傳統部門逐步得到改造，現代化的同質經濟逐步形成。中國目前正處在第二階段的初期，二元經濟的特點十分明顯。如果撇開現代經濟部門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不論，我們通常認為中國經濟的特點是：底子薄、人口多，而且大部分人口在農村。把這兩方面概括起來，一言以蔽之，就是經濟具有“二元性”。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農村人口，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幾乎佔世界農村人口和農業總量的三分之一。1982年中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79.1%，農業勞動力佔社會勞動力總量的74.4%。農業使用的生產資料僅佔全國固定資產的21.7%，從事着傳統的、以手工業工具為主的農業生產，



因而出現了現代工業部門可以使衛星上天，而在農村部門中還“始終沒有擺脫手工工具佔優勢，傳統經驗和古老成規起主導作用，‘老天爺’左右收成豐歉的落後狀態”<sup>1</sup>。

這樣，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也就是任何二元經濟在向現代發展急速轉化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基本問題。其樞紐則在於農村潛在剩餘勞動力大規模地向非農產業轉化。而由於中國人口分外眾多，人口增長年率雖經多年計劃生育的努力，又始終保持在千分之十以上的水平上，轉化過程中的諸種矛盾就更加激化。

從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看，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發展急速轉化的一般進程大致是：

1. 農業部門生產率躍進式的提高，剩餘農產品大量增加，為迅速擴大非農產業就業提供了勞動力和資金的條件，於是觸發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大規模轉移和非農產業迅速擴大。

2. 勞動力從農業這個相對地說生產率較低的產業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非農業部門，使全社會的剩餘產品進一步增加，積累能力進一步提高，從而有可能使更多的農村閒散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

3. 以上兩個過程互為條件、彼此推動的良性循環和國民經濟穩定地以遞增的速度發展，意味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的成功“起飛”。

對於擁有眾多剩餘勞動力資源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撇開人力資源

---

1 薛永應：《技術結構對策》，載孫尚清主編：《論經濟結構對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的素質不論，最稀缺的資源莫過於資本。而要保證非農產業的擴張和農業本身的技術改造有充分的投資，基本的條件又在於工農業生產效率的持續提高，而且，這種提高必須顯著地超過消費的增長，這樣才能保證有足夠的剩餘產品積累。而經濟效益持續提高的根本保證，又在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所以，在二元經濟的轉化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是始終注意處理好改革、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之間的關係。

## 七、二元經濟的發展與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由以上的分析首先得出的結論是：為了順利地實現轉化，必須對中國傳統的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造。

前面已經說過，擴大工業部門投資，加速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關鍵在於整個國民經濟，包括農業和非農產業的生產率提高。然而，中國過去採取舊的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是以經濟效益提高緩慢為特徵的。這種舊的經濟體制和與之相伴隨的高指標、高投資、低效率、結構偏倚、對外封閉的粗放發展戰略，抑制了社會主義經濟活力，使得投入多、產出少，投資效率和生產效率都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對此，採取傳統模式的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通常採取了分隔城鄉，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戰略，由國家用“義務交售”等方式從農業部門強制地取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sup>1</sup>或“貢款”<sup>2</sup>發展現代化部門。

1 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1926）》（北京：三聯書店，1985）。

2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1929）》。（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採用這套政策實現二元經濟的轉化，並不是沒有成功先例的。蘇聯經過若干個五年計劃的努力，雖然付出了相當大的犧牲，還是大體上實現了這種轉化；贊成保持舊體制的人們常常以蘇聯的工業化為論據，認為中國也可以沿着這條道路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實際上，這種論證是不嚴謹的，因為它忽視了中國和蘇聯在資源條件上的巨大差異。在中國，企圖依靠效率很差的傳統體制實現轉化，是注定不能取得成功的。

美國經濟學家安東尼·唐對中國和蘇聯發展工業的起始條件作過比較研究。他指出，如果分別以1928年和1952年作為蘇聯和中國工業化的起始年份，蘇聯人均糧食是中國的兩倍多。因此，蘇聯農業對於高速度發展重工業的支撐能力就要高得多；而中國要執行同樣的發展戰略，就要遇到大得多的困難。加之俄國是一個地廣人稀，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國家；而中國按人平均的資源佔有量是相當低的，每人佔有的耕地面積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嚴重損害了農民積極性的經濟體制下，當工商業發展對農業產品提出愈來愈高的要求，不得不加大開發強度提高時，收益迅速遞減，使工業化的農業基礎陷於崩潰，從而使二元經濟的轉化過程發生逆轉。<sup>1</sup>

在粉碎“四人幫”以前的20餘年中，採取這樣的體制模式和工業化戰略，使中國國民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工業片面發展、輕工業落後、農業基礎遭到破壞的不良狀況。農業勞動力佔社會勞動力和總人口的比重，從1952年到1976年的20年中幾乎沒有變動。農業的比

---

1 安東尼·唐：《一九四五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1981）。



重雖然很大，農產品卻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每年需要大量從國外進口糧棉油。偏倚的農業經濟，拖住了國民經濟的後腿。加上要素不能流動，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據世界銀行的計算，從1952年到1975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每年平均下降1.1%，或提高0.3%。<sup>1</sup>這當然反過來又使國家沒有可能減輕農業的負擔，更不用說改善農業的狀況了，於是使國民經濟陷入了惡性循環，導致70年代中期出現的全面危機。

中國目前的農業對於結構轉化的推動和支撐的能力，較之過去的農業大得不可比擬。但是，無論農業的“第一推動力”如何巨大，要使結構轉化的過程得以持續地進行下去，使良性循環不致中斷和逆轉，根本的問題還是要做到在急速轉化的全過程中保持社會經濟效益逐年有所提高。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改造中國經濟效益低下的舊經濟體制模式。也就是說，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和保證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就需要對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在改革中，我們要研究如何把以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非農業部門相互處於隔絕狀態、各有自己經濟活動方式、各自不同的發展途徑為其主要特徵的封閉的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為以兩部門商品、資金、技術、人力諸方面的交流，農業部門商品性質日益加強為其主要特徵的開放的二元經濟結構，以保證資源配置效益和營運效益的不斷提高。

---

1 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從國際角度看中國經濟結構》，原載《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1984）。



## 八、掌握勞動力轉移速度和方向

既然“二元經濟”順利向現代化經濟發展要滿足我們在前面講的條件，使經濟效益較之消費有更快的提高，以便保證有足夠的積累，掌握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化的速度，或者說，非農產業擴大的速度，就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

只有農村勞動力大量轉向非農產業，才能迅速發展現代工業部門，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也只有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出，才有利於農業向大生產發展和集約化經營；而且，也只有這樣，全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才能迅速地提高。因此，從一定的意義上說，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化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因此，從我們的主觀願望說，當然希望這種轉化進行得愈快愈好。但是，在客觀上，這種轉化的速度，卻不能不受到社會財力的限制。這是因為，社會能夠為非農產業新增勞動力的生產和消費需要提供出來，而不致危及國民經濟宏觀經濟效益的保持和提高的資金數量是有限的。如果超越了這個限度，造成經濟效益下降或資金供應短缺，就會使結構轉化受阻。在更加嚴重的情況下，甚至會因為損害了作為轉化過程基點的農業生產率，而使整個良性循環發生逆轉。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有過沉痛的歷史教訓的。以 1958 年的那一次大折騰為例，50 年代後期國民經濟高速度增長的啟動，本來是以土地改革以後從 1952 年至 1958 年農業生產率的持續提高為基礎



的；<sup>1</sup> 蓬勃的發展形勢發生逆轉的主要契機則是：農業勞動力移入非農業部門的速度過高、非農業部門擴大過快，1958年至1960年中非農產業新增職工多達2800萬人；伴隨着轉入高收入部門職工人數增加和其他職工收入增加，1960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門工資總額比1957年增加68.6%；與此同時，社會的經濟效率非但沒有提高，相反卻急劇下降。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邊際投資/產出率（ICOR）較之上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加了50倍，即每增加一元國民收入所需投資，竟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1.78元增加到93.8元！<sup>2</sup> 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在五年間下降了24.3%。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更多。1958年的情況和1956年不同的是，當出現“冒進”的徵象以後，沒有採取調整措施；相反在1959年和1960年繼續採取揠苗助長的方式，以國力所不能支撐的速度發展非農業部門，以至損及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結果釀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危機，不得不進行為時三年以上的“調整”，把兩千萬已進城就業的農民退回農村，大量新建生產能力被廢棄，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

1 根據安東尼·唐的計算，1952~1976年期間，中國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不但沒有提高，相反卻有所降低。但是其間出現過幾次上升時期，如1952年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為100，1956年為109，1957年為111，1958年為119。見《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163期（1981）。

2 這裏的邊際投資產出率，是世界銀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所列數位計算的，用於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比較。在用於國際比較時，這些數值需要加以調整。





近年來中國國民經濟再次的進入高速度發展。這次同過去幾次有着根本的區別，是由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農民長期被舊體制抑制的積極性迸發出來，使中國農業生產率持續提高。1979年至1983年的五年中農業的勞動投入大幅度減少，物質投入也沒有明顯增加；而1979年至1983年的五年中，農業生產總值（不包括村辦工業產值）即以12.82%的年率遞增。這說明，近年來中國國民經濟的結構轉化強勁有力的突進，是有雄厚的基礎的。

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需要注意掌握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的速度與方向。

從速度方面說，近年來一些地區鄉鎮工業，以遠遠超過城市工業的速度發展，在整個工業產值中的比重急劇上升，1984年已達24%，1985年又接近30%。這對於促進農村經濟和落後地區的發展，以及對於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 and 提高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這裏也有不正常的方面。它的明顯的表徵是：在今年，大工業由於資源制約而普遍減速，大城市經濟出現萎縮趨向的情況下，某些與大工業爭電能、爭原料、爭運力而經濟效益相對較差的鄉鎮工業，在雙軌價格和種種非經濟因素的作用下，仍以相當高的速度不可遏制地發展着。對此經濟學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的經濟學家全面肯定目前鄉鎮企業及其他小企業的高速發展，認為它們發展得愈快，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愈順利。另一些經濟學家對此持有保留意見，認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或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及其轉移方向，應以有益於整個國民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為限。有些作者還把近年來由於農村改革超前和城市改革滯後形成



的上述發展格局，稱為“用農村工業的粗放發展來帶動整個經濟增長，在城市工業減速、降格的情況下求得整體均衡”的“農村工業化模式”。他們主張，中國的經濟發展應當選擇另一種道路，這就是“通過城市現代部門的集約發展向農村擴展、輻射，帶動農村乃至整個國民經濟，最終將傳統部門納入現代經濟的運轉軌道”<sup>1</sup>。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值得認真加以考慮的。

## 九、把提高經濟效益放到經濟工作的首位

如前所述，不斷擴大現代經濟部門，促使農村勞動力大量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要以經濟效益的提高為前提。既然如此，為了保證中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有必要改變過去那種片面追求增值速度的傳統發展戰略，而把提高經濟效益放到經濟工作的首位。

我們所說的經濟效益，是指投入和產出的對比關係，它包括從社會角度看的資源配置效益（allocation efficiency）和企業、職工營運操作效益（operational efficiency，或譯作效益）。

國民經濟中資源配置效益的高低首先取決於產業結構的合理程度。國民經濟的綜合能力並不取決於“長線”部門的全部能力，而是取決於“短線”部門的有效能力。如果產業結構七長八短，一部分資源雖然投入“長線”生產，實際上非但並未對提高綜合生產能力起作

---

1 劉吉瑞、何其鋼：《二元經濟工業化的模式及其轉換》，《改革與戰略》，第3期（1986）。



用，相反會由於對稀缺資源的無效佔用，造成資源的浪費。由於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思想仍然盤踞着我們一些人的頭腦，儘管我們有時也在理論上認識到比例失調的危害，並在實際上制定了加強短線部門的具體計劃，但是這種計劃往往未能得到執行，結果“長線”愈拉愈長，“短線”相對縮短，“瓶頸”現象更趨嚴重，降低了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近年來，由於加工工業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計劃，加上基本建設規模連年失控，我們只好大量進口原材料來支撐超高速增長。1985年鋼材進口量高達1800多萬噸，接近國內生產能力的一半，用匯幾乎等於中國原油出口的換匯額。能源部門產量的增長，也付出了拼設備、浪費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價。電力供應的嚴重短缺，使20%~30%的工業生產能力不能發揮。對於自然資源近乎掠奪式的開採，會損害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

企業規模結構不合理是影響經濟效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近些年來預算外投資新建的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偏小的問題，使許多行業的規模效益得不到發揮。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就業壓力和投資機制不完善以外，主要是在雙重體制、雙重行為規則條件下，由超高速激化的市場價格信號嚴重扭曲。由於國家調撥物資的價格管死，市場採購部分的價格就處於邊際水平上，承擔了全部超計劃需求的壓力。當增長速度過高，市場短缺日益嚴重時，這部分市場調節物資的供求價格就會上升到可以容納很高成本的不合理水平上。在這種價格水平上，某些規模經濟效益很差，物質消耗水平很高的企業也取得很高的盈利；特別是一些企業乃至“皮包公司”不擇手段鑽“雙軌價格”的空子，低價進、高價出，往往能夠以小擠大、以劣擠優、



牟取暴利，嚴重損害宏觀經濟效益。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在建投資規模過大和年度投資規模過大，是近年來同時存在的兩種現象。由於在建規模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使得工程項目不能按合理工期建成，導致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連年下降；而且，工程施工質量下降，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技術進步是提高經濟效益的積極手段。近年來我們雖大力提倡、普遍推行，但由於片面追求產值增長速度的思想沒有扭轉，而鋪攤子、上項目又是增加產值的捷徑，所以在實際上技術進步但並未真正全面實行。同時，在經濟過熱、需求極為旺盛的情況下，企業不可能感受到技術進步的壓力，經濟粗放發展的模式就很難有根本的改變。

總而言之，中國要順利實現二元經濟向現代增長的轉變，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的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二元經濟模型是一種宏觀發展理論，它所涉及的經濟變數主要是社會總量和部門總量，較少直接討論微觀經濟效益問題。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宏觀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的變化，不僅取決於宏觀調控的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微觀經濟效益的高低。而要提高微觀經濟效益，從根本上說是要提高企業的活力和勞動者的積極性，這又必須對傳統的僵化體制進行改革。所以說，發展問題和改革問題從來是聯繫在一起的。

## 十、正確處理建設、改革同人民生活之間的關係

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之間的關係，這在傳統體制下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問題。建國以後的最初30年，



中國採取了由國家集中農業剩餘產品來投資建設工業的模式進行現代化建設，使廣大農民的生活不能隨着生產的發展而得到應有的改善；在城市也採取“先生產，後生活”的政策，忽視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勞動者的積極性受到很大損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改善人民生活。1979年和1980年兩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超過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國民收入增長。這樣做，糾正了過去“重積累、輕消費”，強調社會性消費，忽視消費者個人選擇的分配模式，使勞動者個人收入有較快的增長，帶有“還欠賬”的性質，這是必要的。但是，由於城市體制改革沒法跟上，儘管個人收入增長了，但帶有“大鍋飯”色彩的分配體制並沒有明顯改變；因此，收入增長不能有力地持久地刺激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增加相應的生產成果。“六五”期間，中國居民收入繼續以超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增長。同時，固定資產投資中，用於樓、堂、館、所、街等非生產建設的比例日益提高。這些，都使用於物質生產部門建設的資金相對減少。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上，物質生產部門的建設與發展，仍是整個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本部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需要大量的投資。這部分建設資金的短缺，將使今後的經濟發展缺乏後勁。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對人民生活的持續提高也是沒有好處的。

傳統的發展模式確實沒有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應有的位置上。面對巨大的人口壓力，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將盡可能擴大就業作為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從50年代開始就實行了“低工資、高就業”的改革，“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使得街頭失業變成了在職失業。



實踐證明，這種收入和就業政策因為損害了社會經濟效益，到頭來並沒有很好地解決城市就業和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問題，反而導致了從60年代初一直到70年代中期連續不斷的城市“知青”的下放，數千萬城市青年勞動力加入了農村隱蔽失業大軍。發展經濟學家斯蒂芬·馬格林認為，如果簡單地認為勞動過剩就應當低估勞動的影子價格，使勞動實現充分就業，那麼就可能使社會總產品中消費達到最大、投資減到最小，最終使增長停滯。因此，為了使經濟獲得最優發展，既不能使就業達到最大，也不能使投資達到最小；而是應當使用正確的影子價格對消費和投資的不同組合進行比較，選擇最佳就業和投資水平。在保證必要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逐步解決就業問題。<sup>1</sup>馬格林的這些思想是富有啟發性的。

按照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由於人口增長以及社會保障和社會性消費的存在，人均生活費收入的增長，應當略低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對於二元經濟急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國家，情況就更是如此。這時一方面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投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高消費的強烈“示範效應”，又造成國內過高的消費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從長遠利益考慮，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加強對消費的適當引導和控制，用鼓勵儲蓄來化解由於居民收入增加過速所造成的問題，以保證經濟建設有足夠資金。在這方面，不少順利地實現了“起飛”的國家有不少成功的經驗可供我們借鑒。中華民族歷來有勤奮節儉的傳統，

---

1 S·A·馬格林：《勞動剩餘經濟中的價值和價格》（牛津大學出版社，1976）。



我們應當提倡發揚這種美德，堅決防止鋪張浪費、大吃大喝的風氣蔓延滋長。否則，如果消極順應那種在消費上向發達國家看齊的壓力，甚至推波助瀾，鼓動儘快地提高消費水平，將生產效益提高所創造的剩餘產品分光吃淨；那麼，或者無法保證建設所必要的積累，或者要想同時保證現代化建設有足夠資金，通貨膨脹就不可避免，到頭來還得被迫降低消費水平。在這方面，1984年下半年消費基金失控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困難，應當引為教訓。

其次，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如何處理好改革和人民生活的關係，是所有改革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遇到的、也是最感棘手的問題。

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而生活的適當改善、給群眾以看得見的利益，又是取得群眾對改革的擁護和支持的必要條件。然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速度要適當，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式不限於多給報酬一端。我們要保持冷靜的頭腦，經常牢記：中國還處在迫切需要資金積累的二元經濟向現代發展轉化時期和改革的效果尚未充分顯現的改革前期，千萬不要隨便向群眾許願，而應當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群策群力，搞好改革方面來。同時，隨着改革成效的顯現，逐步改善群眾的生活。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幹部和群眾愈幹愈有味道、愈幹愈有勁。

## 十一、地區發展戰略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地區間自然環境和人文狀況差異懸殊的大國，地區間二元經濟結構的差別也很大。為了保證在轉化過程中地區



效益和全社會的整體效益都達到最大，就有一個如何正確地在地區之間配置資源的問題需要解決。

在地區經濟發展方針的問題上，前幾年提出了“揚長避短、發揮優勢”的指導原則。我們認為，這一指導原則是正確的。問題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有些人對這一方針存在某種誤解。不少人認為，所謂發揮優勢，就是把自己擁有的或可以通過其他辦法取得的資源，統統留在本地區加工成製成品；他們忙着鋪攤子、補“空白”，力求自成體系。結果不僅重複布點、拉長了基本建設戰線、盲目生產造成質量下降和庫存積壓，而且地區之間在行政權力的保護下進行爭奪烤煙、羊毛等稀缺資源的“大戰”，使社會資源不能按照優化原則作合理的配置，遭致整體經濟的重大損失。<sup>1</sup>

事實上，貫徹“揚長避短、發揮優勢”的方針，應以“比較利益（優勢）”原則（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為依據。<sup>2</sup>我們知道，D·李嘉圖在論證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好處時，修改和發展了A·斯密的絕對利益（優勢）理論，創立了比較利益（優勢）學說。他用一個由兩個國家、兩種貨物、單一生產要素（勞動）的模型說明：各個國家不應當生產所有的產品，而只應當集中生產在本國能夠生產的諸產品中相對成本最低的產品，然後通過國際貿易進行交

---

1 近年來煙草行業的盲目發展情況，參見王玲玲：《論控制煙草行業的盲目發展》，《經濟學周報》，（1986）；羊毛資源的配置問題，參見盧小飛：《在羊毛大戰的背後》，《人民日報》，1986年7月21日。

2 吳敬璉、陳吉元：《根據地方特點建立合理的經濟結構》，《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1980）。





換相對成本較高的產品；這樣形成的國際分工對參加交換的各方都有利，並使世界的總產出量增加。後來，瑞典經濟學家E·赫克謝爾和B·俄林對於這種單一生產要素的模型作了重要補充，指出各種生產要素秉賦上的差異，對於國際分工和生產專業化起決定影響，各國應儘量生產和出口較多耗用其秉賦豐盛的資源、較少耗用其秉賦貧乏的資源，儘量進口較多耗用其秉賦貧乏的資源、較多耗用其秉賦豐盛的資源的產品。<sup>1</sup>比較利益（優勢）學說在國際貿易的運用，由於國際經濟關係受到政治因素的重大影響，其適用性至今仍有爭議。然而無論如何，這一原理適用於一國內部的地區分工，卻是無可置疑的。我們應當按照這一原理來規劃各個地區的發展戰略，不是四面出擊、百業俱興，而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不是搞市場割據和力求自成體系，而是儘量利用地區間專業化分工的好處。我們的體制和政策要有利於發揮比較優勢的方針的貫徹。這樣既有利於各個地區的發展，也有利於在既定的資源條件下使社會的宏觀經濟效益達到最優。

在這個問題上通常遇到的一種顧慮是：採取這樣的方針，會不會妨礙落後地區趕上先進地區，甚至拉大差別？事實上，只要我們處理得當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根據比較利益原理，致富之道，不是憑藉只有先進地區才有的絕對優勢，而是各個地區都揚長避短，發揮自己的資源秉賦上的相對優勢。既然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相對優勢，大家就都有發展的潛力，發揮這種潛力就可以共同富裕起來。社會主義

---

1 “發展極”理論是法國經濟學家F·佩魯提出的。參見譚崇台：《發展經濟學》。



國家自然要給予對於落後地區以大力的投資等支持，再伴隨着資本和勞力的流動以及貿易結構的升級換代，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也會發生變化和轉移，假以時日，落後地區趕上乃至超過先進地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據以上所說的比較優勢原理和中國各個地區的實際經濟分布情況，看來對於在中國廣泛流行的從東到西逐步推移、梯級開發的地區經濟發展政策，有進一步推敲的必要。正如許多人指出的，同美國西部地區和蘇聯東部地區長期為不毛之地，因而早期經濟發展分別呈現從東向西和從西向東推進的趨勢的情況不同，中國中、西部地區早經開發。中西部地區不僅有自己的自然資源優勢，而且在某些領域還有技術和經濟優勢。在建國以後，特別是6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以數以千億計的投資，在內地興建了一批技術先進、裝備精良、集中了大批專門人才的工業群體和科研基地。因此，認為中西部地區沒有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經濟發展只能由東向西逐步推進是有些片面的。應當看到，雖然總的說來，目前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高於西部地區，但是中、西部地區也有自己的“發展極”和“增長點”。<sup>1</sup>如何發揮它們的優勢和潛力，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並和東部地區互補短長，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義，需要我們認真研究解決。

---

1 參見：N·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譚崇台：《發展經濟學》。



## 十二、對外經濟關係與二元經濟的轉化

對於國際貿易在二元經濟轉化過程中的作用，人們的認識是不斷深化和擴大的。1850年，英國進行了工業革命，有些國家對此作出了反應，先後實現了工業化，而大多數國家卻沒有對此作出反應。為什麼這些國家沒有作出反應呢？根據劉易斯的看法，它們本來可以通過兩個機會來實現工業化。一是與已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進行貿易，但通過貿易實現工業化的機會不大，這是因為第三世界與工業國的貿易量很小。貿易量小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主要工業國從總體上看，實際上是自給自足的；二是世界貿易的擴大必須以運輸革命為前提。而進行仿效也存在嚴重的障礙，除帝國主義列強對其殖民地的工業化採取了敵視態度和地主階級的反動以外，主要是工業化的基礎還是不充分。在一個封閉經濟中，工業部門的大小是農業生產率的函數。<sup>1</sup>他進一步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是技術變化，國際貿易是潤滑油而不是燃料”。“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不必過分依賴出口，眼光應該更多地放在國內市場。”<sup>2</sup>儘管劉易斯也認為對外貿易有利於增加國民收入，從而有利於實現工業化，<sup>3</sup>但他的理論分析主要是以封閉經濟為對象的。

二次大戰以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受到當時流行理論的影響，普遍實行了閉關鎖國的保護政策（初級內向）；或採取發展進口替代產

---

1 劉易斯：《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 劉易斯：《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

3 劉易斯：《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



業的政策（次級內向）作為工業化的正確道路。這就使得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享有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好處。相反，它們為了提高投資率，以促進技術進步和滿足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而大量舉債，由於內向型經濟難以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消費欲望在“示範效應”下又難以抑制，於是龐大的進口計劃無法削減，國際收支狀況不斷惡化，從而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債務危機。

亞洲一些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率先放棄了進口替代的政策，紛紛轉向出口導向的外向戰略。它們採取的具體政策是，將本幣幣值大幅度貶值、不用嚴厲的進口管制、出口補貼、複式匯率等措施也可基本維持國際收入平衡的水平上，從而為貿易自由創造了條件。<sup>1</sup>

出口導向的政策，有力地刺激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出口的擴張，引起了國內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動。農業產品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比重下跌，而工業產品（包括礦業、製造業、水電煤氣業和建築業）佔有的比重上升。在開放型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中，鮑爾－費的模型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們主要是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要積累泉源的小國開放經濟為研究對象。他們認為這些經濟要擺脫殖民地時代遺留的不合理結構，必須正確地選擇工業發展方向和經濟發展模式。他們細緻地

---

1 蔣碩傑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中指出，台灣經濟發展得力於兩項措施：第一，在適當調整匯率、實行本幣貶值後，採用貿易自由化和出口擴張的策略，使勞動力由土地密集的農業移向勞動密集的新出口產業。第二，放棄人為的低利率政策，因而得免於過渡選用資本密集和勞動節約的生產方式，儲蓄也因之流入金融機構，充裕不具有膨脹性的投資基金來源。參《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台灣：天下圖書公司，1983）。



分析了進口替代（次級內向）、出口鼓勵（初級外向）和出口替代（次級外向）三種外貿戰略。他們認為，進口替代和出口鼓勵是以初級產品出口支持國內工業發展，因此可能是過渡初期不可避免的發展模式。但是，必須不失時機地及早採取出口替代政策，即用勞動密集的製成品替代初級品出口，從而使經濟發展的基礎從土地自然資源轉向豐富的勞動力，加速勞動力的部門轉移和二元結構的改變。因此，鮑爾－費認為：從進口替代和出口鼓勵階段向出口替代過渡是開放型二元經濟發展成敗的關鍵。<sup>1</sup>戰後世界經濟的發展表明，落後國家要趕上去，全面外向發展是惟一有效的途徑，捨此不能獲得真正成功。靠出口替代，日本經濟完成了由落後到先進的轉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績。而採取進口替代或其他什麼戰略的落後國家還未見有什麼起色。

出口導向是從戰略重點和出口增長與整個經濟增長速度的關係上講的，並不意味着一定要使國內大部分經濟活動都圍繞出口展開。有的人往往有此誤解，從而懷疑大國採取這種戰略的必要性。其實，到現在日本的出口對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也不過13%左右，美國出口額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更小。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應當堅決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因為制定戰略的依據，不在於國家的大小、人口的寡眾，而在於克服經濟發展中制約因素的關鍵是什麼。中國雖大，有較齊全的生產部門和廣闊

---

1 鮑爾和費景漢：《開放性的二元經濟的過渡》（耶魯大學出版社，1973）。



的國內市場，但若想使國民經濟實現有效的增長，讓國內現代部門始終能以其高技術高效益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從而帶動傳統部門的發展，就必須在日益擴大的規模上參加國際分工，以使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而這離開大量進口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是辦不到的。因此出口必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制約因素。要有效地突破這個制約，除了採取全面的外向戰略外，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先搞進口替代，自成體系後再謀求自我完善和獨立發展，這樣的路子中國已經走了多年，實踐證明事倍功半，甚至此路不通。

實施出口導向戰略，需要外貿體制改革的配合。事實上，要實行進口替代的戰略，必然要用關稅壁壘對民族工業進行保護。同時，在這種戰略下，巨額的出口補貼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需要一個強而有力、比較完備的行政管理系統，對外貿企業實行控制和干預，而這種政策是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些實施出口導向戰略比較成功的國家，總是在將本幣進行較大幅度的貶值，讓出口企業在一個大致平等的條件下展開競爭，而國家不再以補貼等形式過多地對企業進行不規則的干預。要做到這一點，還必須：

第一，出口企業實行經濟利益掛鉤，有明確的追求利潤和創匯的積極性，具有決定原料採購、產品銷售甚至人員錄用的自主權，有嚴格的財務責任。

第二，應有一個健全統一的國內市場體系和完善的遠期市場組織。各種要素，包括利率、匯率的價格關係趨於大致合理，要素可以在各個生產領域裏流動和重組。

第三，比較完善的間接調控體系，包括出口換匯成本核定或出口



退稅、進出口信貸、許可證制度等。

由上可見，外貿體制改革是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所要解決的三個主要方面的問題，即企業、市場體系和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聯繫在一起。

### 十三、適應二元經濟轉化要求的改革戰略

綜上所述，在二元經濟加速向現代發展轉化的階段，既存在加速改革的迫切必要性，又出現了加快建設步伐的大好時機。於是，如何正確地處理現代化建設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係，既前述雙重模式轉化論所討論的問題，就成為正確決定發展與改革戰略的關鍵。在這個問題上，有三種可供選擇的主要方案：

第一種方案主張建設與改革“雙加速”。持這種意見的人們認為，這樣做，既能全面推進改革，又不失高速增長的時機，因而能夠保證中國現代化大業的早日實現。

我們認為，如果確能做到這樣的“雙加速”，自然是再理想不過的了。可是，各國的實踐經驗，特別是中國近年來的實踐經驗證明，在目前的條件下，這是難於做到的。這是因為，雖然從根本上說經濟體制改革和加速現代化建設是相一致的，但在短期內，二者之間又有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改革的起步階段需要一個宏觀經濟關係比較協調，市場不太緊張，國家的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而在經濟關係還沒有初步理順、二元經濟向現代發展急速轉化的初期，經濟效益不高，現代工業部門的積累能力很弱，要求在這



種條件下加快建設的步伐，就會因為只能依靠投入的大量增加而使需求急劇膨脹，最終導致增長和改革兩敗俱傷。在經濟發展上固然會造成大的折騰，在經濟體制方面，也會因為面對失控的經濟，不得不使用舊的行政方法來加以控制，而使改革的成果不能鞏固，甚至歸於消失。

在這種情況下，兼顧建設與改革的“走小步”方案就成為一種很有吸引力的選擇。按照這種方案，在建設上適當增加資金投入，主要依靠中小企業的發展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比如說，每年6%～10%；另一方面，在改革上也採取局部改革、逐步過渡的策略，比如說，經過五到十年“小調小放”，理順價格關係，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新體制的框架。

從近期來看，這種方案是十分穩妥的。它不致引起急劇的需求膨脹，經濟改革由於每一次改革的步子都走得不大，因此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震盪。問題在於，從五到十年的中長期觀點看問題，它的風險並不是看起來那樣小，而是相當大的。事情的癥結是：在二元經濟急劇轉化的時期，最重要的是使經濟效益，包括資源配置效益和營運操作效益持續地提高。只有這樣，才能使國民經濟在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基礎上保持高增長速度和高收益的良性循環，而不致在“起飛”以後又從空中掉下來。然而舊的體制是不能保證效益持續提高的；新體制提高經濟效益的整體功能，又要在配套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大體形成以後才可能顯現出來。特別是當前這種摩擦很多、漏洞很多的雙重體制對峙、新體制不能起主導作用的狀態，對於國民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僅無益，而且有害。聽任這種狀態長期持





續，只能使國民經濟效益惡化，投入多、產出少，必然使財政緊張，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矛盾加劇，各個社會集團都感到短缺，從而使建設失去後勁，改革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

既以上兩種方案都不可取，在我們看來，正確的選擇只能是第三方案。這就是：採取果斷措施，用較短的時間“治理環境”<sup>1</sup>，同時作好各方面的準備，保證在總需求與總供給比較協調的狀況出現時，在企業、價格、市場、財政、金融等相互聯繫的環節中推出大步配套改革，使新經濟機關較快地起主導作用。為此，需要在近期內適當放慢增長的速度，大幅度壓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在建規模，嚴格控制年度投資規模，放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堅決制止各種鋪張浪費行為，務必在最短的時間內造成經濟改革的良好經濟環境。同時，要抓緊改革的方案設計、宣傳教育、人員訓練以及試點和總結經驗的工作，保證一旦時機成熟，就能有條不紊地施行。

有些人認為，這種設想的理論分析是合理的，配套關係和實施步驟的設計也是嚴密的；但是，它們過份理想化了，由於種種原因，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在我們看來，這種方案的實施雖然會遇到種種困難，但它是惟一可能成功的改革方案。實施這種方案的最大難點，在於能否在較短時期內控制住總需求，改造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根據1981年調整國民經濟的經驗，我們堅信，黨和政府是有能力做到這一

---

1 “治理環境——配套改革”的分階段實施改革的戰略，是郭樹清在1985年6月首先提出的。參見郭樹清等：《經濟改革總體規劃構思》，《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35期（1986）。



點的。只要全黨上下認識統一，各部門、各地方步調一致，這種環境是能夠創造出來，因而大步配套改革也是可以順利出台的。做到了這一點，蘊藏在人民群眾中、多年來被舊體制所禁錮的潛力就會釋放出來，匯成高速推進現代化的洪流。雖然兩三年內的發展速度看起來慢了，但中長期的發展速度卻肯定會大大加快。應當說，以上方案選擇的利弊得失是十分清楚的，問題只在於我們的權衡和選擇。



# 加快建立和培育 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

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對中國九年來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作了高度精煉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分析，對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作了深刻的闡述，並在統一全黨認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趙紫陽在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在內的商品市場，而且應該包括資金、勞務、技術、信息和房地產等要素市場，只有單一的商品市場不可能很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社會主義的市場體系還必須是競爭的和開放的，因為壟斷的或分割的市場不可能促進商品生產者提高效率，封閉的市場不利於發展國內地區間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促進國際貿易。”政治報告中對於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這段簡短的論述，包含了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實踐中，對市場的內容、性質、作用和運行機制所取得的豐富認識，也明確規定了今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方向和任務。

---

編按：本文原載於《財貿經濟》，第 11 期（1987）。



## 一、理論和實踐的歷史性進步

回顧這幾年的改革實踐和理論探索過程，我們對於市場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針對舊體制的積弊，提出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着手認真的改革。全會着重指出，“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這就是最初為經濟生活中引入市場機制所作的重要的理論突破。三中全會以後，農民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部分得到充分的肯定，農貿市場得到恢復和發展，市場調節的範圍逐步擴大，並日益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城鄉經濟出現一片繁榮景象。

1982年黨的十二大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肯定了這四年裏注意市場調節的作用，方向是正確的，收效也很明顯。同時指出，“由於我國還存在着多種經濟形式，由於對社會的各種複雜需求和大量企業的生產能力難以作出精確計算等原因，除了指令性計劃之外，對許多產品和企業要實行主要運用經濟槓桿以保證其實現的指導性計劃。無論是實行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都要力求符合客觀實際，經常研究市場供需狀況的變化。”至於各種各樣的小商品，“可以讓企業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靈活地自行安排生產。”這些論述表明，我們當時對市場的認識有了一定的深度：1. 市場調節是計劃經濟必需的、有益的，但又是從屬的、次要的補充；2. 無論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都要重視市場供求和價值規律；3. 完全由市場進行調節的，是那



些各種各樣的小商品。這樣的認識在今天看來顯然已經不夠，但在黨的文件裏指出市場調節的範圍應從原來的農副產品市場擴展到部分工業品市場；市場調節的作用應從豐富群眾生活提高到作為制定經濟計劃的重要依據，從而進一步確立了市場調節的地位，這在當時是明顯前進了一大步。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這種形勢迫切要求疏通城鄉流通渠道，為日益增多的農產品開拓市場，同時滿足農民對工業品、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在這種形勢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制訂全面改革藍圖，加快改革步伐，推動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歷史任務。《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指出：“隨着企業自主權的進一步擴大，價格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調節作用愈來愈顯著，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更為迫切。各項經濟體制的改革，包括計劃體制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們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價格體系的改革。價格是最有效的調節手段，合理的價格體系是保證國民經濟活而不亂的重要條件，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決定》對社會主義經濟作出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同時我們對於市場也有了新的認識：1. 計劃和市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機統一的，把它們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2. 市場機制的核心是價格機制，價格必須既反映價值，也反映市場供求關係；3. 價格體系的改革，亦即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1985年9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將發展商品市場、完善市場體系放在新體制的基本框架的突出地位。首先提出了市場體系的概念，指出我們不僅要繼續擴大消費品市場，還要逐步減少國家分配調撥生產資料的種類和數量，擴大生產資料市場。適應商品市場發展的要求，逐步開闢和發展資金市場、技術市場，同時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只有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同時加強市場的管理工作，才能發揮競爭機制的優勝劣汰作用和各種經濟槓桿的調節作用，從根本上提高企業和全社會的經濟效益。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從排斥市場到發展市場，從發展單一的商品市場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體系，認識上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根本性的進展，歸結起來有這樣幾條：

第一，運用市場機制與社會政治制度的性質沒有必然的聯繫。資本主義運用市場取得了近五百年的發展；社會主義運用市場可以在更短的時間裏取得更大的發展。可以這樣說，只有經過改革，將計劃和市場有機結合起來，社會主義優越性才得以充分發揮，從而走上嶄新的發展道路。

第二，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等於“官僚主義的空想”。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就總體來說，只能是粗線條的和有彈性的，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和對企業形成競爭壓力的積極作用。市場是連接國家和企業的紐帶，靈活變動的價格是市場運行的基本要素。新體制基本運行框架可以概括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



第三，市場必須是一個體系。光有商品市場，商品的價格不能引導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重組，市場的供求就不能達到總體均衡。因此除商品市場以外，還必須逐步開闢資金市場、勞務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和房地產市場。

第四，市場必須是全國統一的市場。只有打破條條塊塊的分割封鎖，擴大市場流通的範圍，減少地區間的貿易摩擦，各種稀缺資源才能在廣大範圍內通過分工和交換，進行有效的配置，各地區才能更好地發揮自己資源秉賦的比較優勢，得到更快的發展。

第五，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協調，是我們認定市場積極作用的基本前提。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那麼市場配置資源和促進企業的作用就會全部喪失。因此，在進行引入市場機制的改革中，我們應保持社會總供求的大體平衡。

第六，在市場上活動的主體，必須是具有自負盈虧的責任和自主經營權力的企業。因此對於國有企業，必須減少國家對它們的干預，實行國家所有權和企業經營權的分離，進行經營機制的改革。

第七，對於市場機制固有的盲目性，必須以自覺的、經常性的計劃加以指導。我們不能重複原始商品經濟緩慢的成長過程。我們應該利用人類已有的全部知識在新的起點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體制。

## 二、幾個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由於1984年第四季度至1985年的經濟過熱，1986年經濟體制



改革採取了“鞏固、完善、補充、提高”的方針，與此同時有關部門組織了配套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曾經提出來的價格、稅收、財政、金融配套改革方案，旨在建立起市場有效運行的基本條件，加快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形成。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方案被擱置。一個時期以來，在理論界中對市場化改革的作用及其在整個改革中的時序等問題，產生了不少分歧頗大的爭論。

一些人針對這幾年價格上漲較多的情況，提出價格改革風險太大，應該繞開價格改革和形成競爭性市場體系這一難關，選擇一些容易的環節率先進行突破。對此，我們持不同的看法。

首先，由於市場建立的滯後，企業得不到作為獨立商品生產者的最基本的自主權——在市場獲得原材料和其他生產要素、自主定價和開拓國內外市場的權力，任何企業內部的改革都難以得到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會強化行政機關對企業的干預和企業對上級機關的依賴。

其次，由於缺乏對投資作正確引導的合理價格信號，同時建立在目前財政體制基礎上的中央、地方利益關係不適當，投資的合理化只能更多地依靠中央計劃部門或其他機構，用行政命令去作一些帶有相當盲目性的調節，而很難將投資主體落實到應有的經濟組織，結果很可能造成投資嚴重失控，分權與集權循環往復，對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造成損害。

再次，由於未能大體上形成平等競爭的市場條件，金融改革的兩項基本要求：1. 用利率調節貨幣供應量；2. 實現基層銀行的企業化經營，都無法辦到。同時，市場參數紊亂，即使對外貿易的各種政策規定十分繁雜，也難以避免不正當競爭，從而外貿改革處在“一放就





亂，一亂就收”的兩難境地。在中央缺乏通過間接調節、保持貨幣穩定的手段的情況下，財政也不會願意削弱權力。這樣總需求控制的職權和責任就難以在各綜合部門間劃定，從而使通貨膨脹成為經常性的威脅。

最後，由於沒有一個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市場，許多經濟活動就繼續需要靠行政協調，一些應該轉向間接調節的宏觀管理也很難實現轉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機構改革，就會無法進行。

由上可見，若在理順價格體系和創建競爭性市場這個長期落後的方面迴避採取決定性行動的話，就非但不能加強現行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改善它的運行，反而有可能加劇體制內部的不協調，形成整個經濟系統在摩擦很大、漏洞極多的狀態下拖下去的被動局面，使問題愈積愈多，推遲國民經濟的真正“起飛”。

至於市場化方向的改革風險太大的說法，是似是而非的。事實上，較全面地調整生產資料價格，然後放開，這樣做具有巨大的資源配置效益，同時又是改革取得實質性進步的基石，為此承擔一定的風險也是值得的。據 1986 年有關單位測算，較為全面地調整主要生產資料及交通運費的方案所引起的零售物價總指數上升，充其量只有 7%。而這幾年由於總需求過大，改革措施不夠配套有力，每年零售物價的上漲一般也不低於此數。但不同的是，後一種價格上漲並不能給體制帶來任何改善，相反會隨時造成退回到舊體制的壓力。1986 年曾經設想將鋼材價格提到每噸 1000 元，一些持不同意見的人認為企業難以承受。但據 1987 年的調查顯示，現在有相當多的用戶到手



的調撥鋼材價格均上升到 1000 元以上，大量差價收入流到中間環節，而國家財政增支減收，企業卻並未減輕負擔。由此就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繞開價格改革既沒有減輕通貨膨脹，又沒有獲得實質性進步，積之久遠，風險是否更大？

還有一種反對現在繼續推行價格改革的意見認為，由於前幾年已經進行的增量改革，對生產資料價格實行了雙軌制。雙軌價格正在發揮着它的邊際調節作用，因此，現在只須加以完善，不必過早地改變這種狀況。我們認為以雙軌價格為重要特徵的雙重體制引起的矛盾與摩擦，將使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惡化，並使傳統體制下久已存在的“膨脹——緊縮”的波動的波幅更大、周期更短；加上舊體制下原來不存在的價格失控的新情況，必然會使人們重新撿起舊有的行政命令手段，或發明一些所謂新的、但與舊的指令性計劃並無實質區別的管理手段來分配資源。其結果是，每多一分行政命令的控制，就恢復一分實物經濟關係；這樣，市場機制就無可奈何地被行政命令所重新取代，改革就會在事實上發生逆轉。但這時已不可能退回到與原先一模一樣的狀況，一旦強化行政分配，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濫用權力等瀆職犯罪行為會急劇增加。整個經濟在退向舊體制的同時，極有可能滑向腐敗的官僚經濟，給日後的再度改革增添嚴重障礙。

還有些不同意推進市場化方向改革的人認為，既然相對寬鬆的環境是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而寬鬆的經濟環境是改革的目標和結果，那麼，若必要條件不能滿足，則市場化方向的改革也只能推後進行。我們覺得，這種說法混淆了兩種不同概念的“寬鬆”。的確由於在舊體制下存在“擴張衝動”和“投資飢渴”，寬鬆的經濟環境不



可能穩定地存在。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即使在這種體制下，也並不是注定存在總需求嚴重大於總供給的狀況。通過發展戰略的調整，也就是放棄用超發貨幣推動增長的戰略，在一定時期也是可以形成寬鬆的經濟環境的。1981年調整的經驗說明，只要黨和政府決心壓縮總需求，也可以在較短時期內創造出部分的買方市場環境的。中國目前可以兼用行政和市場兩種形式約束社會總需求，效果應當更好一些。還有些人擔心控制需求會降低經濟發展速度，因而得不償失。其實，以舊體制長期不被取代為代價以維持某種“高速度”，才是最不合算的。

還有一些人認為，建立市場機制固然重要，但這是一個自然演化過程，不可能人為加速，急於求成，只能在“雙軌制”的基礎上走小步，用幾十年的工夫來完成。我們認為，新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的確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從舊體制到新體制的轉軌，能夠像這樣今年改一點，明年改一點，慢吞吞地進行，久拖不決。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是一個一環扣一環的有機體系，從舊體制到新體制的過渡，必然要經歷某種系統性的突變，而在突變的過程中，又伴隨着某些補充、完善、提高、成熟的漸變。不能設想僅靠不配套的漸變就能完成系統的根本改變。國際上不論是從戰時統制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還是從計劃經濟轉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變革的經驗都表明，任何體制上的重大變革都包含着一次或幾次經過周密設計和準備的大動作。在不採取這種斷然措施的情況下，系統變革會在中途停下來，結果使改革曠日持久，成績平平，甚至陷入循環往復、徘徊不前的困境。我們是在總結別人的經驗教訓的



基礎上起步改革的。我們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應該避免這種新舊體制長期僵持局面的出現。幾乎所有國家的改革都證明，雙重體制膠着衝突的狀況，客觀上是不允許長期維持的。我們不能停留在這相持階段越趨不前，錯失時機。

### 三、加快改革步伐的設想

鄧小平最近在談到改革時說，實踐證明步子放大些有利。根據歷史經驗和上述分析，我們設想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可以分為兩個互相銜接的步驟。第一步是進行環境治理，採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在短時間內把總需求繼續膨脹的勢頭控制住，造成較大的改革措施出台也不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相對寬鬆的環境。在這一基礎上，再走出決定性的第二步：進行以價格、稅收、財政、金融為重點，投資、外匯、外貿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相配合，相應地抓好企業內部組織體系和宏觀調節機構的建設，理順基本經濟關係，初步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框架。當然，這兩個步驟的區別只是從邏輯關係上說的，不應該把治理環境和實施改革在時間上截然分開。實際上，改革的某些步驟將有助於吸收已經出現的過度需求；良好的經濟環境也不僅應在改革前作好準備，而且要在改革中努力加以鞏固和保持。

在上述總的思路下，具體的方案有兩個：第一方案可以概括為“充分治理環境，大步配套改革”；第二方案可以概括為“中度治理環境，中步配套改革”。採取哪一個方案，取決於治理環境階段所能創



造的條件和方案設計、實施準備的細密程度以及各種政治上的權衡。誠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當然，步子大風險也就大一些”。但是，還是“步子放大些有利”。因此我們傾向於選擇第一個方案，不得已則選擇第二個方案，但不宜採取更慢的方案。

在設計改革實施方案的同時，進入環境治理階段，其主要任務是穩定經濟。具體說來就是：1. 壓縮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2. 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調整國家、地方、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係，堵塞漏洞，增強國家財力；3. 嚴格控制消費基金總量的增長，改善分配結構；4. 強化廠長職權，改善企業管理，改善收入分配的獎優罰劣、獎勤罰懶機制，提高企業和職工的運行效率。做到以上幾點，就可以達到：消滅財政赤字（指國債以後的赤字），恢復預算平衡；消除非經濟性的貨幣發行，把通貨膨脹率壓縮到較低的水平；縮小國際收支逆差，使國家的外匯儲備保持必要的水平。

實施階段又可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全面調整和大體理順國家、部門、地區、企業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以價格、稅收、財政、金融的改革為主，以企業、投資、外貿、外匯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和必要的政策調整相配合，着重建立商品市場和依託於市場的間接調控體系。

第二，經過上述改革以後，新體制的基礎已經形成，政府職能發生了根本轉變，具備了最終切斷企業對國家的縱向從屬關係，並使所有權和經營權實現分離的條件，進一步的改革將形成公有制的新形式。與此同時，市場體系特別是金融市場將進一步發展與完善，理順福利、工資、社會保障和住宅分配等方面的經濟關係，對合理解決國



家與職工、企業與職工、社會和個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也就有了更好的條件。

我們設想實施上述兩個步驟，大約要用五年左右或稍長的時間，將可初步建立新體制的基本框架。這就是：商品市場已經建立並趨向成熟，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開始形成；企業獲得相當充分的自主權，擺脫了行政隸屬關係，大體上可以在平等的條件下展開競爭，公有制的形式開始走上新的軌道；指令性計劃大部分取消，作用於市場體系的宏觀間接調節開始有效地發揮作用；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獲得了充分的進出口決策權，等等。

這裏僅提供了一個粗略的設想，旨在說明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的任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以上設想，將另有專門的文章進行比較詳盡的論述，希望能夠引起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以期將改革的方案設計得更加周到、完善和科學。



# 重新確立理論的 應有地位

---

近幾年，中國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科學，正展現從來沒有的繁榮景象。理論工作者正振奮起探索創新的勇氣，開創理論發展的新局面。

但是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輕視、貶低或者杜撰理論的理論虛無主義色彩，還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曾經是我們衝破思想牢籠、獲取精神解放的響亮口號，將來也是我們提高自覺性、減少盲目性的思想指南。生活、實踐的觀點，永遠是認識理論的首要和本質的觀點。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理論指導確實存在實踐本身所不能替代的意義。不相信理論有指導作用，不等於不存在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不按正確的理論去做以致屢試屢敗，不等於理論本身是無用的。我們在反對一種錯誤傾向時，也要防止另一種錯誤傾向發生；因此，我們在高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旗幟、打碎僵化理論束縛的同時，應該十分

---

編按：本文原載於《經濟學周報》（1988）。



重視建立順應歷史、合乎科學的新的理論體系。

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這麼一些人認為沒有什麼理論能指導我們的改革。誠然，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什麼現成的理論可以套用。但是，既然我們的改革是將傳統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轉軌為有管理的市場經濟體制；那麼，某些根據東歐國家改革經驗，以及工業發達國家數百年實踐總結出來的理論，都是值得我們研究並可以借鑒的。既然我們正處在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發展階段，那麼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和現在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以及由此產生的發展經濟學也是應該認真研究的。

現在輕視理論的傾向，使得經濟學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混亂。有些人認為舊體制的破除，新體制的建立，只能是漫長的自然演化過程；因此，改革只能以撞擊反射的方式，去進行不可預見和不可設計的探索。於是，在有些人眼裏，經濟學變成了誰都可以來“摻糊”的學科。一些對經濟學素無接觸的人也可以隨意提出許多思路和對策；一些初通簡單數學回歸分析的人，也變成了包打天下，無所不通的“經濟學家”。因此無怪乎社會上有人慨嘆，眼下什麼東西都漲價了，只有經濟學家跌價了。

另外，有些經濟學界人士人無定見、文無定論，不斷隨着風向改變自己的觀點。昨天剛說通貨膨脹正將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今天又將通貨膨脹的好處說得神乎其神，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如果一門科學可以如此不嚴肅地發表意見而不加澄清，還有什麼人會相信和重視它呢？





所以我想，一個理論工作者特別是為領導部門提供對策性建議的經濟學家，應該有敢於面對實際和堅持真理的勇氣。只有這樣，理論工作的發展才會大有希望。當然，理論發展還要依賴於民主的學術研究環境和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這些自勿庸贅述。



# 計劃與市場關係 問題兩辨

---

—

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眾說紛紜的經濟學論題。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誕生以來，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就時起時伏。1978年以前，中國理論界就觸及了這一問題。那時是以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為題展開討論的。在這一段時期，大體上有四次比較集中的討論。第一次是在1953年前後，主要是圍繞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提出的觀點，結合中國實際，對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作用問題展開的；第二次是1956~1957年，討論的主題是價值規律和計劃經濟的關係；第三次是1958~1959年，討論的主題是農村人民公社化以後價值規律的作用；第四次是1961~1964年，討論的主題是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經

---

編按：本文原載於《改革》，第1期（1991）。



濟管理的關係（包括價格形成的基礎）。這些討論不是書齋裏的清談，每一次都是在經濟生活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下發生。這些討論也不是文人間的紛爭，一些敢於堅持真理的經濟學界老前輩如孫冶方等，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儘管那時候，一些經濟學家對正確觀點，還不能用比較明白的語言作透徹的論述，但是他們頑強地去追求和揭示真理，對後來的數代經濟學家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長期束縛人們的精神枷鎖被打碎，實事求是的作風得到倡導。經濟學界以計劃與市場關係為題，展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大討論。10多年來，這場討論曾經有過數次高潮。最初是在1978年前後，論題主要圍繞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否存在和應否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第二次是在1982年前後，討論的主題是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是不是某種為主和為輔的關係。第三次是在1984年，討論的是就“社會主義經濟是不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題目展開的。第四次是在1987年，討論的主題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總體上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四次討論的主題，不難看出中國經濟學界近10多年來理論發展的軌跡。中國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曾經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同行認為是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中所取得的成績，也是舉世矚目的。當然，從理論模式的認識到改革方案的設計，存在着大大超過人們預計的差距。因此，當人們在理論模式上取得相對一致後，對改革方案的設計往往見仁見智，大相徑庭。於是，每每在模式的爭論之後，理論界便接踵發生了方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是“改革應從價格開始，還是應從企業開始”，即所謂“價格改革先



行論”和“企業改革先行論”的爭論。這樣的爭論是從1986年開始的，此後也曾有過數次小的高潮。

最近，中國經濟學界進行的“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討論，可以看作是接續上述四次討論的第五次大討論。但是，不少人感覺到，這次討論似乎在許多方面只是原地兜圈子，討論的深度和廣度較之前數次，都沒有明顯的進步。相當多的文章只是簡單地重複了這些年來反覆說過的一些內容。當然正確的觀點有時需要多次重申和論述，問題卻在於，在這些內容中，有些被認為毋庸置疑而被廣泛引用的提法和概念，是需要重新認識的。在這裏，我認為，從1987年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的“產業政策”的提議，以及與此同時被推崇的將“上游產品計劃管住，下游產品價格放開”，作為一種計劃與市場結合模式的設想，是值得商榷和深加研究的。

## 二

1986年初，在《中共中央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精神指導下，有關部門曾經組織力量，醞釀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價、稅、財（指價格、稅收和財政體制）配套的改革方案。這時，有些人提出，改革不應從價格改革開始，而應該從企業改革開始；價格改革應推遲到新的企業機制形成以後。這種意見作為一種反對意見提出後，加上當時經濟過熱，形勢已不宜進行價格改革，所以配套改革方案被擱置。1986年底，以企業承包為主流的企業體制改革在全國逐步推開。

但是，人們很快發現，僅僅調動各個企業提高產量，追逐利潤的



積極性，而沒有一個健全的市場，以及由這個市場形成的一套合理的價格體系，在產業聯繫相當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就不能解決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還在於，在實現了經濟的部分貨幣化和市場化的同時，又保留着大量的行政干預、行政特權、行政管制的情況下，價格、利率、匯率等各種市場參數因“雙軌制”而失真，企業承包制弱化了企業追求利潤的動機，致使嚴重腐蝕社會的“尋租”(rent-seeking)活動大量發生。由於改革措施和時序失當，經濟生活中出現了運行紊亂和腐敗叢生的問題。這些不能不引起改革的領導者和理論工作者的焦慮。

於是，一些想在保留各種雙軌制、繞開比較徹底的價格改革的條件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設想和建議便應運而生。其中曾經產生過一些影響的建議有：1. 建立“決策價格體系”，即用人工計算的價格代替市場價格，對各個企業進行經濟核算，評價它們的經濟效益，核定國家和企業的利益分配比例，並且根據這一套價格體系，國家經濟管理部門作出合理配置資源的宏觀決策；2. 由行政部門對各個產業按重要性進行排隊，用一套包括財政、稅收、利率和各種行政審批為手段的“產業政策”去發展某些行業、限制某些行業，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優化；3. 取消同一產品的價格雙軌制，保留對不同產品實行不同價格形成機制，即對上游產品實行單一的計劃價格，對下游產品實行市場價格，從而形成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以上三種設想和建議，當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有關領導人的重視和讚賞。但是，其中第一種設想，由於建議者也沒有說清自己的思路和給出一套可行的計算方法，同時又被許多中外學者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早已有人提出的“電腦計劃烏托邦的幻想”，因此很快銷聲匿



跡。然而，另外兩個建議，由於領導人的大力推崇，很快風行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此後，除少數經濟學家表示過異議外，相當多具有各種理論背景的經濟學家，都幾乎未加深思地接受了這些觀點。這兩個觀點，成了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少有的、未引起明顯爭論的觀點。

我認為，這兩個觀點是存在着嚴重缺陷的。這兩個觀點出現在1987年春，也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深刻的體制原因和理論原因。體制原因在於，企業承包制改革孤立出台，需要一套與之相配的資源配置機制。理論原因，實質上還是如何看待計劃和市場關係的問題。當然，出現這一段至今仍未被人充分注意的認識上的回流，可能還會有別的原因，但這不屬於本文討論的內容。下面我想就上述的兩個觀點談談我的看法。

### 三

產業政策的概念，是中國經濟學家早在80年代初從日本引進的。誠然，正如國際上不少人士所評價的那樣，產業政策為實現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在中國則存在着過分誇大產業政策作用的傾向，同時，中國與日本實行產業政策的基礎上有着很大差異，這一點又被明顯忽視了。

儘管在日本有不少經濟學家，特別是一批官廳經濟學家堅持認為，產業政策的作用是很大的，但這絕不是所有日本經濟學家的共識。不少日本的經濟學家一直對產業政策的作用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意見。以日本東京大學小宮隆太郎教授為代表的一派經濟學家認為，



僅僅日本經濟迅速增長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日本的產業政策對經濟增長有所貢獻。日本經濟沒有廣泛的干預也可以增長。<sup>1</sup>當然，無論戰後日本的一套產業政策有怎樣的缺點，它始終是收集、交換和傳播產業情報的非常有效的手段。<sup>2</sup>小宮教授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只是在市場失效的領域內，發揮了有限的作用。

我覺得，對於日本產業政策作用的評價，至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日本的產業政策，不是產業發展全面包攬的政策。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日本政府用資金、稅收、補貼等支持民間企業對某些被認為是重點的行業進行投資，但並沒有嚴格限制或扼殺民間企業在那些非重點產業的投資活動。另一方面，政府的支持政策是針對全行業的，因此在重點行業裏，個別企業的競爭依然十分激烈。產業政策並沒有扼殺市場經濟的活力。

第二，如同日本政府的經濟計劃一樣，其產業政策只是政府官員和財界、工會、有學識的經濟學家通力合作及意見協調的產物。儘管如此，國民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都是沒有真正約束力的。沒有人認為必須遵守政府計劃數字或對這些數字負有責任。

第三，日本的產業政策也曾產生過相當的負面作用。例如，產業政策保護和支持的往往是已經建立的產業，而不是幫助年幼的產業；

---

1 《東西方的經濟計劃》（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2 《東西方的經濟計劃》。



它在一個已經充分就業的經濟中對勞動力造成過度的需求，以致幾乎損害了所有的產業；雖然用優惠政策發展某一產業，卻使其他產業以至整個社會付出了過大的代價。

在談到產業政策的正負作用時，不能不提及南朝鮮的產業政策。許多學者在評價南朝鮮經濟高速增長的經驗時，也對其實行的產業政策讚賞備至。然而，這種評價也是不夠全面的。從60年代開始，南朝鮮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產業政策，加上各種特定的內外條件，取得了整整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到70年代後期，猛烈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國外債務，使南朝鮮陷入了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之中。經過幾番苦鬥掙扎，南朝鮮通過由“國家主導的經濟”向“市場主導的經濟”的轉軌，才渡過難關，走上了穩定、協調、高效發展的道路。其間，南朝鮮毅然放棄歧視性的產業傾斜政策，平等促進所有產業的投資，被認為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舉措之一。

當然，討論產業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時，比討論其利弊得失更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討論中日兩國產業政策運行的體制基礎存在着什麼樣的差距。

在日本是“通過市場發揮民間企業的積極性這樣一種尊重民間的自主性的立場，作為產業政策的基本宗旨”<sup>1</sup>的。所以，當人們在大力稱道日本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的成功時，不能忘記“自由市場經濟是

---

1 《現代日本經濟事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日本總研出版股份公司，1982)。





日本經濟制度的核心。”“一系列的政府措施，是在基本維護自由市場制度的體制下進行的：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始終是暫時的、補充的和間接的。”<sup>1</sup>

可是，我們自從日本引進產業政策開始，就存在着相當深的誤解。一些人以為，只要學習日本產業政策的某些具體做法，我們就可以獲得結構優化和高速增長。他們甚至進一步認為，在中國初步放權搞活以後，重新加強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就可以矯正目前這種被市場盲目扭曲的產業結構。我覺得，這種想法過於簡單了。

首先，中國市場的發育還很不健全，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還比較幼弱。特別是市場放活一塊、計劃管死一塊，從而形成的“雙軌價格”，將各種市場參數完全搞亂了。在這種情況下，依據社會經濟活動提供的扭曲信息，而所制定的產業政策，其科學性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儘管擁有了改革前難以企及的自主權，但各種行政束縛仍然存在。加上與行政干預學生的“國家慈父主義”，使得企業的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因此，企業尚不能、也不願意正確地從國家的和自己的利益關係出發，對變化的市場作出及時的反應。這樣，國家制定的產業政策就不能通過市場中介，對企業產生誘導作用。於是，所謂產業政策，就成了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和千家萬戶的個別企業的行政干預。

---

1 《現代日本經濟事典》。



如果將產業政策片面地理解為由政府選擇一些重點產業，然後用各種手段去加以扶持；同時指定一些限制產業，嚴格禁止或壓制其發展。那麼，這樣的產業政策就不是什麼新的思維。例如，我們早就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農輕重”“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等等，也可以看作是一種以傾斜發展為特徵的產業政策。所以，1987年產業政策十分叫紅的時候，有些人就尖銳地指出，產業政策是我們早已有過的東西。想用這一套來改變中國經濟結構偏畸的局面，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問題還在於，中國的產業結構七長八短，價格體系十分紊亂，要想用一套政策去矯正它，則這套政策必須無所不包、涵蓋一切。因此，我們看到的產業政策，十分繁瑣複雜，發展什麼、限制什麼，巨細無遺。當然，這並不是制定者的低能，原因在於現在的經濟規模之大、門類之多、關係之繁、矛盾之深，都是過去年代所無法比擬的。過去沒有做到的，現在就更難做到了。

有些人將產業政策收效不大的原因，歸咎於諸侯割據經濟和各種利益主體的盲目角逐。但是，進一步問，為什麼諸侯要割據封鎖市場呢？為什麼各種利益主體不能形成某種符合社會公益的合力呢？原因固然有很多，例如大家早已分析過的地方財政包乾制、企業承包制存在的某些缺陷。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是沒有一個健康的市場。地方政府和各種利益主體，寧願聽從價格的指揮棒（價格是扭曲的，所以指揮的方向也是錯誤的），而不願聽從國家產業政策的指揮棒。

由此看來，產業政策收不到預期效果，是因為價值規律的力量是人力所無法抗拒的。在一個扭曲的市場條件下，一切試圖矯正產業結構



的努力，都只不過是一種想與風車作戰的匹夫之勇。現在有一種不好的趨勢，就是在貫徹產業政策的口號下，“條條”的力量在不斷地得到加強。我覺得這是與改革的方向相背離的。早在8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學界的多數人就取得了這樣的共識：中國近30年裏數次體制變動，沒有走出“放亂收死”惡性循環的原因，在於我們只是在“條條”和“塊塊”之間進行周而復始的權力調整，而沒有把着眼點放在搞活企業和建立市場方面。至今看來，這樣的認識還是正確的和深刻的。

必須說明，我只是指出目前流行產業政策的缺陷，並不是全盤否定產業政策可能起到的作用。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後、地域廣闊，發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大國，如果我們在一個有效的運行基礎上，實行正確的產業政策，顯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問題在於我們必須盡力去創造這樣一個基礎，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平整市場和放活企業。目前，在討論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時，有必要對產業政策正本清源，而不應將產業政策作為一種口號、一種標籤，一種不加辨別的、囫圇接受的概念。

#### 四

1987年在大力推崇產業政策的同時，又提出“上游產品管住，下游產品放開”的計劃與市場的結合模式。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有趣現象。這兩個提議在體制取向上是一致的，但實際作用上是相反的。因為前者想發展的產業，正好被後者壓制了。

最近，經濟學界有些人提出以橫向的方式相結合計劃與市場，重



新詮釋了“上游產品（或基礎產品）管住，下游產品（或稱加工產品）放開”的模式（與此相提並論的縱向結合是計劃管宏觀、市場管微觀）。他們認認，至少在現階段和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這種結合方式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

但是，“上游產品管住，下游產品放開”的模式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什麼必然聯繫？為什麼實行計劃經濟一定要對一部分物資，尤其是某些生產資料的價格實行國家管制？這種管住一部分價格，放開一部分價格的辦法，是否有利於資源的最優配置？這些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似乎從來就沒有人認真論證過。而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題，卻被人們廣泛地、錯誤地加以引用。

一些人在論證某些價格必須予以管住時，常常列舉某些西方國家也對部分商品和服務進行干預，來證明管住價格的合理性。誠然，在市場經濟制度下，政府對一部分由自己負責提供的物品和勞務，進行了價格干預；而對於主要農產品和由專賣制度所規定的商品等，政府也由於不同的目的進行了干預。國家干預價格的原因一般有：一是某些部門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二是某些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三是出於特定的政策目的。干預的方式主要是國會決定、政府決定、政府認可、地方公共團體協商決定等。從現象上看，即使在市場經濟國家，對價格的干預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與我們對價格的管制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深究一下，差異就十分明顯。例如，日本政府對稻米的批發價格是嚴格管制的，但是日本沒有使用糧票對居民實行定量配給供應。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對鐵路、電力、電話通信進行價格干預，但是至今尚未聽說在這些國家裏有車票黑市、供電霸王、安電



話吃請受禮等所謂行業不正之風。從純粹經濟的角度上說，表明這些國家干預下的價格是大體接近供求（有的是國家保護下的國內市場供求）的均衡價格。因為這些價格既沒有造成需求的過旺，也沒有造成供給的短缺，相反依然穩定地保持着充足的供應和良好的服務。因此，只是從表面上比照別的國家是否干預或管制價格是膚淺的，只有深入研究應該如何科學地干預價格和決定價格，才能使我們擺脫愈管愈少、愈管愈缺、愈管愈差、愈管愈死的困境。

只要看一下現實情況，就可以清楚地說明，像目前中國這樣對基礎產品和基礎設施的價格管制，是斷然沒有出路的。目前中國的燃料工業問題最為突出。石油部門原來是利稅上繳大戶，從1988年開始出現全行業虧損，當年虧損14億元，1989年虧損42億元，1990年預計虧損70億元以上。如果價格不調，“八五”虧損會愈來愈大。由於生產經營虧損，勘探開發資金不足，“七五”期間生產的石油總量超過了同期新增的探明儲量，吃了儲量的老本。全國統配煤礦虧損也愈來愈嚴重。統配煤礦1985年開始承包時，財政部核定的每年虧損包乾額為3億元，實際當年虧損12億元，1986年虧損25.6億元，1987年虧損31.2億元，1988年虧損90.3億元，1990年預計虧損100億元以上。由於吃飯錢都不夠，建設必然要打折扣。“七五”期間預計開採規模8000萬噸，比計劃少1億噸，新增投產能力完成1.2億噸，比計劃少4700萬噸；“七五”末期結轉“八五”投資規模完成9588萬噸，比計劃少5412萬噸。燃料工業的接替資源和後續生產能力卻嚴重不足，眼前的“油水快流”只是將矛盾推向了未來。此外，鐵路等基礎部門由於價格偏低造成的困難也是日積月累，幾乎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境地。



對於基礎產品和基礎服務，我們一方面在價格上採取歧視性政策，使得這些部門產生巨額虧損；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又十分需要這些部門，財政就不得不給予補貼和投入實際上無法償還的大量投資。這樣，不但這些部門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甚至日趨萎縮；而事實上，我們全社會為之付出的價格是不低的。據有關部門測算，加上各種補貼、附加收費、無償的投資等，前幾年我們社會實際支付的煤炭價格每噸已經達到80元以上。這樣的價格，對於我們這個煤炭資源豐富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國家來說，應當說是不低的。

忽視價格作用，濫用財政補貼，既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大大挫傷了生產單位的積極性，導致某些基礎部門內部管理十分落後。同時，某些部門產生了“少賺不如虧損，少虧不如多虧”的消極心理，進而形成了各種花樣翻新的對付國家的手段。這些手段大體可分為“五部曲”：第一部，虛誇成本，提出遠遠超出合理水平的高價格，明知國家不會如數批准，準備讓砍一刀。這種不是通過自身努力，而是企圖用高價格向全社會索取利潤的做法，可稱之曰“吃社會”。第二部，國家不准提高價格，這些單位就報虧損，請求給予補貼。要求的補貼額也往往因為過大，也被砍一刀，這可稱之曰“吃財政”。第三部，既然是虧損，財政補貼不能滿足胃口，銀行的貸款就不予歸還，這又稱之曰“吃銀行”。第四部，不該進成本的進了成本，但該進成本的偏又不進；一方面虛誇成本，另一方面成本構成不完全，折舊少提或不提；這種吃老本的行為，又可稱之曰“吃自己”。第五部，走歪門子增加收入、多發獎金，採取“虧嘔虧等”的欺騙手段，去“吃用戶”。經過這“五部曲”，我們恐怕早已支付了比放開價格還要高



的價格。那麼，我們繼續管住的道理何在呢？

可是，有些人堅持認為，對基礎部門管住價格，給予補貼，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慣常做法，以煤炭為例，如德國、日本和劇變前的波蘭。我認為，這同樣要做一些深入的分析。補貼可以出於兩種不同的目的，也可以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就以上列舉的三個國家來說，德國（西德）、日本是發達的工業國家，勞動力成本十分高昂。在沒有國家補貼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開放經濟，它們的煤炭生產應該趨於衰落和萎縮，以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但是，政府從戰略上考慮，要維持本國的能源生產能力，必須給該行業以財政支持。得到補貼以後，這些行業就可以以開放性的市場競爭價格（甚至是低於成本的，但是市場決定的價格）出售產品。而在波蘭就不一樣，波蘭的煤炭價格是政府決定的，實物由計劃分配，與市場供求脫節，因此其價格是大大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的。結果，波蘭無效益的、無節制的巨額財政補貼，終於導致深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留下了許許多多悔不當初的憾恨。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是否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無論對何種產品實行價格管制和計劃分配，都是不可能不付出代價的。權衡利弊得失，我們應該將這些產品的範圍控制在盡可能小的合理範圍內。

第二，對那些必須管住價格的少數商品和勞務，國家制定價格應當尊重價值規律和市場供求規律。具體原則是，這種定價不會造成供給和需求，尤其是供給短缺，不會造成定額配給和黑市買賣的大量發生。



第三，即使對基礎產品和基礎設施服務的價格，也並非都要實行國家管理。只要是能夠在競爭條件下節約資源的部門，就應該實行市場調節。而部門的重要性不應成為實行計劃管理的惟一理由。

第四，若國家對某一部分實行補貼，實際上是向全社會分攤了價格負擔，而這種分攤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合理的。濫用補貼，只會導致生產低效、資源浪費和財政蝕損的結果。

在這裏需要強調一點，放開某種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只是造就了形成競爭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基礎部門的企業組織具有高度的壟斷性，簡單地放開價格管制，也幾乎不可能使價格相對穩定在供求均衡點。在中國的一些基礎行業裏，由一個或少數幾個企業佔據了全部或絕大部分市場，其中有些還算不得企業，而只是名為公司的行政管理部門。因此，要放開價格、促進競爭、形成市場，就必須首先對現有高度壟斷的企業組織進行改造和分解，使得在同一個市場上有足夠的競爭夥伴，從而開發整個產業的活力。

當然，對那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產業部門，一般是應由國家進行管理的。但是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不一定都得由國家直接經營，相反應盡可能交給企業法人去經營；二是應嚴格確定自然壟斷的定義，隨着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有些原是自然壟斷的部門，可以變成為具有競爭性的部門。例如，日本的國營鐵路，原來被認為是自然壟斷性部門。自從高速公路大量修建，社會車輛保有量迅猛增加，航空、航海等替代運輸方式的飛速發展，使得鐵路運輸也面臨着巨大的競爭壓力。同時，由於電腦技術日臻完善，經濟核算手段不斷提高，鐵路幹線之間，以及在同一路線上同時經營的鐵路營運公司之





間，也可以開展競爭。因此，近年日本政府決定對效率日益下降的國鐵，實行民營化改革，以促進競爭，提高效率。

## 五

對於本文提出的兩個重大問題，上述的評論和分析，是遠遠不夠充分和深刻的。在這裏只是想提出問題，引起經濟學界以及實際工作部門人士的注意，從而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展開討論，以取得對計劃和市場關係的更新認識。

目前，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有一種含混不清的表述，即我們既不搞完全的集中統一的指令性計劃體制，也不搞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是指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那麼，到底這是什麼樣的體制呢？如果就既發揮計劃的作用，也發揮市場的作用來說，這種表達幾乎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經濟模式。這是因為進行改革前的蘇聯，曾認為是典型的計劃經濟國家，在某些商品零售業、修理業等領域，也存在着市場經濟的成分。另一端是香港，香港被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後堡壘”。香港當局也稱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是，香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也不是無所作為的，它通過土地批租、某些公共項目的投資等方式，對香港經濟產生着重大影響。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處於純粹計劃和純粹市場體制下的國家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那麼，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就應該重新作出具有更加明確規定性的概括。我相信，只要有一個健康的討論氣氛和認真的求實精神，我們對目標模式的認識會愈來愈清晰的。



# 論走出“放亂收死” 的循環

10多年前，不少中國經濟學家在總結建國以來數次經濟體制變動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已經不止一次改革經濟體制，但是往往從行政權力的轉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環。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在1979年的一次發言中指出：“20多年來我們經常爭論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問題，也就是按條條管、還是按塊塊管的問題。但是，不論是按條條管、還是按塊塊管，都是由行政機關採用行政方法來管，而不讓企業自己按照客觀經濟規律來管”<sup>1</sup>。這些精闢的分析，10多年來，已經成為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共識。1989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工業速度跌落、市場循環不暢、經濟效益下降、企業經營困難的現象。這些現象是在針對前數年劇烈通貨膨脹，而採取各項治理整頓的措施後產生的。於是，人們腦

---

編按：本文原載於《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2期（1991）。

1 薛暮橋：《根據實踐經驗來回顧20多年的經濟工作》（1979），原載於《薛暮橋經濟論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海裏自然就會提出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體制在經歷了10多年的改革後，是否又重新陷入了“放亂收死”的循環。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正面的回答。

## 一、放：權力的消長和迷失

既然改革就是要改變舊體制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端，那麼改革別無選擇地要從下放經濟管理的許可權起步。10多年來，中央管理經濟的範圍和比重已經明顯縮小，而地方和企業的權力相應有所擴大。

在指令性計劃方面，國家計委下達的工業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品種，由1984年的120多種縮減為60種左右；國務院各專業部門下達的指令性計劃產品品種從1900多種減少到380種左右。據國家計委一課題組調查，省級以上經濟管理部門下達的指令性計劃產品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僅為16.2%，其中國家計委下達的佔9.7%，國務院主管部佔3.3%，省級計委佔2.5%，省廳局佔0.7%。同時，國家統配物資品種由256種減為26種，指令性分配的部管物資由316種減少到45種。

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1981～1990年，國家財政通過減稅讓利、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等途徑，給國營工交企業增加財力累計達4200億元，扣除徵收“兩金”新稅拿回的1100億元，企業淨增加自有財力3100億元。按可比口徑計算，國家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37.2%，下降到1990年的21.6%；中央財政收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下降，財政困難加劇。



以上兩組簡單的統計資料，可以從一個角度說明，不管存在着如何分歧的意見，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指令性計劃體制，畢竟被削弱和分解了。但是，改革之初就提出的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讓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成為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的目的並沒有實現。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級行政主管機關對企業還有較多的干預；二是企業對行政權力的嚴重依賴，這也造成了企業的雙重行為。一方面向上級主管機關力爭產品自銷權，大聲呼籲要鬆綁放權，經營自主；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甚至還要不斷擴大平價原材料的供應，熱中於進入“雙保”列，再次投入行政機關的懷抱。

於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對 10 多年來的放權，就會有不同的判斷。一些人認為，由於這些年來過分向企業簡政放權，造成了宏觀管理失控。但另一些人認為，對企業的放權還沒有到位，目前企業實際上並沒有多少自主權。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認識，實踐中必然導致矛盾的政策。近兩年，我們在不同的會議上經常聽到不同的聲音。在計劃會議上強調宏觀控制；財政會議上要求提高兩個比重；企業工作會議上一片進一步放權讓利呼聲。因此，放在收的壓力下受阻，而收又在放的呼聲中退讓，放和收始終處於相持和膠着的狀態。

為了統一認識，我們不得不重新討論“放”的經濟學意義。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是基於這樣的設想：將國家辦成一個大工廠，在這個大工廠內，眾多的生產單位原有的市場競爭關係，被全國範圍內的核算關係所取代。而國家經濟管理部門用經過精心計算的計劃，去類比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但是經過數十年的實踐，人們發現：無論電腦的功能如何迅速提高，也無法滿足愈來愈複雜的社會經



濟關係所提出的計算課題：生產單位從國家計劃中所獲取的社會供給和需求信息的成本，比從市場上獲得的更昂貴；沒有生死攸關的競爭，企業不可能發揮出最大的生產和發展的潛力。因此，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不約而同地先後發動了經濟改革。“放”似乎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第一步，“放”的目的就是用企業外部的市場競爭關係，取代國家統管下的財務核算和行政評比。

但是，經過 10 多年時斷時續、時收時放的改革，中國仍未能形成有效配置資源公平競爭的市場。這樣，中央經濟主管部門在原有行政權力被削弱的情况下，由於未能掌握適應新體制的宏觀調控手段，也沒有建立能夠發揮國家與企業間中介作用的市場，所以常常面對成堆的問題而產生一種失落感。而企業也由於既無力抵制來自各方面的行政干預（同時也難以得到更多的照顧），又不能在市場上尋得新的依託，從而總是埋怨經營環境不好和自主權仍然過小。

就在人們討論中央已經放了很多權，企業卻為何至今仍沒有獲得相應權力的時候，另外兩個經濟權力主體早已悄然崛起。這些年來的改革，主要“是在行政系統內部各層次間劃分決策權，即把原來由中央掌握的各種決策權分給地方和部門”<sup>1</sup>。這使地方和部門的權力得到明顯增強，而條塊分割的現象日趨嚴重。條塊分割的後果，上使中央失去有效的宏觀調控能力，下使企業不能擺脫行政機關附屬物的地位。儘管這個問題已逐步被人們所認識，但最近的動向值得關注：在

1 吳敬璠：《國民經濟的困境和出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 6 期（1990）。



企圖削弱塊塊力量的思想指導下，由行政機關選定、捏合和支持的一批準備實行計劃單列的企業集團正在籌建。一些原來下放地方的企業要上收，一些原來相對獨立的企業要歸併，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某些行業的壟斷程度。將上級（包括中央）機關的權力下放給下級行政機關（實行計劃單列也是一種權力下放，如賦予單列城市以省的管理許可權，賦予單列企業集團以部的管理許可權），無論是加強塊塊，還是加強條條，都是對企業權力的剝奪，對市場活力的扼殺。由於放權的方向發生了偏差，不可避免地會使經濟陷入混亂。

## 二、亂：市場機制的是與非

由 1988 年全國性的劇烈通貨膨脹為發端，國民經濟中種種一度被人視而不見的矛盾和問題得以暴露。對此，有兩種不同的判斷。一些人認為，這是改革步驟失當，中途停頓所致；另一些人則將經濟生活中的“亂”歸咎於市場機制。在一段時間裏，對市場機制進行相當規模的口誅筆伐。他們認為：

1. “市場競爭導致了盲目布點、重複引進、一哄而起的結構畸型。”其實，中國產業結構失調的問題，並不是近 10 多年來才發生的。在原來僵化的命令經濟體制下，產業結構已嚴重失調，更曾經數度將中國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當然，這些年的問題的確有着與過去不同的特點，但完全歸咎於引進了市場機制則是很不公正的。從體制上分析，造成結構失調的主要原因為：一是不負任何責任的行政決策還在廣泛地起着作用；二是市場不健全，扭曲的價格信號對各



個投資主體作了錯誤的誘導。只有認真分析原因，對症下藥，而不是一味地指責市場，才有可能抓住優化產業結構的時機。

2. “市場競爭造成以小擠大、以劣擠優，使國有大中型企業陷入了困境。”這也是一種缺乏分析的批評。市場競爭規律是優勝劣汰，然而在中國卻出現反常現象，原因在於沒有建立相對公正的市場規則和沒有賦予大中型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機制和條件。如果以為只要將國有大中型企業保護在市場競爭之外，日子就會好過，那結果只會適得其反。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經營困難，有關部門從1990年4月1日起，對234戶重點企業實行“雙保”。但事實證明，“雙保”並沒有使這些企業擺脫困難，相反經濟效益進一步下降。同時，實行“雙保”和不實行“雙保”的企業，競爭的條件更不平等。對此，不少人尖銳地批評：實行“雙保”是要在部分企業裏恢復傳統的產品經濟體制。那麼，對這些企業只會愈保愈沒活力，愈保愈沒出息。

3. “市場會帶來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這種說法在一定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因依靠市場本身並不能解決收入均等化的問題，相反它要求拉開人們的收入檔次來作為市場競爭的動力。但是，市場已被實踐證明是有效利用資源、增加社會財富的重要手段。我們只有先在市場上將蛋糕做大，然後通過政府再分配的功能，將蛋糕分得公正一些。如果我們因噎廢食，排斥市場，那就只能死守於短缺和貧窮。

4. “滋生了社會腐敗現象”。確實當經濟生活中引入了市場機制後，貨幣和權力交換的機會變得愈來愈多，人們追求貨幣的欲望也愈來愈強烈，這就是近數年腐敗現象愈來愈嚴重的原因。但是，以平等競爭為原則的市場，本身並不必然滋生腐敗。而在幾乎完全排斥市場



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腐敗亦非但沒有絕跡，相反一再成為“三反”、“五反”、“四清”等運動的打擊重點。這是由於改革措施和順序不當，在部分市場化的同時，大量行政干預、行政特權、行政管制仍然存留，腐敗便因此而惡性發展。所以從體制上清除腐敗的根本辦法，不是取消市場，而是進一步擴大市場，減少行政干預，增加經濟行為的透明度。

正確的結論應當是，就像不能將市場等同於資本主義一樣，也不能將市場等同於“混亂”。經濟的混亂根源於體制的混亂。我們現在的體制是一種“兩不像”的體制，計劃和市場都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改革的方向仍然應是繼續擴大市場的作用，同時建立起適應商品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和企業制度。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 三、收：加重了我們面臨的困難

為治理通貨膨脹而採取控制社會總需求的措施，是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通常的做法。在這個過程中，難免要付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企業經營困難的代價。應當肯定的是，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可穩定市場價格，平衡國際收支，增加外匯儲備，成績是巨大的。但是，也應看到，在治理整頓中過多地採取或過長地保留（有些行政措施不得不暫時使用）行政干預，將會損害已有的改革成果，窒息經濟的生機活力。事實上，某些措施已經加重了我們面臨的困難。

1. 經濟方面，主要表現在“三個抬頭”，即政企不分抬頭、平均主義抬頭和集體負責而實為無人負責抬頭。





(1) 政企不分抬頭。上至中央機關，下至頂頭上司的主管機關，無不插手於企業的大小事務。前數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設立的負責宏觀調控機構紛紛被撤併或虛置，而管理行業、企業微觀事務的機構又陸續恢復。這樣，原來就與行政機關關係較深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首先喪失了活力。有的大企業領導人慨嘆道：“現在是國家管微觀，企業管宏觀，這樣經濟如何搞得不好？”事實上，現在國家行政機關對企業愈管愈細，愈來愈像一個企業總部；而企業卻愈來愈像行政機關。例如，不少地方要求大企業與政府機關對口設立機構，甚至還要設統戰部等。有些機構原來是科室級的，要上升到正處級，結果機構林立，幹部隊伍龐大。職工說：“公司領導一個排，副總工程師一個連，處級幹部一個加強團。一個企業如何養得起這些閒人？”

(2) 平均主義抬頭。企業間（主要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經濟成分間）的收入分配懸殊和企業內的平均主義並存，是當前分配領域中的突出問題。尤其自1989年下半年以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下，平均主義變得愈來愈嚴重。從現象上看，企業職工的情緒是平穩了，但生產的積極性也隨之大大低落。原來相當多的企業，就是上班拿工資，幹活加獎金；現在獎金平均分，乾脆沒有人正經幹活了。企業裏還流傳着這樣的對聯：“上午泡、下午泡、天天都泡，你拿獎、我拿獎、人人拿獎”。橫批是：“一不做二不休”（意思是一上班不做，二誰也不“曠工”）。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平均主義不但嚴重腐蝕着廣大職工的意志，還將嚴重影響今後數代人的素質。像這樣用平均主義的辦法，是止痛而不是醫病，只能換得暫時的穩定，遲早是要出問題的。



(3)集體負責而實為無人負責抬頭。廠長負責制，相對原來體制下的集體負責而實為無人負責，較為進步，並被寫進了《企業法》，受到法律的保護。然而，現在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又重新回到無人負責的狀況。不少廠長拒絕接受新的一輪承包，以廠長為中心的生產經營指揮系統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的狀態。企業負責人反映，“兩心”變“一心”，僅僅靠廠長和書記“哥倆好”還不行，更重要的是具體明確各自的職責範圍，制定出一個可以遵循的章法來。

由於微觀經濟方面的“三個抬頭”，企業的處境十分困難。廠長經理們說，企業受的內傷要比外傷還要嚴重，倘若不早日加以解決，企業數年內也緩不過勁來。

2. 經濟方面，上收了不少地方、部門和企業的決策許可權，加強了對經濟活動的行政控制，而這些常常是在產業政策的名義下進行的，在此有必要重點分析一下產業政策的問題。

產業政策是80年代初引進，1987年突然走紅，1989年開始成為事實的。現在產業政策已經被多數具有各種理論背景的經濟學家所接受，成為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少有的、沒有引起明顯爭論的問題。但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和實際工作部門對產業政策仍存在着很深的誤解。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討論。

第一，產業政策的作用。

先談談如何評價日本的產業政策。目前被介紹到中國來的觀點，只為日本一部分經濟學家所堅持，主要是官廳經濟學家，他們認為產業政策對日本的高速增長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日本也有不少經濟學家不同意這種評價。他們認為，僅僅日本經濟迅速增加這一事



實，並不能證明日本的產業政策對經濟增長有所貢獻。日本經濟沒有廣泛的干預也可以增長。<sup>1</sup>日本東京大學小宮隆太郎教授是這種意見的代表人物。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只是在市場失效的領域裏，發揮了有限的作用。

綜觀大量資料文獻，對於日本產業政策作用的評價，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

首先，日本的產業政策不是全面包攬的政策。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政府支持了某些重點行業，但並不嚴格限制非重點行業裏的投資活動。另一方面，政府的扶持政策是針對全行業的。在一個行業裏，各個企業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產業政策並沒有扼殺市場的活力。

其次，如同日本政府的經濟計劃一樣，產業政策只是各方面意見協調的產物。所以，國民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沒有人認為必須遵守政府計劃數字或需要對這些數字負責。

再次，日本的產業政策也曾產生過相當的副作用。例如，在一個已經充分就業的經濟中，造成了對勞動力的過度需求，並幾乎損害了所有的產業；而用優惠政策發展某一產業，卻使其他產業以至整個社會付出了過大的代價。

討論一下南朝鮮的產業政策，也許有助於我們獲得較全面的認識。從60年代開始，南朝鮮實行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的產業政策，加上當時各種特定的內外條件，取得了整整20年的高速增長。但是到

---

1 小宮隆太郎：《東西方的經濟計劃》（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70年代後期，猛烈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國際債務，使南朝鮮陷入了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之中。經過數番苦鬥掙扎，南朝鮮通過由“國家主導的經濟”向“市場主導的經濟”的轉軌，才渡過難關，走上了穩定、協調、高效發展的道路。其中，南朝鮮毅然放棄歧視性的產業傾斜政策，並平等促進所有產業的投資，被認為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舉措之一。<sup>1</sup>

再看看近兩年來中國實行產業政策的效果如何。當然，我們無法假設如果沒有產業政策現在的情況會怎樣；也無法斷言目前產業結構發生的某些變化只是緊縮政策取得的效果，而與產業政策並無什麼關係。但是，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目前我們對產業政策作用的估價和期望，已高得遠遠脫離了實際。可以這樣說，產業政策規定要限制的產品，只有當它失去了市場需求時，才真正被“限制”住，而只要市場還有一線需求、預期利潤還有一定的吸引力，那麼無論多少紅頭文件也別想限制住。“八五”計劃安排項目時，各地一哄而起要上乙烯，光這一個產品就衝得產業政策招架不住，成了誰也不想多看一眼的一紙空文。

當然，這並不是制定者和執行者的低能。問題在於，中國的產業結構七長八短，價格體系十分紊亂，要想用一套政策去矯正它，則這套政策必須無所不包、涵蓋一切。但是，現在的經濟規模之大、門類

---

1 南相佑：《1979～1983年南朝鮮國民經濟穩定綜合對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5、6期（1990）。



之多、變化之快、關係之繁、矛盾之深，加上利益主體多元化，無論提出什麼樣的產業政策都是難以奏效的。

第二，中國與日本實行產業政策的體制差異。

一些人以為，只要學習日本產業政策的某些具體做法，便可以獲得結構優化和高速增長。然而，這種想法過於簡單了。日本是“通過市場發揮民間企業的積極性這樣一種尊重民間的自主性的立場，作為產業政策的基本宗者”<sup>1</sup>的。所以，當人們在大力稱道日本的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的成功時，不要忘記“自由市場經濟是日本經濟制度的核心”；“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是在基本維護自由市場制度的體制下進行的：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始終是暫時的、補充的和間接的”。<sup>2</sup>

而中國的情況就很不相同了。首先，中國市場的發育還很不健全，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還很弱小。特別是市場放活一塊、計劃管死一塊，從而形成的“雙軌價格”，將各種市場參數完全搞亂了。在這種情況下，依據社會經濟活動提供的扭曲信息所制定出來的產業政策，其科學性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儘管擁有了改革前難以企及的自主權，但各種行動束縛仍然存在。加上與行政干預學生的“國家慈父主義”，使得企業的預算約束依然軟化，因此，企業尚不能、

---

1 《現代日本經濟事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日本總研出版股份公司，1982）。順便提一下，何新的文章稱從這本事典裏得出了日本搞的是計劃經濟的判斷，筆者認為其理解有誤。

2 《現代日本經濟事典》。



也不願正確地從國家的和自己的利益關係出發，對變化的市場作出及時的反應。這樣，國家制定的產業政策就不能通過市場中介，對企業發生誘導作用。於是，所謂產業政策，就造成了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和千家萬戶的個別企業的直接干預。

如果將產業政策片面地理解為由政府選擇一些重點產業，然後用各種手段加以扶持，同時指定一些產業，嚴格禁止或壓制其發展；那麼，這樣的產業政策就不是什麼新的思維。例如，我們早就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先導”、“農輕重”、“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等等，也可以看作是一種以傾斜發展為特徵的產業政策。所以，1978年產業政策十分走紅的時候，有些人就尖銳地指出，產業政策是我們早已有過的東西。想用產業政策來改變中國經濟結構偏畸的局面，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 四、死：癥結在於精神疲軟

在分析為何經濟缺乏活力時，一些人認為，一是資金緊缺，二是市場疲軟。事實到底怎樣呢？

去年，銀行各項貸款 2731 億元，比上年多增加 880 億元，增長 22%；其中工業流動資金貸款增加了 1019 億元，比上年多增加 320 億元，增長 26.2%。而去年鄉鎮以上工業總產值只增長 6%。據此計算，去年每增加百元工業總產值，銀行便增加 51 元工業流動資金貸款。1986~1989 年，工業總產值與工業流動資金貸款增長的比例平均僅為 100 元：30 元。去年無論是工業流動資金貸款還是銀行各項貸



款增長速度，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即使把物價上漲因素計算進去，也大大超過了工業生產和經濟發展正常需要的數額。顯然，資金供應已足夠充足，不應構成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

市場疲軟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至1990年底，全國工業企業產品資金佔有1140億元，比上年增長27.8%，而商業企業積壓更多。如果能夠用大幅度增加投資等辦法去啟動最終需求，從而讓這些工商企業的庫存產品都銷出去，當然可以暫時緩解目前的困難。但是，這畢竟只是剪箭療法，只剪去了箭桿，而真正要命的箭頭卻還留在體內。據對大中型企業調查，在國內市場上暢銷的產品只佔58%。而國家每季度監督抽查的產品，總有25%左右不合格，企業生產中不良產品的損失率約佔產值10%~15%。據有關部門對部分城市的調查，中國工業產品的市場抽查商品合格率僅為55%。如果讓這些良莠不分的產品順順當地銷出去，不就意味着我們的企業只能永遠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嗎？

因此，啟動市場不是根本辦法，推進改革才是出路。而推進改革的難點在於精神疲軟。現在，社會上已經沒有了前數年那樣的一股改革熱情和銳氣。一些幹部安於現狀，怕犯錯誤，不敢有所作為。而原來十分熱鬧的經濟學界亦變得冷冷清清。企業裏的工人不願幹活，廠長不肯承包的現象頗為普遍。一些群眾對改革大業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我認為，這些才是當前經濟社會生活中最值得重視的問題。

在這裏不由得想起了毛澤東曾經引用過清人龔自珍的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只有不拘陳規陋習，衝破思想牢籠，將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一切經濟困難都可克服，改革才會大有希望。



## 五、走出“放亂收死”的循環

現在一個最令人擔心的傾向是，不是將擺脫困境的基點放在推進改革上，而是希冀通過進一步放寬貨幣供應，刺激最終需求，將工業增長速度重新拉上去。這樣，財政、企業固然可以得到一時的痛快，但深層矛盾被掩蓋，體制缺陷仍然存在，這樣，不需很長的時間，較之前數年更加嚴重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就會到來。目前，銀行貨幣投放的速度還在加快，可能預示着下一輪“放亂收死”的循環正在開始。

前不久，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再次重申了一貫的改革方針，並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內容和步驟。綱領制定以後，關鍵在於行動。文件雖能鼓舞人心，但一兩個具體有效的行動更能讓人民群眾獲得切實的感受。為此，必須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配套改革措施。要在控制物價總水平的前提下，加快價格改革，健全市場規範，重點解決價格“雙軌制”問題。宏觀調控要儘早實現兩個轉變，即由直接調控為主變為間接調控為主；由行政手段為主變為經濟手段為主。要進一步搞活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積極推行政企分開，理順產權關係，深化勞動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強化管理意識，提高企業素質。如果今後的工作重點真正轉到改革上來，我們完全可以避免陷入新的一輪循環。





# 1994年： 改革攻堅和制度創新

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一重大戰略決策，表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從以重點突破為主的階段進入了全面攻堅階段。1994年，中國要在經濟體制的幾個主要方面，展開一場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21世紀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新年伊始，這場深刻而又壯闊的戰役拉開了序幕。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和高度關注的大事情，也是全世界矚目的大事情。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對我們黨和政府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對我們國家也是一個前途所繫的關口。

應當看到，當前經濟環境並不寬鬆。1993年年底，由於對改革方案的誤解和預期通貨膨脹的心理影響，出現了糧食等價格過急上漲和局部搶購家電等商品的情況。不過由於黨中央、國務院反應迅速，措施得當，全國市場物價迅即趨於平衡。但是，這次市場價格風波帶

---

編按：本文原載於《改革》雜誌，第2期（1994）。文章發表時，作者使用了筆名：石雨。



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信息。我們要見微知著，看到國民經濟中存在着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儘管在去年宏觀調控中有所紓緩，但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改革仍存在着一定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提出了改革時機是否合適、方案是否完備和準備是否充分等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必須在更廣闊的背景下，才能討論清楚。

## 一、改革戰略和歷史教訓

理論界一般認為，中國改革實行漸進戰略，而沒有採取激進戰略，是取得成功的關鍵。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這個結論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深入研究中國改革的進程，便會發現這個結論並不全面。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一成不變地以漸進方式向前發展的，而是根據不同的改革內容，不同的改革階段，相應採取了“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戰略，就是說“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漸進，又不失時機地在重要環節取得突破，帶動改革全局”。<sup>1</sup>

中國改革的漸進方式，被經濟學家總結為“雙軌制”過渡方式，具有“難點迂迴”和“體制外包抄”的特點。中國改革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這種方式，改革的失誤又在多大程度上歸咎於這種方式，經濟學界一直存在着爭論。不管這種爭論還要持續多久，經濟學界的普遍看法是，時至今日改革應當全面轉入難點攻堅和體制創新的

---

1 引自《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



階段。如果不能適時實現改革戰略的轉換，一些過去實行的過渡性改革措施，就有可能愈來愈不適應已發展的新情況，其負面反應也會愈來愈顯露出來。

應當看到，某些國家當初接受激進改革方式，並在相當範圍獲得支持，正是群眾對無所作為、慢慢來的改革戰略導致經濟長期陷入危機狀態而徹底失望的一種極端反應。多少年前，這些國家的決策者對體制有一種惰性心態：在經濟情況較好、日子還過得去的時候，就往往不思改革，覺得計劃經濟還能混下去；在經濟情況緊張得幾乎過不下去的時候，又覺得改革無法進行，似乎日子還得靠計劃經濟來維持。在改革方案的研究制訂過程中，決策者的思維邏輯也往往難以擺脫一個“怪圈”。當經濟生活中困難成堆時，決策者想改革，開始研究方案；當方案制定出來準備實施時，發現改革會有一些負面反應，並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這時決策者開始猶豫不決，憂心忡忡，結果他們並不在改革的負面反應與不改革帶來的困難間進行權衡，也不在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和廣大群眾的願望間作出正確選擇，方案就被輕率放棄；於是人們的識見又回到了“怪圈”的原點。周而復始，議而不決。正因為如此，這些國家的改革長時期處於僵持、膠着、停滯狀態，時機一錯再錯，終於無可奈何花落去，改革成為一場沒有做圓的舊夢。

可見為了降低改革成本、鞏固改革成果，我們在時機成熟、條件許可下，便應當有計劃、有部署地打數場改革攻堅戰。經驗告訴我們，根據體制的不同方面，可以將改革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改革沒有明顯的階段特徵，既無明顯的始點，也無明顯的終點，而且各種改革方案可以交替進行，例如，企業制度的改革；另一類是改革有着明



顯的階段特徵，儘管達到目標可以分步，但步驟比較分明，對統一性、規範化要求較高，例如財稅改革。因此，改革必須按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將總體性漸進和階段性突破結合起來。

## 二、歷史的機遇

在一個時期採取什麼樣的改革戰略，取決於歷史賦予的機遇，儘管宏觀經濟中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我們認為當前仍然是改革最有利的時機。應該抓住機遇，闖過這些解決經濟生活中深層矛盾的改革難關。

當前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特別是 1992 年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勝利召開，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擺脫了姓“資”姓“社”的觀念束縛，思想獲得解放。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在沒有過多顧慮和障礙的情況下，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從中國國情出發，針對當前經濟生活中的突出問題，制定出比較積極徹底的改革方案。十四屆三中全會為實施當前的改革方案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過去的改革中，我們曾經歷過不少難關，有的關我們闖過去了，有的關我們沒有闖過去。這裏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挫折和教訓。今年的改革方案總結了多年的實踐經驗，就其原則、框架來說已經醞釀多年。這些年來，理論界也反覆討論、比較，取得了大多數共識。去年在前進中發生的一些問題，中央及時採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一系列措施而得以解決，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積極成效。這為今年



的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今後改革過程中及時妥善地處理各種突發情況積累了經驗。

自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很好。市場供應十分豐富，人民生活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人民對改革的承受能力也大大提高。從國際形勢看，我們至少可以贏得 10 年以上的和平環境。最近數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普遍蕭條，大量資金尋求出路。外國政治家和投資者普遍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外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入中國。

因此，必須緊緊抓住和十分珍惜當前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將我們醞釀多年想幹而又沒有條件幹的改革堅決地推出去。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抓住和利用這一歷史機遇，不能攻克體制改革中的重重難關，不能很好地解決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就不可能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步戰略目標，甚至有可能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裏陷入高額通貨膨脹和經濟低速徘徊並存的狀況。

### 三、改革的時機

有些人認為，當前改革環境比較緊張，準備工作又比較倉促，於是提出改革是否可以推遲出台，等到環境鬆一點再從長計議。由此引出兩個問題需要討論：一是改革推遲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二是推遲改革能否等到寬鬆的環境。

從技術上來說，財稅改革和外匯改革都需要在一個日曆年度和會計年度起始，否則必須至少推遲一年。其實即使再推遲一年或數年，



方案準備再充分一些，也不能保證實行起來不出一點毛病，但喪失了這次機遇，甚至可能會遇到更大的困難。事實上如果我們在三中全會以後，不迅速利用前面分析的有利時機，在改革方案邁出較大步子，在政治上損失將會很大。

從改革的緊迫性來說，方案的出台也不宜再拖了。第一，這些年中央稅收撒漏十分嚴重，中央財政日益虛弱，再不改革財稅體制，日子就要過不下去了。國內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呈下降的趨勢，這個比例於1979年為26.2%，1992年下降為16.6%。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亦不斷下降，這個比例於1979年為46.8%，1992年下降為45.6%。如果扣除債務收入，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則從1981年的57.6%，降到1992年的38.6%。第二，進口上升，出口下降，逆差擴大，國家收匯減少，資本外流勢頭很猛，再不改革外匯體制，已經難以為繼。去年進出口總額為19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5%左右。其中出口總額約91億美元，增長7%；進口總額約1000億美元，增長24%。進出口增長幅度相差3倍以上。在出口總額增長中，主要是三資企業出口增長，國家可以收到外匯的國有企業出口是下降的。

寬鬆的改革環境只能在改革中得到。多少年來，傳統計劃體制的“投資飢渴症”久治不癒，競相上項目、鋪攤子，攀比速度，擴張規模愈演愈烈，已經成為宏觀失控的根源，再不改革投資體制和金融體制，除劇烈的通貨膨脹難以抑制外，還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問題。在通貨膨脹壓力較大的情況下，進行改革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改革可能從根本上抑制通貨膨脹的發生。不改革卻不可能等來一個寬鬆的環境。



## 四、改革的方案

我們認為改革方案的準備工作已是比較充分的。中央有關部門集中了各方面的優秀人才和骨幹力量，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後才制定了方案。這些方案既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並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又考慮了中國特色和當前的現實情況，盡可能地照顧各方面的利益。

當然，任何改革方案都不可能事先設計得完美無缺，只能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實踐、不斷總結、不斷調整。

評判方案是否完善最終既要看實踐，也要傾聽各種不同的聲音，對各種意見更要分析，不能人云亦云，動搖決心。其實有些對改革方案的微詞，只是反映了一種對這次財稅改革和外匯改革的抵觸情緒。確實這次改革在觸及各方面利益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明顯地大於以前的改革。一般來說，當一項改革可以帶來比較直接的利益而又不觸及現有利益格局時，不會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且具有很強的自發性；相反，當一項改革帶來的利益不是那麼直接而又要觸及現有利益格局，這樣的改革就比較困難，需要較高的自覺性，往往需要做非常細緻的發動工作。比如有數個熱點改革在其起步時，根本就沒有完備的方案和法規準備，可是卻一哄而起，要想適當抑制都很困難；加上並沒有人因為方案的不完備而提意見、而不願意幹，出了問題也從不認真反思。所以，我們不能不從利益的角度來分析各種意見。



## 五、改革的風險

目前最大的風險並不在改革本身，相反不改革風險將更大。目前的風險主要在：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超過了國力能夠承受的範圍；農業問題依然突出，整體農業形勢尚不容樂觀；通貨膨脹的壓力有進一步蓄積的趨勢。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使各方面的經濟關係繃得過緊，對改革推進和社會穩定威脅很大。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的問題，在去年的宏觀調控中沒有得到解決。199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到1.15萬億元以上，比上年增長47%左右，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7.5%，其中，國有單位投資8350億元，比上年增長58%左右；全年國有單位在建總規模達3.3萬億元，比上年擴大四成，未完工程尚需投資1.9萬億元，增加近六成，所佔比重高達58%，大大超出正常界限。現在有些地方房地產熱又開始有所回潮，鋼材等生產資料價格有上升趨勢。

通貨膨脹有可能成為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爆發點。這幾年，貨幣超發、銀行超貸，通貨膨脹壓力愈來愈大，物價指數上漲呈加速趨勢。在前兩年貨幣投放過多的基礎上，去年上半年又比前年同期多投放500多億元。下半年通過整頓金融秩序，嚴肅金融紀律，制止了違章拆借和非法集資，扭轉了貨幣過多投放的勢頭，全年共投放1529億元。去年8月在收回拆借600多億元的同時，實行了“堵邪路，開正道”的正確方針。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適當多投放一些基礎貨幣，對於避免經濟大起大落，疏解抵觸改革的情緒，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當時我們亦預見到不採取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將會延長通貨膨脹的時間。從去年





11月開始，廣義貨幣  $M_2$  的增幅上升，由8月份的21.2%上升到24.4%。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今年實行從緊貨幣政策的難度。

稅制、外匯等改革一般不會增加企業負擔和引起價格上漲，但少數企業負擔會有所提高，對個別物價有不同程度的推動。

例如，原有的產品稅改為統一稅率的增值稅，絕大部分企業減輕或沒有加重負擔，但有少部分企業會增加一些負擔；匯率並軌沒有影響進口家電零部件的外匯成本，但由於計稅價格提高，也會增加關稅和海關代徵的增值稅，從而推動家電商品的價格。為了減少改革對物價的推動，對於前一種情況，採取了取消國有企業“能交基金”和“預算調節基金”的辦法；對後一種情況，擬採取降低關稅的辦法。這樣改革對物價的影響就很小了。儘管如此，可能仍有少數企業會增加負擔，它們會叫得很厲害。再加上最近糧價上漲後很難回復到原來的水平，這使今年的價格起點很高，以及實現今年通貨膨脹率控制在10%以下的目標難度加大。

此外，農業基礎不穩固，各級領導對農業還沒有足夠重視。近數年農業投入明顯不足。一些地方熱中於上項目，搞開發區，挪用農業資金，佔用農業用地。農民對農業的投入興趣也在逐年遞減。糧、棉等主要農產品生產比較利益低的問題相當突出，農民收入連續幾年徘徊不前。1989～1993年年均僅增長2.2%，與實現小康目標所要求的年增長5.5%的速度差距較大。農民種糧棉的積極性受到影響，有些地區出現撿荒的現象。

但是，最大的危險還在於各級領導幹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不盡一致，行動不太協調。有些人一方面上項目、鋪攤子、比速度、大幹快



上的勁頭很足；另一方面對改革的興趣不大，甚至在那裏琢磨對付的辦法。這種精神狀況不改變，改革就失去了取得成功的基礎。

## 六、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係

1994年的改革已是脫弦之箭，我們不能後退，後退也無路。改革務求必勝，關鍵是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係。

1. 要繼續防止經濟過熱，下大決心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新的一年宏觀經濟發展的總態勢是全面趨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指標可能面臨的“三個突破”，即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明顯突破9%的目標，勢必加劇“瓶頸”制約和結構性矛盾；價格漲幅有可能大大突破10%的目標，帶來社會不穩定；固定資產投資有可能明顯突破1.3萬億元，達到1.5～1.6萬億元，從而造成全面緊張。因此，今年仍然要注意防止經濟過熱。鄧小平說過：“我們的一條經驗是，發展順利時要看到出現的問題，發展要適度，經濟過熱就容易出毛病。總之，制訂一切政策，要從實際出發”<sup>1</sup>。今年必須做到國家計劃確定的年度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尤其是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決不能突破；計劃規定的固定資產貸款規模也決不能突破。金融工作要堅決執行國務院確定的方針：“繼續整頓金融秩序，穩步推進金融改革，

1 參見《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嚴格控制信用總量，切實加強金融監管”。去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約法三章”要繼續貫徹執行。

2. 要十分重視和嚴格控制通貨膨脹。這對於順利推進今年的改革至關重要。因為只有在通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匯率才能比較穩定，增值稅改革才不會推動物價上漲。現在看來，要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堅定不移地採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如果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控制不住，攀比速度的勁頭下不來，“倒逼”銀行的情況便會繼續發生，最終就不可避免地要實行我們最不願意實行的硬著陸措施。當不得不這樣做時，地方和企業的反應都會很大，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決策機關要堅決守住立場。

3. 要密切關注群眾的生活，注意市場物價的走向。要重視虧損企業的扭虧增盈工作，幫助這些企業調整結構、改善管理、改造技術、開發產品，特別是要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那些扭虧無望的企業要在妥善安排好職工的前提下，有步驟地實行破產。要高度重視“菜籃子工程”，切實做數件與群眾生活緊密相關的事情。地方財力寧可少上數個項目，也要首先保證機關幹部、學校教職員工的工資，不得蓄意拖欠，以製造向上級和銀行施加壓力的硬缺口。

4. 要繼續穩定和發展農村經濟。關鍵是真正落實中央已出台的各項加強農業的措施，要加強這方面工作的檢查督促，確保政策到位。重點是增加各方面對農業的投入；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業負擔，保護農民務農的積極性。要認真研究改革現行糧食購銷體制，建立糧食風險基金，切實解決農產品的供需波動問題。

5. 要進一步統一認識、統一步調，勵精圖治，同舟共濟。這次改



革方案盡可能地做到簡單明瞭，但是，從思路上和操作技術上，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一門全新的學問，靠過去的知識和經驗是遠遠不夠的。這次方案本身也確實比過去的改革方案要難理解、難掌握一些。每一個領導幹部都必須老老實實從頭學起，來不得半點偷懶和取巧的心理，要作好處理突發事件的思想準備和各項措施準備。對消極對待改革的現象要嚴肅批評；對妨礙改革、對抗改革的行為，要予以紀律處分。鄧小平在1988年就說過：“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麼行呢？”“黨中央、國務院沒有權威，局勢就控制不住。”“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sup>1</sup>今天重溫他的講話精神，體會尤其深刻。我們要從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上，對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係抱有緊迫感、危機感和憂患意識，確保圓滿完成今年的改革任務。

---

1 參見《中央要有權威》，《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必須繼續推進流通 市場化和市場制度化

---

當進行了十多年的中國改革開始向企業、財政、稅收、金融、外匯、外貿、社會保障等方面推進的時候，人們一般認為價格改革作為市場改革的基礎，同時也是以上這些改革的前提，差不多已經大功告成，至少也可以告一段落。然而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在改革深化的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到，價格市場化和市場制度化的問題遠沒有解決。這不僅是當前經濟改革的一項緊迫任務，也是今後相當一段時期裏改革的長期任務。

---

編按：本文原載《改革》，第5期（1995），並收入吳敬璉、周小川、榮敬本等合著：《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2000年第二版）。本文獲得1996年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



## 一、流通的市場化<sup>1</sup>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

在 1980 年代中後期，中國對於搞市場經濟必須將價格放開，讓流通市場化的經濟學命題，本來已經沒有明顯的爭論。因為無論是在中外經濟學的教科書裏，還是在各種現實經濟制度的比較中，結論都是明顯的。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後，大家的觀點已經趨於一致。但是，實際經濟生活中的某些做法，卻使得一些原來比較清晰的觀點，現在又有些模糊起來了。

簡要回顧一下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可能有利於我們重新整理一下思路。首先應當說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確是認為市場和社會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因為傳統理論把最簡單的商品交換關係，當作從邏輯上和歷史上都是資本主義出現的起點，從而把市場交換關係看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重要內容。（對於這一點，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實際上是繞着走的。）在經濟學說史上，對於沒有了市場以後，社會主義如何利用計劃去配置資源，有過一番長時間的爭論。本世紀初，巴倫尼（Barone，1980 年）提出用一種聯立方程組來進行合理經濟核算和解決資源配置。這種觀點受到米塞斯（Mises，1920 年）、哈耶克（Hayek，1935 年）等人的否定；而

---

1 流通市場化，過去一般用價格的市場化或放開價格來概括。現在看來這種概括不夠全面。誠然，價格是市場交易的結果，也是市場交易的核心，但不是全部。市場流通還應當包括流通主體、流通方式、流過程、流通的制度環境和法律環境等等。因此，本文用流通的市場化來代替過去常用的價格的市場化，可能更有利於論題的展開。



這種否定又遭到蘭格（Oskar Lange，1936～1937年）和阿巴·勒納（Abba Lerner，1934～1937年）等人的反駁。蘭格進一步提出用“試錯”的辦法來解巴倫尼設想的聯立方程組，認為國家計劃部門可以通過計算，模擬市場，確定價格、工資和利率，以平衡供給和需求。爭論的雙方相持了大半個世紀。問題爭論的實質是資源配置究竟是基本依靠計劃（包括模擬市場的計劃），還是基本依靠實實在在的市場。從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用計劃取代市場來配置資源不僅成為一種牽涉億萬人的實踐，而且進而在不少國家成為一種統治性的觀念和制度。理論爭吵沒有得到的結果，卻在實踐中得到了。實踐證明，原來以為可以充分顯示人類理性思維的計劃經濟，實際是十足的官僚主義和盲動主義，充斥着浪費和低效。從50年代開始，一些計劃經濟國家開始對這種體制產生懷疑，並逐步進行了改革。

中國改革之初，關於體制方面的啟蒙式爭論，就是從是否要放棄計劃配置資源的方式，價格改革是否必要、以及是否以放開市場價格為方向，是否可以讓農民和企業有產品自銷權等開始的。不過，改革的實踐並沒有等問題爭論明白以後才開始。1980年代初期，國家政策允許訂購以外部分農產品和部分企業的超計劃產品逐步實行自銷，並放開價格，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改革特色的“雙軌制”。大約到了1985年，除了少數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價格改革只會導致中國改革失敗，切不可率先進行以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實際工作者對價格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普遍達成了比較一致的共識。

中國放開價格管制、削減計劃許可權的過程是漸進式的。儘管人們有理由認為這個過程完全可以更快一些，但這種漸進式的改革畢竟



取得了比“休克療法”好得多的成效。到1993年，除了棉花、石油、部分煤炭等，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放開。特別是取消沿用了數十年的糧票，對於一直被吃飯問題困擾的中國人民來說，不啻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情。有些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農業改革成功經驗時，較多着墨的是分田到戶、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對放開農副產品市場，自行定價、自由流通的分析不夠突出。其實，如果只是把土地分給農戶，農民可以自行耕種，可以擁有農業稅以外的全部農產品，而對於自己消費之餘的產品，只能以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的話，中國的農業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工業企業的改革也是一樣，產品定價權是企業自主權中最基本的權力。從改革十幾年的實踐看，某種商品價格放開，這種商品供應就充足；直至大多數商品放開以後，才出現了市場的整體繁榮。

本來不應該再有什麼爭論了。可是近一兩年，有一種奇怪的說法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有些部門的出國考察報告稱，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一般都管着相當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並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是不干預企業定價的。看了這些報告，人們不由得產生了一系列的疑問：為什麼早幾年出國考察就沒人發現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市場經濟的本來涵義是什麼？如果沒有以供求關係決定的自由價格，還有什麼市場？我們前幾年的價格和流通市場化改革是否出了什麼偏差，或搞過了頭？

經濟學教科書對市場有種種定義，大意基本一致。一本經濟學教科書是這樣寫的：“市場是一種過程的簡單表述。在該過程中，家庭對於不同消費品的選擇，企業對於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的決策，工人





關於受雇於誰、幹多幹少的取捨都通過價格的漲落來調節”。<sup>1</sup>的確，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是不干預經濟的。但是，政府干預什麼？如何干預？這正是區別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標誌。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部門主要是進行宏觀調控，管的是全社會的總需求和總供給，管的是價格總水平，管的是市場規則。如果事無巨細，什麼都管，連企業的產品定價都要管，那麼這和傳統的計劃經濟有什麼區別，那我們還要搞什麼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這些年，中國經濟學研究中，沒有比“宏觀調控”這個詞用得更亂更糟的了。現在是哪個部門想插手經濟，那個部門就打出一個“宏觀調控”的旗號。宏觀調控就其本來意義是對國民經濟的整體進行調控，任何個別的、局部的經濟，都不能稱其為宏觀經濟。<sup>2</sup>現在，部門、地方、企業都在說自己要搞宏觀調控，這實在是個極大的誤會。看來在經濟學界和實際工作部門要給“宏觀調控”這個概念正本清源，而決不僅僅是個簡單的文字問題。

事實上，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部門想管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經濟管理部門該管的沒有管或沒有管好，而不該管

---

1 (美) 斯坦利·費希爾、魯迪格·唐布希：《經濟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

2 據(美)D·格林沃爾德主編的《現代經濟詞典》，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一種現代的經濟分析方法，它分析的是資料的總和，而不是個別資料。它研究經濟生活的總體，研究經濟經驗的總的規模、形態和作用，而不是個別部分的作用。更為具體地說，宏觀經濟學所分析的是一般物價水平而不是個別商品的價格；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而不是個別廠商的收入；是總的就業情況而不是個別廠商中的就業情況。



的事情實在是管得太多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計劃管理部門經過這數年的改革，對宏觀經濟問題關注不夠，卻仍然管着十分具體的事情，微觀干預的權力仍有強化的趨勢。市場經濟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即自我負責的原則。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人（包括法人）只要遵紀守法，他在市場中的一切損益，應該全部由他本人負責，而與他人和國家無涉。因此，即使出於最良好的願望，由政府部門過多地去承擔本來應該由個人和企業承擔的責任，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培育也是有害無益的。

就拿市場經濟中最典型的部分——證券、期貨市場來說，在證券、期貨市場上，政府最基本的責任是維護市場的秩序，確保市場的公開、公正和公平；政府無法也不應該對證券、期貨市場的價格和任何一方的盈虧負責任。而現在證券、期貨監管部門的責任錯位，是中國證券、期貨市場不成熟最明顯的表現。這種錯位，既反映在監管部門的工作中，也反映在廣大市場參與者的意識中。中國有些投資者對期貨市場的風險性缺乏認識，投機心態嚴重；一旦發生虧損，心理和資金均無承受能力，便到處告狀，打着維護中央宏觀調控的漂亮幌子，片面誇大期貨現貨價差，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希望通過政府行政干預來達到保護個人利益的目的；從而減少虧損甚至反虧為盈，將在市場上的虧損通過告狀翻過來。從以往的情況看，很多投訴者本身就是投機者，其反映的情況，經調查往往是片面的或不真實的，但只要告狀，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效果。這些告狀者正是看準了政府部門的心理弱點。這些市場參與者賺了錢覺得理所應當，賠了錢就呼天號地，覺得政府欠了他。這時候監管部門往往沉不住氣，常常屈從於各



種利益集團施加的壓力下，自覺不自覺地採取一些影響市場價格的措施，即所謂“救市”措施。這樣做有可能緩解一時矛盾，但最終只會扭曲市場、慣壞個人和企業，釀下更大的後患。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個別商品價格所能起的作用也是極其有限。當某一種商品價格明顯上漲時，比較直觀的想法和本能的反應就是將價格管住，用行政分配代替市場交換。其實，這就像一鍋煮沸的粥，要不讓它漫溢出來，摠住鍋蓋是無濟於事的。事實上，為了把某一商品的價格管住，而又不至於使這種商品的生產者過於吃虧，往往不得不沿着投入產出流程把一系列的商品價格管住。但這樣做卻會在愈來愈大的範圍裏損壞市場機制，其結果近不利於刺激生產，遠不利於調整結構，肯定不是明智之舉。特別是農產品的供給和價格大約三四年一個周期，政府的農業政策應該努力熨平這種周期性波動，儘量避免過敏性反應。干預過多，只會加大波動的幅度。1993年年底農產品價格猛烈上漲，確實超過了補償性的結構調整，但價值規律告訴我們，過高上漲的部分，經過一段時間會回落到合理價位上。從1994年底到1995年初，豬肉由嚴重緊缺到大量積壓，以及糧食、副食品價格逐步從高價位回落，就證明了這一點。

## 二、流通市場化的進程並未了結

這幾年，在糧食價格上漲過快時，為了維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一些地方又恢復使用糧票。為了整頓流通領域，國家加強了對石油和成品油的價格和分配方面的控制。對棉花流通領域，重申了不放



開市場的政策。但是，正像國務院領導人在談到棉花流通體制改革時所說，改革最終還是要以“市場為取向”。這是十分正確的指導思想。我想“市場取向”不僅指棉花流通體制改革，也應該包括所有農產品和工業品流通體制的改革。

反對或推遲市場取向改革的常見藉口，是物資短缺。這是戰時經濟留下的慣性思維。計劃定量分配在三年困難時期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和理所應當的政府行為準則，成為我們似乎須臾不可偏離的制度。其實，在戰時，當供給幾乎沒有任何彈性，而需求又遠遠得不到滿足時，命令經濟、價格管制和計劃分配作為權宜之計，還能收到一定效果。但現在，供給和需求都有相當的彈性，隨着價格的變動，供給和需求得到調節，從而趨向平衡。理論和實踐都反覆證明：管住價格、堵塞流通，只能加劇短缺、刺激投機、造成黑市猖獗；放開價格，物暢其流，只會繁榮市場，而不會導致價格暴漲或流通混亂。

問題還在於即使計劃經濟於當年有效的辦法，現在也行不通，因為已經不再具備行政分配的社會政治基礎。如今，國企商業早已獨立核算，實行企業化經營，有着自身合情合理的經濟利益。要國企商業在沒有國家補貼的情況下，只談社會利益，不計企業利益，不計得失地發揮平抑物價的主渠道作用，無異於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實在是難以做到的，在情理上也是說不通的。同樣，要已經有了自身利益的地方政府，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的統一價格和調撥計劃，實在也是難以做到的。行政分配一靠服從，二靠補貼。現在不計經濟利益，只靠階級鬥爭來維持的服從已不復存在，大量的財政補貼也是沒可能。1994年開始已經實行了分稅制，如果繼續由中央財政來負責



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個包袱最終會把我們拖垮。改革前我們跟市場鬥了 20 多年，最後落得個國貧民窮，還是沒有擰過市場。因此，最終選擇的出路只能是市場取向的改革。

1993 年以來，各方面強化對農產品市場的管理，意在既保護農民的利益，又兼顧市民的利益。但是，部門和地方執行起來，以市場為取向的管理措施不多，而行政命令、強制限價的辦法卻不少；因此收效不顯著，市民見不到實惠，而農民則怨言尤多。國家一度用訂購和議購的辦法，控制着佔商品糧大約 80% 的貨源。但典型調查表明，即使在大城市，市民甚至機關團體所需的大部分糧食也不在糧站購買，大約 80% 都是從市場購買的，更不必說那些主要依靠集貿市場的中小城市的市民。這兩個 80%，是否可以說明，國家的大量補貼只是養育了一個低效的糧食收購、儲備、流通體制，並沒有達到平抑物價、保障人民生活方面的目的。近一兩年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有所提高，當然與國家較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有關，但主要還是衝着上漲更快的市場糧食價格去的，這就是所謂“邊際價格”的調節作用。

國內外經濟學界都十分關注中國的農業問題。1994 年，世界銀行的一份關於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證國內食品供應和國內糧價穩定，國家沒有必要控制所有糧食批發貿易的 70%～80%。比如說把這一比重逐漸降低到 10%～20%，也許有助於提高貿易和儲備方面的效率，提高對消費者需求變化的反應能力，使農民取得更有利的價格。”“在這些領域仍然有減少國家控制的餘地。”1995 年，美國的一家研究機構——世界觀察研究所稱，下個世紀中國要餓死全世界。一時輿論譁然，附和者有之，駁斥者也有



之。這種議論未免過於危言聳聽，但多數經濟學文獻，對中國農業前景嚴峻，出路在於改革，可以說是眾口一詞的。

我們認為，中國的市場流通體制，確實又面臨着一次大變革。因為剩下的數個品種的流通體制，有些是改革尚未真正觸及的；有些是改革淺嘗輒止的；有些是改革退而失守的。特別是有些品種暫時供應比較短缺，甚至從長遠看資源也不豐富。對這樣的品種的流通體制進行改革，傳統思想的阻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就會特別頑強。但除了往前走，推進市場化，沒有別的出路。不改革，必然要拖垮財政和銀行（各種政策性和非政策性的虧損掛賬，是中國銀行壞賬、呆賬的主要組成部分），延滯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同時，也不利於緩解中國的資源瓶頸制約。

一個品種的流通體制是否應該市場化，不在於它是否短缺，而在於它的供給和需求是否可以形成競爭，而這種競爭是否有利於降低成本。只有那種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一般不宜提倡競爭，應由政府 and 社會協商來確定它的價格。所謂自然壟斷，是說對那些平均成本遞減的行業：即由一個企業來生產產品，它的效率最高；當由很多競爭企業來生產，它的效率反而降低。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利用壟斷生產來發揮規模經濟性的技術效率，同時又要避免壟斷企業以限制產量的辦法，謀求高價，損害消費者。典型的自然壟斷行業是自來水、煤氣、電力供應和污水處理。對這些行業的價格必須有嚴格的管理。應當指出，自然壟斷的行業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會發生變化。例如，鐵路、郵電過去也被認為是自然壟斷的行業，現在有些國家的政府採取各種辦法，比如用反壟斷法促使這些行業展開競爭。



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目標是，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中國現在有些商品的流通，完全處於人為的、行政性的壟斷中，必須而且有條件地立即加以改革。

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是主渠道和多渠道並重，政策性儲備和商業性儲備並重；抓住主渠道，放活多渠道；政策性儲備以備戰備荒為主，商業性儲備以調節市場供求為主。對城市低收入者，採取實物或貨幣定向補貼的辦法，取消普遍發放糧票的辦法。要在將國有糧食系統分開經營的基礎上，扶持一批真正商業化的糧食流通企業，包括農村的糧食加工和流通專業戶，放手讓他們擴大經營規模和流通範圍，與國有糧食企業展開健康的競爭。

棉花流通體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允許產銷直接見面，取消國家計劃調撥。這些年，我們年年為種棉花、收棉花、調棉花煩惱，以為如果不管住棉花的價格和流通，工廠就會停產，工人就會失業，消費者就會買不起棉織品。殊不知，只要國家承擔棉花計劃調撥的職能，紡織部門就不可能對降低成本消耗，提高產品價格競爭力有切膚之痛；只要國家規定的棉花收購價格與市場價格有較大的差距，地方保護主義就不會杜絕，鄉鎮小棉紡廠就不可能關閉。1993年棉花年度，我們為要多收棉花絞盡了腦汁，為大中型紡織企業的原料費盡了心思。但事實上，1994年大中型紡織企業的日子過得很好，高價購買的原料消化了，農民惜售的棉花全部流出來了。當然，棉織品的價格漲價較快，但這也順應了純棉織品不再是必需品，而是一種高檔消費品的世界潮流，促進人們轉變觀念，更多地使用代用品。同時，正因為棉花價格上漲過多，地方保護主義失靈，一些多年要關的小棉紡



織廠停產了。市場做到了我們計劃多年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情。

石油及其製成品流通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在打破行業壟斷的前提下，放開價格，展開競爭。用平價物資對某些行業進行政策性支持的做法，實踐證明這是不成功的。例如，過去用平價柴油獎勵交售農產品的農民，但實際上經過層層權勢人物的剋扣，真正落到農民手上的所剩無幾。所以，今後對某些行業的政策性扶持，應當改為用財政直接的貨幣補貼和用放開該行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的辦法。這不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可以大大地減少產生腐敗的機會。

至於其他物資的流通體制改革，如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原來就是為了在控制農產品價格的前提下，為減輕農民負擔而管住的。在解決了農產品流通體制以後，這些物資的流通體制改革一般都可以迎刃而解。

### 三、流通市場化的歸宿是市場制度化

對市場是先發展，還是先規範；發展和規範是否對立，是否在發展初期不能強調規範，強調規範就會束縛市場發展；市場發展是否有一定的規律，是否要循序漸進；這些都是經濟學界前些年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

在這裏回顧一下中國經濟學界關於期貨市場問題的爭論，我覺得有助於加深對市場制度化的認識。當時一種意見認為，市場要不斷地發展和深化，要不斷提高市場的“高級化”程度，特別是要大力發展中國的期貨市場。至於市場的規範化，可以放在市場的大發展之後考





慮。另一種意見認為，期貨市場是市場經濟高級階段才出現的事物，只有現貨市場比較發達以後，期貨市場才有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否則以“倒爬樓梯”的方式進行改革，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但是，以科學的態度對改革和發展所進行的冷靜思考，如何擋得住利益的誘惑和物欲的衝動。期貨市場，當它在人們包括許多從業人員並不具備起碼知識、政府沒有任何法律監管的情況下一哄而起以後，損失是慘重的，教訓是深刻的。

期貨市場在前數年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甚至多數經濟工作者來說，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詞。但是，曾幾何時，期貨市場熱幾乎席捲全國，對人們的思想和現實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幾乎所有的誤解和混亂都是以沒有弄清楚什麼是期貨市場為根源的。對於期貨市場，在一般經濟理論中很少展開討論。而在關於期貨市場的專業書籍中的論述，往往帶有濃厚的專業偏見和利益動機。另外，儘管普及讀物如此之多，真正認真研讀的人卻並不多。一些人往往將期貨市場混同於遠期交貨的現貨批發市場。其實，期貨市場是買賣各種實物商品和金融商品遠期合同的一種市場，進行交易的只是通常稱之為期貨的遠期合同。這種合同是一種標準化的合同。對於商品期貨來說，其內容包括標準重量單位、代表品規格、交割定點倉庫、交割日期、保證金、交易時間、報價單位、交易方式、每日價格波動限額等等。某種商品的期貨市場常常是指一個有組織的商品交易所，由這個商品交易所提供一個可以從事期貨買賣的、市場參與者可以信得過的、持續和穩定的市場。期貨市場不是現貨市場的簡單延伸，兩者在運作方式、運作規則和運作內容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作為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期貨市場一般與現貨市場相補充而存在。期貨市場的基本作用，在於可以使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避免因商品從生產到最後銷售、從訂貨到最後利用這段時間裏，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價格變動而帶來的損失。這種減少風險的功能，是通過套頭交易，即在期貨市場上採取與現貨市場相反的立場來實現的。一個交易者究竟如何在期貨市場上進行保值操作，主要取決於他對未來市場價格變動的預測和判斷。

為什麼可用套期保值的辦法來分散和轉移風險？這是因為在期貨市場上，有兩類交易者：一類是套期保值者，另一類是投機者。前者為了保值而轉移價格風險；後者為了追逐風險利潤而承擔價格風險。專門的風險投資者從前被看作為買空賣空的投機商。從承擔價格風險的角度看，他們是專門從事市場預測，靠信息分析等專業知識追求和獲取風險利潤的職業投資者。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風險資本成了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期貨市場上，投機者的成敗是一比一的機率（在證券市場上，一筆業務的交易雙方可以同時獲利，而在期貨市場上卻不能）。因此，在期貨市場上，從事投機是一場此賺彼賠的零和博弈。這種活動本身並不產生任何社會財富，但確實有着積極的一面。因為投機者買進或賣出的期貨合同是數倍、數十倍於實物交割合同，這樣龐大的投機活動，保持了市場的高度流動性，導致了套期保值者的交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風險得以順利轉移。這種頻繁活躍的交易活動，對於形成遠期價格，過濾價格的過分波動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投機者既是風險利潤的獲取者，又是市場風險的承擔者。沒有投機者的存在，期貨市場就無法運轉了。我們只



有充分了解到這些，才能比較全面地認識期貨市場的真實涵義。

期貨市場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確實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需要討論的問題是：

第一，在市場經濟建立的初期，期貨市場是否絕對不可缺少？建立期貨市場是否必然有一個放任自流的過程？如何恰當估價期貨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世界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為什麼並不都有發達的期貨市場，相反有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政策上抑制期貨市場的發展？

第二，建立期貨市場的體制條件是什麼？期貨市場發現價格和套期保值的功能在什麼情況下才能發揮？期貨市場發現價格的功能是否不可替代？期貨市場究竟在發現價格和扭曲價格方面各起什麼樣的作用？

第三，在公有制經濟中，是否應當提倡並不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的投機活動？在沒有財產約束的情況下，期貨交易行為會產生怎樣的變態？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條件下，期貨市場的效果有什麼不同？

第四，在人民幣沒有完全可兌換、對外貿易還有某些管制的情況下，開展境外期貨的可能性如何？我們是否有必要以數億、數十億美元損失的代價，去進行目前利小弊大的境外期貨交易？

有些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發育和成長完全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市場在任何條件下都能達到均衡，而只要達到均衡，就能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在市場發育的初期，沒有必要制定任何法律法規，否則只會束縛市場的發育。因此，不管條件是否具備，即使搞一個不規範的期貨市場（包括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對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有益的。

這種觀點有片面性。近 20 年來經濟學的最新發展成果告訴我



們，當市場不完備（incomplete）且存在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市場、期貨市場）時，市場的均衡是不確定的（indeterminate）。為此必須從市場外部給予附加的條件。這些條件一般指的是法規和政府的干預等。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市場不能達到均衡，資源配置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凱因斯早就說過：“當國家的資本發展成為一個賭場活動的副產品，投資很可能盲目進行。”<sup>1</sup>

其實，即使在期貨市場的發展的早期，儘管基本上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但是並不完全放任自流。批發商協會的自律作用，以及政府賦予其權力，比較有效地防止了欺詐和毀約的發生。到了近代，對期貨市場的管理更加嚴格，法律也更加嚴密。當然亦有些國家對期貨市場的建立和運行，採取了比較放任的態度，結果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東南亞的某些國家和地區就有不少值得借鑒的教訓。台灣便曾經在沒有制定有關法規的情況下，讓國際期貨交易活動盛行一時，導致出現許多不規範的行為。一些不法期貨經紀商誘騙缺乏基本知識的客戶，參與國際期貨交易。許多客戶根本得不到真實的市場信息，水單也並沒有進入有關市場，而是私下對沖。有的不法經紀商還捲跑客戶的保證金。不規則的期貨市場令客戶損失慘重。香港走的是先立法，後建立期貨市場的路子。當70年代初有些人強烈提出建立期貨市場的要求時，香港當局認為在有關法律法規尚未制定之前，是不能允許建立期貨交易所的，於是在1973年8月1日發布了禁止建立期貨交易所的

---

1 凱因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指令。直到 1976 年 9 月，立法局正式通過期貨交易法案以後，香港才建立了第一間期貨交易所。儘管如此，香港的期貨市場也沒有能逃脫 80 年代世界性股市風暴帶來的災難性衝擊。

讓我們再來看看期貨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期貨市場的主要作用是發現價格和迴避風險。但是，並不能由此得出沒有期貨市場就不能發現價格和迴避風險；沒有期貨市場就不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推論。事實上，期貨市場能夠覆蓋的商品不過一二十種，對於那些價格更不確定、市場風險更加大的製成品交易，市場機制一樣起着很好的配置作用；在那些抑制期貨市場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發育和經濟發展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把期貨市場的作用誇大到不適當的程度，就像過分誇大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的作用一樣，必然會在政策上產生偏差，在實踐上帶來消極後果。

從期貨市場發展的趨勢看，70 年代以來，商品期貨市場開始萎縮，金融期貨市場代之而起，由小到大，逐步成為期貨市場的主體。金融期貨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利率期貨；一類是外匯期貨；一類是股票指數期貨。金融期貨的興起，主要是由於對實際經濟生活新出現的風險，而客觀上需要一種迴避風險的新的機制。70 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制崩潰後，浮動匯率制代替了固定匯率制，西方各國通貨膨脹加劇，金融市場利率變動頻繁而且劇烈。這一切都給這些國家的投資活動、財務管理和國際國內貿易，帶來了巨大的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銀行、企業和其他重要的金融市場的參與者，都時刻面臨着利率和匯率無常變化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期貨應運而生，並以很快的速度發展起來。



但是，也應該看到，當期貨市場愈來愈遠離實物經濟，愈來愈成為一種純粹的貨幣活動以後，期貨市場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事實上，金融期貨的出現，除了前面所述的客觀原因以外，期貨投機者的主觀推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期貨市場上總是有一大批活躍的、具高超專業技能和冒險精神的投機者。這一批職業人群，不斷推出新的期貨品種，以取代舊的交易、趨於萎縮的期貨品種，從而為自己“開疆闢土”，製造新的生存和發財的空間。中國也出現了一批職業炒家。他們不僅炒期貨，現貨也能被他們炒得天翻地覆。早些年，他們炒君子蘭，後來炒郵票，都是在現貨市場上創下的“業績”。反正只要是某些商品的價格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都有可能成為炒的對象。

正因為如此，隨着期貨市場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與實物（包括商品實物和金融實物）完全不對應的期貨品種，例如，股票指數期貨等。股票指數意指一般通過選擇若干種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常稱成分股），在經過計算其某日成交市價而編制出來的一種價格指數。因此，股票指數期貨是一種無實物對應的期貨，沒有實物交割，只有現金交割。這種無實物對應的期貨，愈來愈遠離套期保值的功能，也就愈來愈成為投機的對象。

近幾年，以實物商品和金融商品為“標的物”，以及以期貨、期權（option）和調期（swap）的各種組合為主要形式的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令金融投機活動更加盛行。這大大增加了市場交易的複雜程度，也對市場制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說，只要有市場，就一定有投機。投機並不一定是期貨市場上特有的現象，只不過期貨市場將商業投機和金融投機變得更加精



巧、更加熾熱、更加名正言順而已。所以，要搞市場經濟就不能一味反對投機，相反應當承認某些投機活動的合法存在。當然，也沒有必要因此而大力提倡和鼓勵投機，甚至貶低那些社會一天也不可缺少的、誠實的實物生產活動。因為以獲利為目的的投機，是一種自發性很強的行為，特別是在一個有着深厚的、重商主義傳統的國度裏。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明確立法、道德規範、社會輿論的約束，以儘量減小投機活動對社會的危害。賭博也是投機，有些國家在嚴格的法律規範下賭博得到許可。但是在中國，對那些與增加社會物質財富毫無補益的賭博行為，無論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中，還是在將來建立的現代商業文化中，恐怕都不應有其正面的地位。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對市場經濟的消極面，正確的態度不是迴避、不是壓制，而是用制度化的辦法趨利避害，讓市場在有效配置資源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一個沒有制度化的市場經濟，可能要比計劃經濟還要壞。所以，對於期貨市場，要讓它真正成為發現價格和迴避風險的場所，而不致淪為被人唾棄的賭場，就必須根據國際成熟的經驗，滿足以下一些條件：

1. 制定全國統一的期貨交易法。
2. 建立直屬國務院的、統一的期貨交易監管機構和期貨從業人員的自律性組織。
3. 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
4. 期貨交易必須建立在競爭性的市場價格基礎之上。
5. 必須制定充分合理的交易條例、會計準則和結算制度。
6. 必須建立有效充足的現貨市場和與之相適應的金融體制。



7. 必須有合理規範行為的市場主持人（期貨交易所）、經紀商，以及足夠數量的自營商（期貨商品的供應商和需求商）和投機者（既要牟取經濟利益，又要承擔經濟風險）的存在。

8. 必須擁有訓練有素的期貨市場管理人才、交易人才和研究人才。

9. 必須擁有完善的通信系統、高效的報價服務系統、充分的運輸和倉儲系統。

10. 必須根據本國的資源的供給和需求狀況（包括商品資源和金融資源）來設計期貨商品，而這些商品必須是可以標準化的商品。

中國經濟體制正處於轉軌過程中，就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法律狀況等各方面來看，搞期貨市場的條件並不十分成熟，因此可以說期貨市場是改革中的早產兒，難免有先天不足、經常犯病的情況。建立期貨市場的條件，有的可以在建立的實踐中逐步創立；有的則必須在建立期貨市場之前已確立的。這種高風險的行業如果帶病運轉，後果可能是凶多吉少。況且，中國已不是一張白紙，期貨市場已經在全國全面鋪開，相當多的利益集團和從業人士已與期貨市場的命運相連。因此我們只能面對現實，採取堵疏結合的清理整頓和積極利用的方針。期貨市場畢竟是市場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已經出生，我們只能好好調理它，盡可能地讓它平安、健康地成長起來。

期貨市場出現之初，問題嚴重、危害巨大的是境外期貨投機。許多境外不法分子利用人們對期貨市場的無知，採取私下對沖、吃點、偽造行情，甚至捲款逃跑等手法，在國內詐騙了大量錢財。所以，海外輿論說：“大陸期貨未見其利，數億美元已流出境外”。國家有關





文件已命令在全國範圍內立即停止外盤期貨交易，這是很得人心的舉措，國內外輿論反應很好。當然，內盤期貨問題也不少，關鍵是法規不健全。只要認真抓，可以在數年內逐步走上正軌。相比之下，儘管內盤現在也有一些糾紛，在國民經濟中有一定的負面反應，但可以通過行政干預和法律規範來加以解決，還不至於像外盤那樣失去控制，造成國家的巨大損失。

最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的期貨市場是在人們尚未弄清楚其好處到底有多大的情況下已然風起雲湧；現在又有可能在人們並沒有弄清楚其壞處到底在哪裏的情況下便已煙消霧散。我們覺得不管是讓它自生自滅還是人為停止，對政治和經濟可能很不利。應當看到，在國務院同意批准的十五個試點期貨交易所之外，以各種名目為掩護的期貨市場正有重新氾濫之勢，地下的外盤期貨交易活動也有可能死灰復燃，而各地區、各部門以及一些國有單位對期貨市場盲目衝動的勁頭還很大。我認為，要對這些在體制外肆虐橫行的能量實行監管以至取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可能是我們難以承受的，也是難以奏效的。根據國際經驗，比較成功的辦法是將這些能量規範轉到體制內運行，這樣更有利於興利除弊。所以，對經國務院同意批准的期貨市場試點所存在的毛病，也要像對其他改革試點一樣，既要嚴格要求、不斷完善，也要有一定的耐心，允許有一個改進的過程。我們相信，經過各方面的努力，隨着體制條件和社會心理的成熟，中國的期貨市場是可以健康成長起來的。



## 四、市場制度化的數個問題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所表述的經濟制度理論中曾提及，在現實中，市場交易這個經濟制度的條件及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制度規範而來，而政治制度的產生和變革，則反映出群眾傾向的某一信念。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不但改變生產成本及交易費用，也會使經濟制度作出調整，造成制度變遷。當前中國要實現市場制度化，得必須解決以下理論認識問題：

第一，市場能做什麼，市場不能做什麼。套用一句流行的俏皮話來概括就是：“市場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市場是萬萬不能的”。市場最重要的功能是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市場價格是成本最低、反應靈敏、內涵豐富的信息，無數分散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根據這些信息，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市場可以激發競爭，可以極大地調動人們的聰明才智。市場可以讓處於不同技術層次、實力地位、資源條件的國家、地區和個人，充分合理地發揮其比較優勢。但是，市場不能做的事情也很多。如果不切實際地要求市場做它不能做的事情，就容易對市場產生偏見。

發現價格是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但它沒有平抑物價的功能。期貨市場只會發現、反映、預測通貨膨脹，而不會製造、推動、掩蓋通貨膨脹。所以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期貨市場不是通貨膨脹的發動機，而只是通貨膨脹的測速器。期貨市場實行競價交易，客戶需根據自己對未來價格走勢的判斷選擇作多或作空。由於影響未來價格變化的因素多種多樣，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在時間上存在一定的距離，



期貨價格在交割日前都處於波動中。因此在交易過程中，期貨價格在某一時期或高或低地偏離現貨價格是正常的。一般進入到交割月份，期貨價格就會向現貨價格回歸。一年來的實踐表明，交易所的實物交割價格與現貨價格大致趨同。即使取消了某個品種的期貨交易，現貨價格波動仍然是存在的。比如 1994 年 5 月份上海糧交所發生粳米風波，中國證監會與國家計委、內貿部等單位聯合進行了調查。當時粳米期貨價格為 2200 元/噸，調查組宣布它已進入高價位區，並採取了協定平倉的措施，及後又暫停了粳米期貨交易。粳米期貨交易已停止了一年，現貨價格仍一直上揚，現在每噸 2800 元，大大高於當時停止粳米期貨交易時的價格。又如，1994 年 5 月停止白糖期貨交易時，期貨價格為每噸 4100 元，1995 年 6 月白糖現貨價格達 4600 元左右。以上事實說明，由於中斷了交易，當時人們抱怨的期貨市場才只是發現了價格上漲的趨勢，其實遠沒有預測出實際應該達到的價格水平。期貨市場沒有做到它做不到的事情，這不是它的過錯。

市場不能自動實現地區經濟發展的平衡和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富裕。有大量資料表明，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地區經濟水平和個人收入水平的差異不是縮小了，而是明顯擴大了。不可否認，計劃經濟對於縮小舊社會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無能政府和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巨大地區經濟和個人收入差距方面，起過歷史性的作用。例如，在許多不毛之地建設的現代化大工廠，使長期幾乎處於自然經濟狀況的地區，一步跨進了工業化的門檻；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工資類別，對於在邊遠地區的工作人員，在收入方面給予相對的補償。但是，必須看到，這樣做是以極大地犧牲效益為代價的。同時，長期採取剝奪農民的價格政策，使城



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也是計劃經濟的一大弊端。改革以來，放開農產品的價格和流通，明顯改善了農民的收入狀況，從總體上縮小了城鄉收入的差距。同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對於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功不可沒。實行對外開放，發揮地區優勢，沿海地區發展十分迅猛。可以說，沿海和內地的經濟水平差距，不是由於內地經濟發展的停滯或發展速度的絕對下降引起的，而是由於沿海和內地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存在着速度的相對差距所引起的。對於這個問題——只要蛋糕做大了，是不難解決的。

市場不能自行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正如前面所述，市場只會以通貨膨脹或經濟萎縮的形式如實地表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不平衡，既不會掩蓋，也不會誇大，更不會無中生有。所以，市場上反映出來的現象，並不能怪罪市場本身。就像市場上出現偽劣商品，只能怪法規不健全，而不能怪市場太自由。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不平衡，應該從金融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上檢討出了什麼問題。

第二，政府能對市場做什麼，不能對市場做什麼？儘管實際經濟生活要複雜得多，但是要而言之，就是能由市場做的事情就讓市場去做，政府主要去做市場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在市場失效的地方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如果政府硬要去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其結果往往事倍功半。

政府首先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建立法律法規。這是政府應有的特權，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亞當·斯密設想的市場是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一群互不相干的人，他們都各自追求自身



的最大利益，在沒有政府指導的情況下，能夠創造出一個穩定有序的，而不是雜亂無章的社會。但是，既然認為每個人都是自私地想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利益，那麼不勞而獲一定會成為比較普遍的社會行為，而無法無天的偷盜一定會把天下搞得大亂。“看不見的手”對此一定毫無辦法。只有嚴密的法律，才能將個人的私欲限制在不危害他人、不危害社會的限度內。

回到前面提到的一個問題：市場究竟是應該先發展，還是先規範？換句話說，政府應該在什麼時候介入市場，是在市場建立的初期，還是後期？這裏有個對市場信心的問題。如果沒有政府的立法，市場沒有規則，就像沒有規則和裁判的運動場，搞得一團糟，那麼市場參與者就會失去信心。這樣，市場搞得再熱火，也會死去。有些國家的證券、期貨市場在沒有國家立法的情況下一哄而起。雖然一時轟轟烈烈，但最後以給社會帶來嚴重的災難而告終，從此一蹶不振，教訓十分深刻。當然，政府以立法、執法者的身份介入市場，決不等同於可以隨意干預市場。政府隨意干預市場，使市場徒然增加了不決定性，也就是額外增加了市場的風險性，這也會傷害市場參與者的信心。

制定貨幣政策是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能。通貨膨脹、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的三個最關鍵的問題。政府應該對保持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的平衡負責，爭取做到盡可能低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長率。一般來說，政府不必對個別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負責，但是要對價格的總水平負責。政府應該堅定不移地將反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當通貨膨脹發生以後，政府全力以赴地加以控制，最重要的是讓人民確立對政府承諾的信心。反



通貨膨脹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

財政是政府行使其政治、經濟和社會職能的基本保證。財政收入和支出，以首先應當保持政府正常功能的完整性為大前提。現在，許多應該由政府來辦的事情，因為政府無錢去辦而推給了社會，造成了很多的弊端。例如，財政支付的公務員工資不足以養廉，只得對公務員來自攤派、經商的灰色收入，開隻眼閉隻眼。於是為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留下了空隙。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意志主要由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來體現。政府通過直接投資和鼓勵、扶持投資，達到調整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目的。同時，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盡可能地實現地區間的平衡發展和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富裕，盡可能地給低收入者和缺乏生活能力的人以社會保障。

政府干預市場的一個重要形式是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學界從日本引進的概念。產業政策是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經濟和社會目的，以全產業為直接對象，通過對全產業的保護、扶植、調整和完善，積極或消極參與某個產業或企業的生產、營業、交易活動，以及直接或間接干預商品、服務、金融等的市場形成和市場機制的政策總稱。<sup>1</sup>實踐證明，日本在不同時期成功地實施一系列產業政策，是日本戰後能夠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我們搞市場經濟應當學習日本的經驗，但切忌只學表面，不學實質，更不能學偏了。我們和日本有一個基本的不同點，日本是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之

---

1 《現代日本經濟事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日本總研出版股份公司，1982)。



上，實行政府干預的；而我們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搞市場經濟。搞不好，某些經濟管理部門完全有可能會借產業政策之名，行計劃經濟之實。不可忘記，日本產業政策的基本宗旨是“採取了通過市場機制發揮民間企業的積極性這樣一種尊重民間的自主性的立場”<sup>1</sup>。在制定產業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吸收民間的意見，官民雙方的有識之士組成各種審議會，並使之制度化。在執行產業政策時，政府只以產業結構設想之類的形式提出大致的政策目標，具體事情則交給民間辦理，政府的干預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內。但是在中國，產業政策無所不在，甚至要求證券市場也要體現政府的（實際是某些部門的）產業政策，實在有點不對題。

第三，要打破行業壟斷。我們之所以要搞市場經濟，就是要引進競爭，提高效率。市場競爭得以展開的基本條件，就是市場上要有較多的買方和較多的賣方。如果這個條件得不到滿足，市場價格就既不會等於邊際社會估價，也不會等於邊際社會生產成本。在存在買方或賣方壟斷的情況下，市場機制就會失靈。比如，即使我們放開了訂購以外的糧食價格，但是不放開多渠道經營糧食，市場機制不可能健全。在收購環節，農民只能面對國有糧食系統這一個買方；到縣以上糧食批發市場，勢必由國有糧食系統壟斷賣方。這樣，農民的糧食賣不出好的價錢；而消費者又要支付較高的價錢。我們常說市場中間流通企業太多，是中間環節費用過高的原因。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中間流通環節是一種服務，

---

1 《現代日本經濟事典》。



這種服務的價格也是由供求關係來決定的，供給過多，價格自然會下來。相反，如果這種服務處於壟斷狀態，價格一定會居高不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石油、成品油、化肥等流通體制。

第四，要破除地區封鎖。市場範圍的擴大和交易障礙的減小，是提高市場效率的重要途徑。一些分析認為，地方政府過多介入經濟，是地區封鎖的根本原因。這種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全面。政企不分，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權力和責任不清，的確是地區封鎖的一個原因。問題還在於，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也強化了地方政府本位利益。對地方幹部進行考核所採用的經濟指標，往往不符合經濟效率原則。例如，經濟增長速度、當地出口創匯總額、當地的物價指數等等。對某些商品由中央統一制定價格，事實上有時會損害一些地區的利益。這些地區就會明裏暗裏地封鎖市場，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前數年，有些省為了維護本省較低的大米價格，不讓農民把大米賣到米價高的省份去，不惜動用了民兵設崗、封鎖交通的辦法。其他諸如玉米大戰、蠶繭大戰、棉花大戰等也屢有發生。隨着市場物價的開放、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地區封鎖的現象已經有了明顯好轉。中央政府還應繼續採取有力措施，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這從經濟上、從政治上來說都是一件大事情。

第五，以市場國際化推動市場制度化，以市場制度化促進市場國際化。應該看到，中國的對外開放，大大推動了市場制度化的進程。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經濟合作，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必然要求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般準則接軌。要參與國際比賽，就必須熟悉、習慣、遵守國際比賽規則。不能設想，我們可以關起門按照自己